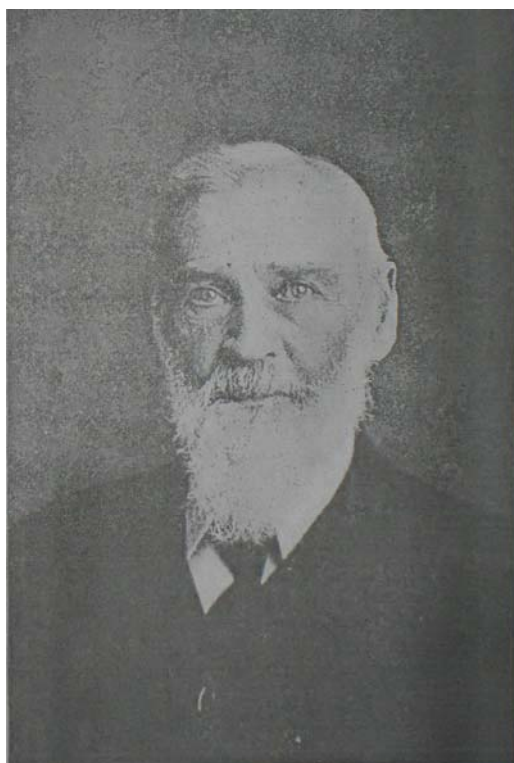


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

狄考文



费丹尼 著

郭大松 崔华杰 译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By Daniel W. Fisher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目录

译者前言	7
------------	---

序	9
---------	---

前言	11
----------	----

第一章 老家	12
--------------	----

诞生——坎伯兰山谷——家世——兄弟姐妹，父亲，
母亲，外祖父——移居“修道院”——在农场的生活——在老家——
少年和儿时的经历

第二章 造就男子汉	19
-----------------	----

天赋——老家的影响——一位乡村学校教师——亨特
斯顿专科学校——教书——道莱普斯希腊语学校——公开宗教信
仰——杰斐逊学院——一位同班同学的回忆——杰斐逊学院的教
职员——1857 届那个班——一封毕业 50 周年的来信

第三章 确定终身职业 26

母亲与海外布道——毕佛中学——决定要做一名牧师——西方神学院——西方神学院教职员——复兴运动——关注海外布道——获准传道——意欲赴海外传道——决定——特拉华，俄亥俄州——推迟赴海外——受任神职——结婚——终于准备出发了

第四章 奔赴前线 35

向中国山东进发——海上旅程——旅程历经的艰难和考验——抵达上海——转赴烟台——乘船触礁——在海岸边徘徊——去烟台送信和抵达烟台——乘坐苦子去登州

第五章 新家 42

狄考文住处——登州的情况——登州传道之始——观音堂——制作炉子和压煤机——独住观音堂——观音堂居所缺陷——建造新住宅——新家生活

第六章 内心世界 53

并非梦想家——温柔的心——重生——宗教储备——宗教经验记录——消除沮丧——无保留的奉献——成熟的宗教生

活——忠诚信念

第七章 布道 63

学习汉语——障碍——开始说汉语——登州小教堂——
——山东省——旅行方式——一些旅行经历——首次农村旅行——
中国客栈——四星期巡回布道——去潍县——对外国人的憎恨——
——骚动——与朱丽亚一起巡回布道——中国皈依者——去省城和
泰安——缩减巡回布道——后来的旅行

第八章 登州蒙养学堂 75

开办学堂——教育与布道——第一批学生——维持办
学的模式——不教授英语——学堂的发展——学堂一天的安排——
——关爱学生——纪律——一个企图自杀的学生——一位学生转变
了信仰——首批毕业生——回国休假归来受到的欢迎——进步——
——20年的蒙养学堂

第九章 出版与著述工作 88

为期刊写稿——英文著作——上海美华书馆——临时
监督差事——约翰·马蒂尔——教科书委员会——早期中文著述
——教科书——官话字典——官话类编——谨慎出版著述——著

述收益

第十章 关爱中国基督徒 101

关爱中国基督徒的原因——登州教会——惩戒——
学堂学生信仰转变——登州定期代理牧师——牧师——布道师——
分散各地的教友——招远苗氏——收获——最后一次农村访问
——“传道方式”——山东长老会教务评议会——农村长老会教务
评议会——中国宗教会议——宗教会议主席——参加母会最高裁
决会议

第十一章 登州文会馆 119

山东书院——资产——物理化学仪器——收集仪
器设备——卸任馆主——英华书院——书院地址与捐赠问题——
文会馆迁至潍县——新监督——山东基督教大学——本人迁居潍
县——临时监督——正式分离——文会馆发展现状

第十二章 结缘仪器和机械 133

成就——早期迹象——自我发展——工作室——
早期生活需要——对差会工作的帮助——参观者——帮本地人使
用机械——填写订单——一个数学问题——游艺会

第十三章 官话和合本圣经修订 141

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中国语言——第二次传教士大会——磋商新版圣经——计划——推选新版圣经译员——新版圣经修订译员——难题——文体——修订委员会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新约圣经修订完成——学到的东西——1907 年传教士大会——旧约圣经译员

第十四章 传教生涯伴生事件 153

磨难——亲人去世——“叛乱”——“天津大屠杀”——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义和拳起事——饥荒——论战——文会馆里的英语问题——快乐——殊荣——旅游——休假——结婚——西伯利亚旅途——少时生活场景

第十五章 面向新中国 168

巨大崩裂——以往的预言——新中国的缔造者——传教士的影响——目前的迹象——危险——责任——基督教的未来

第十六章 去世 175

最后的夏季——病情恶化——赴青岛治疗——目的——一次祈祷——在青岛的丧礼——在烟台的葬礼——郭显德博士、赫士博士、富善博士、鲍康宁先生、马蒂尔夫人的颂词——西部山东差会——英国浸礼会——美国北长老会本部——布朗秘书——传记作者——“勇于追求真理”

译者前言

狄考文，国际学界及基督教界公认的近代美国来华著名传教士、教育家、翻译家，原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他出生时，家境贫寒，一家人住在一幢简朴的木屋里，靠辛勤的劳作维持生计。后两度搬迁，但直到他上大学时，家境也不富裕，大学和神学院的求学费用，大部分还都是靠自己设法赚取。少时农村生活的艰辛，父母清教徒生活氛围的影响，自幼造就了他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品格，也使他在潜移默化中确立了基督教信仰，树立了为上帝奋斗终身的志向。大学和神学院读书时，在当时美国席卷全国的宗教复兴运动的感召下，他确定自己要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到异教国度去撒播基督之爱。几经周折，他选定并最终达成了到中国的心愿，临行前，他向国内的同行们郑重宣告：“我已决定把一生献给中国；我期望住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

狄考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863年7月3日，他偕新婚妻子在纽约登上了远赴中国的帆船，历经5个多月的漫长艰辛海上旅程，于是年12月16日抵达上海。稍作休整后，翌年1月到了山东登州（今蓬莱市），1904年随登州文会馆一起迁

潍县，1908年9月28日于青岛福伯医院去世，在中国山东生活和工作了整整45个年头，死后葬在了烟台毓璜顶美国北长老会墓地，实现了他年轻时的诺言。

狄考文在中国生活的近半个世纪时间，恰恰也是中国社
会经历痛苦蜕变的时期，他亲历了这一蜕变过程，也为这一蜕变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晚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做我所能做的使她迈向美好未来的事情。”毋庸讳言，狄考文年轻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也信守誓言艰辛备尝兢兢业业忘我奋斗至生命的终点，那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决心向中国传布上帝之爱，引导中华归主，带有浓郁的征服异教的宗教冲动。但同时，似也无需否认那时基督新教的海外宣教运动具有强烈的关切民生和人类所有民族进步的属性，尽管这一属性是基于所谓基督救世和上帝之爱。事实上，就狄考文一生来看，与其说其给中国带来了基督福音、上帝之爱，不如说他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他创办的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在清末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京师大学堂最初选用的西学教习，只有一名不是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山东大学堂更是登州文会馆的部分外

籍教师和学生仅用一个月时间办起来的 ;在兴办现代学堂热潮中 ,
登州文会馆的学生供不应求 ,纷纷被各省聘任为大、中学堂教师 ,
“踪迹所至 ,遍十六行省”(王元德、刘玉峰 :《登州文会馆志》 ,
广文学校印刷所 ,1913 年刊行 ,第 4 页)。除了办教育率先为
中国引进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 ,培养了一批为中国教育
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人才之外 ,他还为驻地及附近百姓和熟悉的
商人设计制造或联系购置了煤球机、麻绳机、织麻袋机、打谷去
壳机、磨麦粉机 ;购置和制作了大量现代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各种
实验设备 ;先后独自或督率他人译编了大量各级各类现代学校教
科书。为了培养引领中国进步的人才 ,他坚持用中文教学 ,要求
学生在学校过艰苦的生活 ,以免毕业后踏入社会难以适应当时的
生活条件。之所以坚持用中文教学 ,甚至一生反对中国学生学习
外语 ,源于他担心学生们学会了外语 ,毕业后会去为外国人工作
获得高收入 ,这与他在中国办学的目的以及他的人生追求背道而
驰。经过考察研究 ,他坚信中国语言完全能够阐释和宣传西方的
科学 ,为此他抽挤时间搜集长江以北各地方言 ,费尽心血编辑出
版了当时西方人学习中文的最好的教科书《官话类编》 ;而他担
任主席修订的官话和合本圣经 ,也是用普通民众能够听得懂的话

言即白话出版发行的。他历尽艰难所做的这一切，对于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更重要的则是为西方现代科学的传播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本传记的作者费丹尼，是狄考文大学和神学院时期的同学，一生从事神学教育工作并长期担任学校教育主管，在狄考文到中国后长期保持联系。狄考文逝世后，他接受了为其撰写传记的任务，利用狄考文的亲属、在中国的同工和美国的同学、长老会本部以及部分主日学校提供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狄考文本人的日记、自传手稿、通信、工作汇报等，全面介绍了狄考文的成长经历和近乎传奇的成就，史实可靠，读来令人动容。笔者虽不通神学，但读后觉得这样一个在中国辛勤一生的外国人的真实经历，以及中国社会那段痛苦蜕变过程的某些细节，十分有必要让肩负建设和谐中国社会、振兴中华重任的青少年了解，遂不揣冒昧，试译成中文。不当乃至错讹，祈方家教正。

译者

2009年2月2日

序

费丹尼博士嘱我为他给已故神学和法学博士狄考文写的传记做一简短序言，深感荣幸。我与狄考文博士契交 13 年，在中国访问过他。他是新中国¹的创造者之一，他的一生在基督教差会史中所占有的份量，每一位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都不能忽略。1863 年，他与年轻的妻子以及郭显德牧师和郭显德夫人一起从纽约启程，乘坐一艘速度慢且条件恶劣、很不舒适的帆船，经六个月的海上行程抵达中国。现在我们要了解还不是很久以前的 1863 年到远东的一次海上旅行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也还是很困难的。的确，这次旅程十分艰难，乘客中有些人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

年轻的传教士们到达了目的地后，困难并没有结束。当地人民不友好；生活条件极不方便；经受孤独和与家乡隔绝的极其严峻的考验；等等。但是，年轻的传教士们不屈不挠，怀着卓绝的勇气和信念开展工作。郭显德先生很快成为一名福音布道的领路人，狄考文博士也对福音布道工作深感兴趣，并协助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主要是对教育更感兴趣。1864 年，在他到中国一年以后²，

¹这里的所谓“新中国”，应是序言作者心目中不同以往的逐渐变革的中国。

²实际上这里指的是狄考文离开美国一年以后。狄考文是公历 1864 年 1 月

便与他具有同样天赋和忠诚的妻子聚集了六名学生。当时既没有教科书和校舍，也没有助手；但他们具有聪明的头脑和坚强的信念，狄考文博士和夫人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一所大学。他们建起了一所又一所小房子，虽然十分简单粗陋，但办学伊始却也足够用了。他们自己编撰教科书，自己动手制作大部分教学用仪器设备。狄考文很快即证明了自己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家和管理者。聚集到他周围的年轻中国学生日益增多。狄考文先生在中国办教育，自始即坚持要用中文教授，教学要完全彻底贯穿基督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历经三十五年坚忍劳作，不得不卸任校长职务之后，他满意地看到他所创办的学校被公认为亚洲最好的学校之一。他的继任者将学校迁至在潍县，规模更大了，现在已成为山东基督教大学文学院¹。

狄考文博士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在他从大学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除了一年暂时重

到中国的。这里说的一年以后，如果按中国农历计算，也不很恰切，因为按农历狄考文等人是癸亥（1863）年底到中国的，半年多以后即开办了学校。

¹ Arts College of the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是为在潍县与浸礼会青州广德书院高级班合并后的称呼，也称文理学院，亦即后来的齐鲁大学文理学院。

新担任交托给他的校长职务负责大学工作以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字工作上。他精通汉语，编撰了许多教科书和其它中文著述，有些是他的个人撰述，有些是翻译的他人的作品。他晚年担任圣经修订版中译委员会主席，怀着忠诚的热情投入到了这一工作。

狄考文博士是一位具有非凡品格力量的人；是一位教育家、学者和具有高超能力的管理者。费丹尼 (D. W. Fisher) 博士担任院长的汉诺威学院 (Hanover College) 早就认识到了他的能力和他所取得的成功，授予他神学名誉博士学位，1903年，他的母校又加授他法学博士学位。我们为差会工作再也得不到他的忠告而悲伤；但他的劳作所结出的丰硕果实，将永世长存，他的名字，将在中华帝国差会史上永远占有显著位置。

费丹尼博士撰写的这部传记，为差会和整个教会事业做了一项伟大的工作。作为狄考文博士的大学同学和一生的朋友，本身也是一位学者和高等教育家，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所述主题的充分领悟，以及令人赞赏的清晰才思和有力笔触撰写出了这本传记。我想所有读到这本传记的人，都会对这本书和狄考文博士在中国奉献一生所做的伟大工作，深感兴趣，交口赞誉。

布朗 (Arthur Judson Brown)

1911 年 4 月 13 日于纽约第五大街 156 号

前言

在有人要我为狄考文博士作传时，先前已经计划做别的文字工作，并且为此做了些准备。但我还是立即把原来计划做的工作放到了一边，立即投入了这本书的写作。我之所以这么做，事出有因。虽然，狄考文博士和我从来不是非常亲密的那种朋友，但从大学和神学院那些日子开始，直至他去世，我们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我过去偶尔与他通信，衷心地赞同海外差会事业，也非常注意搜集他所取得的成就方面的信息，并异常荣幸地正式授予他第一个荣誉称号，他的名字从此挂上了神学博士的头衔。作为他大学的同班同学，我与其他尚健在的人公认他是我们最感欣荣的几个人之一。在我当了汉诺威学院院长之后，他立即写信给我，建议我有暇时访

问中国，用声音和文字支持那里伟大人民的福音化事业。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写信来对到中国访问做了广泛的进一步说明。接着，一切都出乎意料，因此，当受邀写这本书的时候，除了顺利地答应下来，我还能做什么呢？

在这本书中，我的唯一目的是向读者实事求是地展示狄考文博士作为一个男人、一名基督徒、一位海外传教士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常常为了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狄考文博士的一生而引用他自己的话来叙述。除了这些之外，我还努力既不隐瞒也不夸大值得在本书中留下一笔的任何事情。在搜集整理资料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对传主和他的工作的感激之情与日俱增。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假如本书不能够使任何用心阅读的读者了解到这一点的话，那就是笔者的错。如果是这种情况，则是叙述有缺陷，而不是要写这本书有什么不对。

狄考文博士的许多亲戚和熟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供我自由地使用，这里不敢一一提及他们的名字。然而，应当对柯克伍德(J. M. Kirkwood)夫人¹表示感谢，本书第一章“故乡”的大部分内容就是根据她在本传记写作之前完成的专题论文编写而成的。这里也要感谢狄考文夫人艾达(Ada H. Mateer)²，她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各方面的帮助。首先，她把手头已

¹ 狄考文的大妹妹Jennie，作者写这本传记的时候她还健在。

² 狄考文第二任夫人。

有的资料加以整理，以致笔者在写作期间一直心中清明，毫不费力；其次，她本人亲自动笔写下了大量补充材料，并提供了明智的实际性的建议。

费丹尼

1911 年于华盛顿

第一章 老家

“那里有我少年时代所有美好的回忆和友谊”。——摘自 1857 年 3 月 4 日日记。

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本书所要讲述的生活和工作的主人公，1836 年 1 月 9 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离舍尔曼斯顿 (Shiremanstown) 不远，舍尔曼斯顿位于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哈里斯堡以西数英里处。

狄考文的出生地坎伯兰山谷，是我们国家最美丽的地区之一。山谷起自从狄考文的出生地几乎就可以看到的伟大辽阔的萨斯奎哈纳河 (Susquehanna)，略偏西南奔向远方，经钱伯斯堡 (Chambersburg) 出宾夕法尼亚州境而去，经由黑格斯顿 (Hagerstown)，抵达尽头，与另一庄严的历史名河——波托马克

(Potomac) 河融为一体。从地理因素上说，远在弗吉尼亚的壮丽的山那都(Shenandoah)山谷，依然是坎伯兰山谷的延伸。整个坎伯兰山谷，坡势平缓，沟沟梁梁相连，土地肥沃，农业极其发达，到处是极清澈的泉水、潺潺奔流的小溪，点缀着伐木工人留下的小型森林公园、舒适而雅致大方的农舍，景色十分诱人。繁华城镇和乡村中的教堂、学校以及现代文明的便利设施，说明这里的人民具有崇高品格。所有这些，自然地构成了一幅宛如镶嵌在相框里的风景画，蓝蓝的天空，绿树覆盖的山岭宛延起伏、疏密有致地遍布整个山谷。

确实，这位刚出世的婴儿第一次看到他周围的世界是冬天，外面的世界只有等到春天才会褪下白妆，穿起色彩斑斓的衣裳。二十八年之后，几乎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历经艰难的海上行程，踏上了中国海岸，在大雪覆盖、看不见道路的土地上摸索前行，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要在这周围生活和工作一生，并要长眠于此。当他 73 岁去世时，虽然他所为之祈祷、期盼和辛劳一生的神的春天还没有到来，但许多迹象表明，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狄考文的父亲约翰·马蒂尔(John Mateer)就出生在这美丽的坎

伯兰山谷里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周围的大片土地，原来是最初到这里定居的马蒂尔一家开垦的，写这篇传记的时候，几乎已经全都不为马蒂尔家族所有了。狄考文的母亲出生于与坎伯兰县相邻的约克 (York) 县，原名玛丽·纳尔逊·迪万 (Mary Nelson Diven)。他们都是苏格兰-爱尔兰裔的后代，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两州的发展繁荣，应感谢这里有这么多优秀的苏格兰-爱尔兰裔后人；数代坚强、高尚、虔敬的苏格兰-爱尔兰裔人，在这里繁衍生息。

狄考文出生时，他的父母住在一幢木屋里，这幢木屋至今还在；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木屋损毁已相当严重，但依然能够看出，尽管简朴，当时对这个小家庭来说，还是个舒适的住处。

住在这幢木屋的时候，狄考文的父亲开办了一个水磨房脱苜蓿籽。狄考文曾回忆那时的情形说，他经常盼望像他这样的小孩子什么时候能长高到可以车更多的水，让磨转得更快。这种孩子气的想法，预示着他成年时期在机械方面的杰出能力和多才多艺。

狄考文兄弟姐妹七人，五男二女，他居长。按年龄说，他们依次是狄考文，詹妮 (Jennie)，威廉·迪万 (William Diven)，约翰·劳瑞尔 (John Lowrie)，狄乐播 (Robert McCheyne)，霍勒斯·纳尔森 (Horace Nelson)，莉莲 (Lillian)，其中詹妮、威廉、狄乐播、霍勒

斯四人现仍健在。七兄妹中，狄考文与狄乐播成年后作为美国北长老会的福音传道士在中国山东工作；约翰先在上海长老会出版社(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即美华书馆工作五年，后来到北京公理会出版社 (Congregational Press) 工作，在那里去世；莉莲先是在登州女校教书，同美国南浸信会的沃克 (William S·Walker) 牧师结婚后，又到上海一所女校教书直至丈夫因健康原因被迫返回美国；威廉很长一段时间强烈要求从事国外宣教事业，后来接受劝告不情愿地经了商；詹妮同一位极有前途的年轻长老会传教士结了婚，夫妇要求并被批准到中国工作，后由于健康原因留在了国内。数年以后，丈夫病逝，再嫁了一位很有才华的大学教授。霍勒斯是伍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ooster)教授，也是一名开业医生。

极其简要叙述了狄考文兄弟姐妹引人注目的生活和工作，人们可能很想更多地了解一下关于他们父母的情况，了解培育他们成长的家庭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父母少时每年都在农闲时上农村学校开设的短期班学习，接受了农村学校所能提供的基本教育。此外，他们的母亲还在哈瑞斯堡一所极好的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双亲年轻时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养成了注重广泛阅读的习惯。

结婚以后，他们都成了基督徒，狄考文幼年即在他们家附近的老“银泉教堂”(Silver Spring Church) 接受了洗礼。后来，狄考文的父亲成为他们加入的长老会的治理长老(ruling elder)。由于他很有能力，因而极受尊敬，教会的牧师格外依赖他的公正意见。他拥有优美的男高音，极好的乐感，领导一个唱诗班多年。这家教会里有的一般信徒对基督教义和历史有着较好的了解，有的则对圣经更熟悉一些。教会有个图书馆，狄考文父母经常在这里借书带回家里；全家人都订购和阅读宗教报刊，因而都熟悉各教会开展工作的情况，了解福音在世界上的传播情形。

狄考文的父亲经营农场，勤恳节俭，精打细算。农场产量不是很多，但他精心栽培，所有产品质量优良，因而尽管一大家子人口，可还是积累了相当财产。虽然最初他不愿意孩子们一个个离开家庭，令家里农场失去了帮手，但他还是支持每个人自己发展，当孩子们成功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时，他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高兴。

狄考文的父亲 1875 年在伊利诺斯州蒙墨思去世。已经在中国的狄考文得知噩耗后，写了一封措辞优美的家信给他的母亲，他在信中说：“父亲的死反映了他一生的显著特点——谨慎、沉着而

自抑。他死得正直，死得其所。他不必捎信给我和约翰；我们早就知道他‘信耶稣死去’，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怎样活着的。

通过阅读我掌握的档案材料，可以确信狄考文的母亲更具特性，或者至少可以说她给孩子们的印象更深刻。在狄考文最后一次回国的时候，当被问及谁对他的一生影响最大的时候，他立即回答说，“母亲”。他长得非常像他的母亲。如果人们想他在性格方面与母亲有些不同的话，那么或许他多了一点他父亲的理想，少了点他母亲的强烈的现实主义。他**母亲**的某些最明显的性格特征，可说是得自于他的外祖父威廉·迪万（William Diven）的遗传。例如，她认为教育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狄考文的外祖父在他那个时代，对于远离城市在农村生活的人来说，是个有相当文学造诣的人；在后来他把家搬到狄考文父亲这里时，带来了一大批优秀书籍，为狄考文家提供了丰富的闲暇读物。这些书包括像莎士比亚、彭斯¹等著名人物的作品，虽然那时狄考文兄弟姐妹们还读不了这一类书，但他们经常从外祖父有选择的讲述中了解了这些书的内容。早在狄考文的母亲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他就非常渴望让这个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如果天气太坏她自己不能到学校

¹ 全名Robert Burns ——罗伯特·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

去，他就背着她送到学校去。狄考文的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她上学太少；据说她 70 岁以后，有一次做梦她被送到霍利约克山 (Mount Holyoke) 学校读书，醒来流着泪发现自己满头白发，原来这只是一个梦。尽管孩子们上学要拖累她付出大量心力和体力，不停奔波操劳，但她要孩子们不断深造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她自己渴望受高等教育，但从未达到目的；孩子们受到了高等教育，她感到极大的满足。除了教育一项，其他她所设定的各项目标，都很好地实现了，她一生要求自己做事持之以恒、遇事坚强、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她十分虔敬，完全而彻底；她的这种虔敬是一种原则，而不是一种情感。尽管她明显地离救主近了，这种虔敬转化成对救主的自觉的爱和忠诚，但她虔敬的目的是要发扬神圣上帝的无限荣光。她比丈夫多活了 21 年，79 岁高龄时去世。当她在中国的孩子们得知这一噩耗时，他们主要悲叹的是：“没有她的祈祷，我们怎么办啊！”



狄考文母亲

狄考文大约 5 岁时，父母在现在亚当斯县境内约克温泉(York Springs)附近的盖茨堡(Gettysburg)北边 12 英里买下了一个农场。这个农场离狄考文的出生地约 20 英里，位于坎伯兰山谷之外。即使现在看来，那也是偏远的地方，从最近处的一个火车站，还要做很远的火车才能抵达，那时候这里是如此偏僻，他们一直把

搬进的新家叫做“修道院”。狄考文一家在这里一直住到狄考文大学毕业。随后，他们又第二次搬家，这一次更远，搬到了西宾夕法尼亚默瑟县（Mercer County）。再后来，他们搬了第三次家，这次迁到了伊利诺斯州。本章开头引述狄考文所说的有他少时“所有美好的回忆和友谊”的地方，指的就是他在亚当斯县时候的家。

狄考文家在亚当斯县的农场，尽管不是很大，土质也很一般，但狄考文一家仍然在这里投入地进行经营。通过耕作，把地里的碎石清理出来，堆成了厚厚的石堆，孩子们在这艰难的经历中训练了在小事情上的耐心和勤勉耐劳精神。孩子们中至少两名年纪大点的经常被哄着做类似“背诵部分《威斯敏特小教理问答》和大段大段的圣经经文”这种枯燥乏味的苦差事。然而，另一类真正的苦差事，却变成了全家人共享的深秋收获庆典，孩子们尤其兴奋。这就是在森林里摘取山核桃树上的干果。一个秋季可以采集 50 或更多蒲式耳，这些摘来的山核桃卖掉后可以为家庭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农场的一边有一条美丽的河流，依然是印第安人的名称，叫做波玛圳（Burmudgeon），门前则有一条小溪，狄考文就在这些地方钓鱼、捕麝鼠，做小水车车水，学习游泳。他们的旧居以及马厩坐落在一处高地上，都是用红砖建的，和过去在宾夕

法尼亚东部的差不多大。这些房屋和马厩现在仍在使用。虽然岁月流逝，人们对有些事情不怎么在意，但狄考文一家在那个时候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给邻里树立了好榜样。“这一家子一直往前奔”，柯克伍德 (Kirkwood)¹夫人说，“一家人都很勤奋，家里家外使用的工具大都是自己制作的，很多过去都是委托工厂或店铺作的工作，他们都自己做。必要的时候，母亲不仅出主意创制这些工具，而且还自己动手制作。早晨，全家人都起得很早，甚至夏天的时候都还得点着蜡烛吃早饭，在太阳出来之前，就为这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然后一直干到晚上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为止。”马厩不仅是他们饲养马和家畜、存放农田里产品的地方，还是他们制作大部分农活用具的场所。在这里，狄考文第一次实践了他的机械天赋，有时候制作采棉机和手推车，有时候制作农田里的工具和少年人玩耍用的各种物件。

他们在家里举行的礼拜仪式，一天两次。一次是早晨，常常是天还未放亮的时候；另一次，则是晚上天完全黑了的时候。在这样的家庭礼拜仪式上，通常并不仅仅是读圣经和祈祷，也要唱赞美诗，父亲的优美嗓音和领唱能力，使得他们的赞美诗唱得更

¹ 原作者注，柯克伍德夫人即Jannie。而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Jennie是狄考文的大妹妹，作者写这本传记的时候她还健在。

具效力。当然，安息日全家无论老幼，尽可能地参加不远处长老会教堂举行的礼拜。但那里并非总是举行宗教仪式。在旧式停止一周工作的方式改变以后，遵守安息日还是很神圣的，但却做一些特别的宗教事务。柯克伍德夫人与狄考文年龄接近，足以在这一家人中成为狄考文的“好朋友”，她写道：“在那些年记忆的生活画卷中，有一幅是安息日一个很大的、空气畅通的农家厨房场景。一张桌子放在两扇门之间，门外是洒满树阴、鲜花遍地的院落，活动的桌面上摆放着‘斯科特’(Scott) 和‘亨利’(Henry)。母亲就坐在桌边，桌上摆放着摊开的书本，这些书都是为她自己和孩子们学习圣经功课用的。父母和孩子们都去听一位牧师的课，那里使用旧本《主日学校联盟问题集》(Sunday School Union Question Book)。这本问题集里有许多附注，要求孩子们都掌握。年龄大些的人通过圣经来理解这些问题，孩子们则需要记忆。在孩子们小的时候，不经过反复强力记诵激发联想，有些长的附注是不可能复述出来的。”这是这个家庭里每个孩子都要经过的一部分宗教训练，到了孩子们能阅读的时候，就让他们背诵《威斯敏特小教理问答》，这并不是为了勉强回答出某些问题，而是为了把他们全背过，不管多么长或多么难，连一个冠词或前置词都不能错。

关于这个家庭里考文这个孩子，流传有许多故事，其中有些就预示着他后来的性格。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当狄考文一家搬进“修道院”的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原来住在那里的已经去世的人闹鬼，这个去世的人的坟墓就在约一英里外的一处旧的荒废了的圣公会教堂院子里。那座坟墓沉陷了，而且听说不会再填起来了。也有谣言说，在阴沉沉的树林里，黑夜里有个无头的人在逛来逛去。然而，狄考文那时经常在安息日下午到那个从不关门的院落里，去看那里的圣经、书籍和桌子——这些东西在很久以前停止礼拜仪式之后就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动过；或者是到那些坟墓中间逛来逛去，摘掉墓石铭文上的苔藓，以便看看谁是活的年纪最大的。当然，这是个很多人夜间不能来的地方，因为不是说有个不知疲倦的白影一直在埋死人的地方晃动吗？可是，狄考文却习惯于在深夜从这里飞跑，跑到心跳加速。有一次，他在漆黑的夜晚到了这里，爬上了坟地的围墙，决心就在那个极其荒凉可怕的地方坐者，直到弄明白迷信的人们畏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为止。幽静的夜间，猫头鹰的叫声，以及其他夜里的声音格外刺耳，但他成功地通过了他选择的考验，赢得了值得为之付出的胜利。他用这种富有朝气的方式训练自己，为到中国接受更

严峻的考验打下了基础。

第二章 造就男子汉

“据说一个人在完成了大学学业之后，他才足以明白自己的无知，事实的确如此。”——摘自 1857 年 1 月 15 日致母亲的信

上面引用的这封信是狄考文满 21 岁一个星期后、读大学四年级几乎过半时写的。在这封信的后半部，他说：“进步和提高不必也不应该只局限于大学里。只要我们活着，就应该设法增长知识。”就此而言，叙述他大学毕业以前的情况，我以“造就男子汉”为题，或许有些武断。

先撇开其他问题，这里谈一下他身体和心智方面的天赋。从身体条件来看，他很特别，既没有遗传父母的弱点，本身也没什么弱点。70 岁生日的时候，他给国内一位近亲写了封信，说：“我不仅还活着，而且格外健康。”他从没有因患什么病而长期卧床。同时，我们一定不要把这理解为他有一幅铁打的身架，似乎除了要命的病以外，永远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在他有关他在大学和神学院时期的那部分日记中，经常有关于疲倦情况的记述，他把感觉疲倦归因于自己的道德情操，对自己进行反省，但对于一名内科医生来说，疲倦就是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征兆。在他第一次去中国的海上行程中，糟糕饮食、缺乏锻炼以及受虐待，使他一度得了消化不良症。偶尔他也患痢疾，有一次还患了丹毒。

他从不把恶劣的环境当回事，以至不知道随时增减衣服、被褥等保护自己。然而由于继承了父母的强健体魄，以及少年时代农村生活的磨练，使他能够忍受艰难、困苦和烦扰，在中国生活四十五年。

关于他的心智天赋，如果说他有天赋就意味着他天生就能做一些其他人需要学习和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重要事情的话，他会是第一个否认他是个“天才”。如果说他在做什么事情方面有些特长算是天赋的话，那就是他在运用科学、操作机械或许还有数学方面是个天才。毫无疑问，他具有杰出的天资，尤其是在运用科学方面。可是，他本人认为官话著作方面也许是他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但他却没有不需要耗费时间、付出艰苦努力、长期坚持不懈地学习就能掌握外语的天资。在大学里，他最出色的功课不是拉丁文或希腊语。在中国，其他一些传教士经过短时期的准备就能用当地语言传教了，而他完全掌握中文却是他艰苦努力多年以后的事情。

他在身体心智方面的天赋，概括说来，身体方面，尽管并非是特别强壮，但却可以说是具有良好健康的体格；心智方面则是个有才能、有魄力的全才，虽然他自己不认为比别人优越，但却

可以肯定地说要强于一般大学的学者。

关于他的精神和意志方面的特质，最好留待本书后面讲述。

在造就男子汉过程中，天赋仅仅是可以利用的原材料。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依靠机遇和利用机遇。国内少时农村的生活环境，对狄考文后来的生活方式和性格有极大影响。某些杰出的品质，早在农村生活时期就养成了。

在狄考文发展过程中，其他一些因素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离“修道院”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有一所乡镇学校，校舍是一座小型砖建筑，“既没装饰，也不舒适”，教学设备大都很粗糙，每年只开5-6个月时间的课，而且是在冬季。家里和农场里再忙，也从不耽误狄考文兄弟姊妹到这所邻近的学习中心读书。当然，这里的教师一般说只是能指导小学生学习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知识以外课程没什么规定。但是，事有凑巧，有两个冬季，狄考文遇上了这里的男教师詹姆斯·杜菲尔德（James Duffield），在那所学校上过学现在还健在的学生把这位教师描述为“他那个专业领域的天才，在他那个时代遥遥领先，比他的前辈和后备都优秀多了。从外表上看，杜菲尔德很笨拙，很害羞。除了在课堂上，他那一双大手和两只大脚总是碍事；一旦到了课堂上，他会突然自由灵活

起来，全身心倾注于教学，机警、充满活力，满腔热情，十分熟练，每个问题都讲得生动有趣，他所显示的这种理智的力量，给每一个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代数那时并不是正式的教学内容，但无疑来访的纯朴农民却以为学校里的男孩或女孩都学数学。有一天，这位教师的朋友——一个学究式的男子在考试时来到学校，这位教师很吃惊，问他的朋友是否愿意看看他的一个学生解数学题。他早就知道狄考文酷爱数学，并在课余时间指导狄考文学习过一些数学课程，感觉很满意。在得到了这位来访者的肯定答复后，狄考文走到了黑板前，很快写满了半黑板，解出了一道数学题。来访的这个人很吃惊，也很高兴，接下来就给狄考文出了一道题又一道题，其中有些是通用的教科书中最难的，只有狄考文能解出来。做出考试三个主要部分的题一直是件难事，来访的人、教师和学生对狄考文把题都解出来感到非常高兴。无疑，这位乡村教师对于开发狄考文的数学能力、或许对开发狄考文男子汉气概和一生其他智力天赋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狄考文 17 岁时开始接受较高级的教育，进入设在离“修道院” 8 英里远的亨特斯顿 (Hunterston) 的一所小型专科学校。迈出这一步，是母亲令人激动的支持的结果，我们前面说过这位母亲求

学的热情。他的父亲，那时可能更愿意他留在家里，帮助料理农场。数年时间，是否不应该违背父亲的意愿这一问题，有时使他陷入沉思。因为，他在那所学院读书时，春季、秋季以及收获时节，都回家帮忙干活。

他第一学期学习拉丁文，第二学期学习希腊语，数学也继续学得很好，因此显然他是向往在学校学习的。但是，由于经济拮据，在 1853-1854 年的冬季，离开了这所学校，到离他家三英里的一所乡村学校教学去了。在应同学要求为他们大学毕业四十周年时写的一份简短的自传手稿中，他写道：“这是一段艰难的经历。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外表看上去要更小一点。那里的许多学生都是青年男、女，比我大，而且在那一带有许多粗暴行为。不过，我坚持做我自己，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获得了比我一生任何其他时期都多的经验。”

学校关闭之后，他又回到亨特斯顿专科学校读书，这时候学校已经转归莫塞尔 (S. B. Mercer) 掌管，他发现莫塞尔是一位特别有能力的教师，无论是学识还是鼓励学生学习方面，对他们来说都可能是最好的老师。1855 年春天，莫塞尔先生离开亨特斯顿学校，去了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美瑞兹镇(Merrittstown, Fayette

County, Pennsylvania), 在这里负责道莱普斯希腊语学校(Dunlaps Creek Academy)。由于对老师的依恋, 也因为打算去位于费耶特邻县的杰斐逊学院(Jefferson Academy) 读书, 狄考文就和莫塞尔一起到了麦瑞兹镇。在这里, 他和其他同学一起在莫塞尔夫妇的房子里住了下来。他教两门课, 一门几何, 一门希腊语, 挣取学费。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 他入亨特斯顿学院学习以来, 一直是减免部分住宿费。从到亨特斯顿学校学习直至神学院毕业, 他都设法小部分依靠家里, 大部分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尽管他通过劳动有自己的收入, 但生活相当节俭。在麦瑞兹镇时他公开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是在他入杰斐逊学院读书几个月以前的事。他认识了长老会塞缪尔·威尔逊(Samuel Wilson) 博士——一位牧师和他钦佩与尊敬的人, 正是在这位牧师的鼓励和指导下, 他走上了信仰宗教的道路。

他在 1855 年秋季入设在宾夕法尼亚佳依斯堡(Canonsburg) 的杰斐逊学院三年级学习。在那个时代, 不像现在, 更习惯于招收高年级的学生入学。我早狄考文入学一年, 是在二年级入学的, 所以狄考文作为三年级学生晚入学了一年, 却正好与我在三年级的时候一个班。出现这样一些情况的原因, 一是那时候入学的条

件比现在低得多；学校执行起来常常很随意。另一个原因是学习内容要求有限，直到三年级，几乎还只学拉丁语、希腊语和数学，这就有可能使预备学校所开的课程足以让它们的学生进入学院学习。此外，狄考文有他的有利条件，像莫塞尔教授这样的杰出导师曾经指导过他学习，他本人也有过教学经历。他说：“我不具备到这个班学习的基础，但却设法挤进来了。拉丁语教授让我补一些我没学过的功课；我拒绝了，我记得我对他说，‘如果你下学期仍然认为我应该补课，我会照你说的做，否则我就降到二年级学习。’后来就没有下文了。进学院学习时我毫无经验，很害羞，只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农村小学校的孩子。那时对世事知道的很少甚至是一无所知。”

作为他大学的同班同学，与其他同校同学不同，与他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很了解他。现在我对他的样子还记得很清楚：高高的个子，金色的头发，俊朗智慧的面容，体态匀称，非常健康，虽然并不比其他人显得格外成熟。几年前在洛杉矶见到他的时候，除了岁月流逝留下的不可避免的印记，大量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外，我感觉他从外表上看并没有多大变化。在我看来，任何他后来认识的人都不难想象出他在大学和神学院时期的年轻男子

形象。至今我还能回想起，他到学院来的时候并没有表明他要在这所学院如何如何。他不出风头，但不久，他的功课，他的十足的男子汉气概，很显然令班里的所有同学对他刮目相看。我想他没有参加希腊字秘密社团 (Greek letter secret society)，尽管当时这一活动正处在高度繁荣时期。他在文学社做得很好，忠实地履行职责，但在行动上却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学院政治运动”，有时候这种运动很琐碎，有时候声誉不怎么好，尽管作为在后来生涯中进行“混战”的准备，并非是毫无意义的，但狄考文参加这种活动不多。那时我们都还不够成熟，能够尽情地开玩笑娱乐自己，但我们的表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还不成熟。1856年，狄考文参加了一次“福瑞梦 - 布坎南竞选活动” (Fremont-Buchanan campaign)。佳依斯堡召开了一次共和党人大会，我们有些学生以一伙滑稽的堪萨斯州“边界暴徒”(border ruffians) 的身份出现在人群中。可悲的是，我们的形象很丢脸。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那就是狄考文经常在学院活动中尽一些义务，但避开大部分愚蠢的事情，不但没有人把他看成是“呆子”，相反却赢得了我们的尊敬。

那时杰斐逊学院教职员很少，设备简陋。学院有将近 300 名

学生。至于说学院的成就，则在许多领域都有大量事实可以记述。指导这么多学生——常规课程的学习和相关工作，仅仅只有六个人，其中还有一个是指导预科的。这么少的教职员，如何满足这么多人杂乱教学工作的需要？他们尽最大努力，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能使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聪明的学生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教育。狄考文后来坦承他感谢学院的所有教职员，特别是感激我们四年级后半段还是院长的布朗（A. B. Brown）博士、继任院长奥尔登（Alden）博士、主讲数学的弗雷泽（Fraser）教授。学生们钦佩布朗博士在讲道坛内外的演讲能力。奥尔登博士与他的前任相比，在许多事情上完全不同。他曾长期担任教师，讲课简明扼要，非常清楚。狄考文后来说，从奥尔登博士的伦理学训练中所得到的收获，“要比从其他任何学科的课程获得的都多。”弗雷泽教授是那时最好类型的全能学者中的一位佼佼者，得到了即使不欣赏他讲课方式的学生们的热情崇拜。物理学课程那时仍然有限，只学一些基础的东西。班里的同学都记得，狄考文那时明显掌握了物理学课堂上和实验室里的所有知识和技能。从学院开设的课程里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的所谓“文化”，他也并不是从学院的教师那里学来的。然而，这又与学院的氛围有关，是学院激发智力、

发展个性的结果 ,而这也许正是近年来学院教学中所严重缺乏的。

那时是杰斐逊学院的全盛时代。不仅宾夕法尼亚和邻近各州的青年被吸引到这里来读书，西部和南部更远的地区也有人到这里来。我们离乡背井到这里来，一大群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凑到一起，除了上课，基本上是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没有奢侈品，没有舒适的生活。有足够的饮食，但很简朴，大家生活上花钱很少。学生们全都不搞体育活动，也没有现在大学生活中这么显著的校际之间的往来。但是，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来自于农村和小城镇，抱定决心好好学习，以便将来自立于社会。关于这一点，狄考文是一个典型代表。那时候他不能预见到自己将来做什么，但他确信除非充分利用现在有限的机会，就不敢指望将来的成功。他显然是一位抱定目的到这里来的男子汉。

1857 年一直是杰斐逊学院引以为豪的一年，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 58 个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获得了学院颁发的文凭。其中有像海斯(P. Hays)、马奎斯(David C. Marquis)、尼科尔斯(Samuel J. Niccolls)等教会领导人，他们都是长老会大会主席。在法律界，多德(S. C. T. Dodd)担任许多年标准石油公司首席律师，极其出色。有三人担任或长或短时间的大学校长。出了一批神学博士，

也有相当多的法学博士¹。其他一些人，虽然他们的工作没有获得像前述那些人那样的认可，我们这里没有列举他们的业绩，那仅仅是因为社会并不总是了解安宁平静生活的价值。在杰斐逊学院的一个班集体里待几年时间，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受教育方式。狄考文虽然只同我们在一起两年，但大家对他的能力和勤奋十分敬佩，他被列为优等生。与他一样杰出的学生是班里最年轻的一位，除了非同寻常的能力之外，也在进入学院之前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种情况在那时很普遍。关于狄考文，人们并不认为是他的天资为他赢得了优等荣誉，而是认为这缘于他稳健的智力与始终如一的艰苦劳作。学院指定狄考文代表毕业生宣讲告别辞，这是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但由于他本人的谦让，改由另一名优等生宣讲。

1907年9月4日，狄考文应两个月前在佳依斯堡聚会的杰斐逊学院尚健在同班的同学的要求，从中国潍县写来一封信，庆祝他们毕业50周年，信中说：

¹ 那时美国一些博士是在毕业以后，由一些学校根据其在相关领域里取得的成就授予的。像狄考文就是因为在中国传教、办学、著书等方面成就斐然，先后由汉诺威学院授予神学博士学位、由伍斯德学院和华盛顿-杰斐逊学院授予法学博士。

获悉你们聚会所做的一切，一种非常特别的感情油然而生，悲喜交集。把我和你们分割的距离，使这种感情格外地强烈。我在中国从不想家。除了我现在的地方，我哪里也不会去，除了我现在正做的工作，我不会再去做其他任何工作。然而，当我读了你们从佳依斯堡发来的信函，我有了以往很少有过的感情。我们相隔两半球整整 44 年了，可回想起那些在一起共同学习期间形成的友谊，随着一些同学的过世，感觉却越来越近，越来越浓。平时工作繁忙，无暇回顾往事，不过我时常会回想起学院学习的时光和同学之间的情谊。在我早年的生活中，极少有什么事情留下这么清晰的印象。我现在依然能复述我们班的同学名册，还记得我们是怎样坐在琼斯（ Jones ）教授（ 教物理和化学的 ）的旧教室里。我现在 72 岁半了，身体依然很好。中国已经接受了我。在余下的时光里，巡回布道、教学、翻译仍然是我的工作，但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教学上。不过，现在我们这些剩下的人，人生业已都过正午，夜幕将临。但是，我们有些人依然有工作要做。让我们努力把工作做好，能够为我们班的工作档案增添资料——我相信，这会是一份我们每一个同学都不会感到惭愧的档案资料。

出乎意料地蒙邀撰写这本书，我正在努力完成我们这位可敬

的同学的意愿。

第三章 确定终身职业

“我自少时就有一种朦胧的做传教工作的想法。虽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种想法，但已经有一半确定下来了。不过，在要继续教学还是去神学院读书的问题上，我还是拿不定主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祈祷，我向国外差会总部提出了申请，并得到了批准。”
——摘自 1897 年为杰斐逊学院毕业 40 周年而写的自传手稿

从上面引述的这四句话中，我们对狄考文要做一名国外传教士的过程有了一个概要的了解。像他当时这种情况，先前有教学经历的其他大多数教师，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对传教事业感兴趣，并进而又到国外去传教，这种情况还没有先例。他们会做出相反的选择——继续自己的教学事业。为了能理解狄考文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需要追溯一下“修道院”的情形，特别是需要回顾一下他母亲的情况。很幸运，柯克伍德夫人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因为这是这个家庭以外的人不可能做到的，即使有人能做到，也会有所犹豫。

早在结婚以前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考文的母亲玛丽·尼尔森·戴文（Mary Nelson Diven）听说美部会（American Board）早

期海外传教士之中一位长老福布斯 (Forbes) 博士呼吁援助夏威夷群岛 (Sandwich Island) , 就要了一个储存箱。那时没有多少海外传教士对约克县的迪尔斯伯格 (Dillsburg, York County) 教会感兴趣 , 戴文已经加入了这个教会。那时长老会海外宣教部还没有成立 , 美部会也没有派出多少传教士到海外去。当其为响应福布斯博士的呼吁而在教区教徒中游说时 , 她的牧师支持这位刚刚觉醒的年轻教区居民 , 与她一起热情地关注这一事情。她要求一个存储箱的目的达到了 , 箱子送来了。她心中支持基督教事业的种子这么早就萌芽了 ,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19 岁时 , 她同约翰·马蒂尔结了婚 , (John Mateer) , 她的婚姻是在主里面的婚姻 , 她同丈夫一起把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奉献出来侍奉主。他们的奉献并非仅仅是一种形式 , 他们铺设的祭坛从未再收起来。他们牺牲自我以保证孩子们的教育 , 目的十分坚定明确 , 这就是为了使孩子们将来或者是去向异教徒传布福音 , 或者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主工作。

除了订阅海外传教士的定期期刊 , 还弄到了一些海外传教士的传记 , 供全家人阅读。这位母亲不仅是要通过海外传教士文学唤醒孩子们对差会的兴趣 , 而且设计出了使孩子们不断加强和终

生保持这一兴趣的方法，提供了令孩子们把这种培养出来的情感付诸实践的渠道。海外传教士小储蓄箱就是这样一种途径，她在40年代早期这种小储蓄箱尚未在国内流传开来的时候，就亲手做了一个小储蓄箱。这个简朴的小木箱的确很古雅，外面贴上了印有小图案的墙纸。箱子放在起居室里壁炉架上，很快就成了孩子们奉献的圣地。没有辛勤劳作和极大的自我克制，孩子们是无法弄到往“海外传教士储蓄箱”放的零钱的。自从设立了这个小箱子之后，孩子们再也不乱花一便士，当格外幸运有可能弄到“十二分半美国银币”或“十一便士”投进小箱子里的时候，他们就感到无比快乐。投进小箱子里的零钱，都是孩子们克制自己，把家里给的用来买咖啡、糖和奶油的零钱舍不得花积攒下的。在那个时代，农村的孩子连一便士都很难挣到。每当打开箱子清点里面有多少便士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家庭一年中的“喜庆”日子。

这位怀抱诚挚之心的母亲就是以这种方式培养孩子们传教士精神的。当她的第一个儿子要去异教世界的时候，她没有拖后腿，完全支持他的工作。在她的孩子们一个又一个向海外宣教部提出申请的时候，她为神给她的荣誉而感到高兴，从未因孩子们要离开她而感到担忧。她只是为他们做一些更专门的祈祷，自己对孩

子们的精心培育就这样变成了对孩子们的信任。她在世时见到了她的四个孩子去了中国。

上面的陈述说明了这个家庭的长子为什么在少时就有做海外传教士的“朦胧想法”，以及他脑子里为什么会一直“有一半确定下来”要做海外传教士的决心。

他在杰斐逊学院毕业之后，还没有确定他的终生职业。在一直考虑加入差会并因此最终做了一名海外传教士之前的那些年，他在各方面都显示出对基督教海外传教事业的兴趣。事实上他明白当时的境况，要么去海外传教，要么继续教学，他似乎主要面临这两种选择。在从杰斐逊学院毕业之前，他曾报名参加了赴新泽西州劳伦斯韦尔（Lawrenceville）学校教师团，自那以来，该校已经发展为一所规模很大、受人尊敬的男子预备学校。然而，他觉得接受条件不是很恰当。不幸的是，他的日记从 1857 年 3 月 4 日起到收到杰斐逊学院的公文约 6 个月的时间，一片空白，而从这时起一直到 1859 年 10 月 24 日——他已经在神学院安心读书止，也几乎没有任何他的可利用的个人信函。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的自传手稿中，他是这样说的：

离开学院后，我接管了宾夕法尼亚毕佛 (Beaver) 的一所学校。我发现这所学校办得非常糟糕，几乎什么都没有，以至于第一学期 (半年) 的收入几乎不够支付食宿费用。不过，我还是鼓起勇气，决心一定要办好它。我一边教书，一边做宣传，尽可能地交朋友。最初学校里有了大约 20 名学生，全都是走读生。当我在第三学期末离开的时候，那里有 90 名学生，其中 30 名为寄宿生。我办学已经得心应手，很容易赚到钱，但是我觉得我要应召去传布福音，于是，我卖掉了学校，去了阿利根尼 (Allegheny) 西方神学院，入学的时候，第一年上学期已经结束了。

神学博士米勒 (J. R. Miller) ——费城 (Philadelphia) 杰出的福音传教士，尤以其严肃而又通俗的宗教著作闻名于世，原本是狄考文在毕佛的一位学生。下面是米勒写下的关于他在毕佛学校经历的一段文字：

我刚进这所学校的时候，校长是狄考文。在那里的第一个晚上，我的房间尚未准备好，就同他住在一间屋子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夜里他对我——一个几乎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的想家的孩子——说过的鼓舞激励的话语。...我同他的接触，恰值我人生

至关重要的时期，可塑性极强，这时形成的任何品格，将影响我的一生。他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他个人对我的影响十分巨大。我想，如果检阅我的成长经历，会发现没有任何其他人曾对我一生产生过像他那样大的影响。

在毕佛，他终于决定他要应神召去为做牧师而学习，但神召并不是任何特别的外部信号或内心的经历。尽管他欣然顺从了神召，责任感使他下了决心，但也不是没有思想斗争。他意识到自己具有成功地做一名教师或者从事其他职业的能力，也绝非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名的抱负。但是，在经过长期、谨慎、虔诚的考虑之后，他确信他应该做一名传教士，因而便不再考虑其他可能向他敞开大门的职业。到神学院学习不久，他写信给母亲说：“我现在正在为您所说的真正伟大、光荣的工作做准备。尽管几乎不敢想从事这一工作就是我的职责，但却是我长期以来所盼望的。经仔细考虑以及很多寻求指示的祈祷，我认为我的职责是传教。”

如前所述，由于正在教学的原因，他比我到神学院晚了一年多，因此我不是他在神学院的同班同学。他比同年级同学晚报到数月之久，最初有大量拉下的功课要补，但很快他就步入了班里最好同学的行列。他的同班同学、匹兹堡（Pittsburg）的牧师舍

罗特 (J. H. Sherrard) 写道 :

关于狄考文，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他的心理优势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也深具灵性。在有些方面，他确实是最好的，高出他周围同学一大块。

他另一位同班同学、克利夫兰市 (Cleveland) 的牧师加斯顿 (William Gaston) 博士则说：

我们认为狄考文是我们当中头脑最清醒的人之一，在所有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不仅仅是一门课好，所有功课都是最好的。他为人做事爽快，但不轻率，而是总给人一种十分严肃的感觉。他乐观向上，总是想着上帝伟大的爱。...他不仅大学比我们绝大多数人早毕业一年¹，我认为作为大学生，虽然我们是神学院的同班同学，他在其他事情上也比我们优秀。他对生命似乎更严肃认真。我怀疑我们当中是否有人有像他那样的生命责任。我怀疑是否有人像他那样艰苦工作过。

¹ 这里的所谓大学，是指在入神学院之前所上的大学。如本章所述，狄考文杰斐逊学院毕业后，没有确定自己最终要做什么，到神学院读书之前，在一所学校教了一年多的书。

狄考文读书期间的西方神学院正处在它的鼎盛时期。他所在的那个班招生 61 名，全院招生每年都保持在 150 名左右。学院教职员仅有 4 名，以我们今天神学校所开设的专业课程规模，这几个人不可能完成教学任务；而更为严重的是，这四个人除了一名之外，其他人还都是依靠负责一座城市教堂所拿的薪水勉勉强强度日。但是，他们做的却要比现在可能想象的还要好，特别是在当时规定开设的必修课程有限制，所有学生们都跟班学习的情况下。艾略特(David Elliott)博士虽然年纪大了，但仍在工作。威尔森 (Samuel J. Wilson) 虽然资历浅，但也恰好开始步入他的辉煌期，博得了学生们的喜爱。翟克布斯 (Jacobus) 博士以其大众评论而闻名于时，备受赞赏。然而，这些教职员中给狄考文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布鲁默(William S. Plumer)博士。这并非是因为这位教师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都知道，布鲁默博士并非是一流的神学家。我们在他的课堂上，并不能经常获得广泛而深邃的知识。但是，作为一名教师，他仍然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如此深刻持久的印象，以致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一直为接受他的训练而感到高兴。在所有教职员中，他对学生的影响最广泛。我们不知道在美国长老会的各神学院里，除了普林斯顿的亚历山大 (Archibald

Alexander) 之外，是否还有可与他相提并论的教师。这种影响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其宏伟的人格中充满着最热心、最亲切的虔诚，有着对生活、对救主无尽的爱。那时的狄考文对布鲁默博士极其敬重爱戴，且终生不渝。

在精神生活方面，狄考文读书期间的神学院也空前活跃。1857-1858 年冬季，一场伟大的复兴运动席卷美国，横贯大西洋。神学院的情形要比社会上任何地方都更为明显，这对大多数学生的精神生活是极大的鼓舞。这一大复兴运动的结果之一，就是唤起了人们对海外差会的强烈关注。我现在仍然能回想起我们神学院当时的情形：一些同学向往到尚未有福音传布的国家传布福音，有人获悉那位就品格和学问而言名列前茅的身体健壮的同学已经决定向差会总部提出申请到海外传道，他有可能被选中，都觉得是件大好事。这恰是他大学和神学院生活的最大成就。

然而，即使在神学院，狄考文做出最后的决定，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在通过大量的内心探索和祈祷过程中大量的思想斗争之后，才做出这一最终决定的。大量的外部因素也推动他做出这一决定。教师们尤其是布鲁默博士，明智地使学生们认识到非基督教国家需要福音。海外传教事业的代表——海外传教

士和海外宣教总部的秘书们到神学院访问，这里有更多的年轻人
为海外传教士的精神所感染。在杰斐逊学院的时候，狄考文虽然
没有离群索居，但他几乎与任何同学都未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
在自传手稿中说：“我脑子里只想自己的事，几乎不与我的班以外
的同学交朋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太怕羞，放不开。”在神学
院的时候，他依旧相当矜持，只是同某些神学院的学生比较接近，
特别是与一个人走得很近，这个人就是赫维 (Dwight B. Hervey)，
他们一起在为一所服务的地区奋斗。他们似乎就这一问题开过许
多会。

1860 年 1 月 21 日，狄考文去了俄亥俄长老会，匹兹堡
(Pittsburg) 各教会都属俄亥俄长老会，在他上学时的杰斐逊学
院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了。但是，那时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要做
一名传教士。同年 4 月 12 日，他去了宾夕法尼亚的巴特勒 (Butler)
长老会 (因为她父母的家这时在巴特勒，是以要求转到这里来照
料这里的长老会事务)，并获准布道。然而，这时他依旧没有决定
要做一名传教士。他强烈向往做传教士，优柔寡断绝非是他的性
格；所以犹豫不定，只是因为那时他还不必最后拿定主意，他希
望自己避免承担不成熟决定的代价，事后后悔，或者是可能觉得

要撤消这个决定。

1860年夏季，他在匹兹堡各地讲道，其间有几个月去了布莱兹 (Plains) 和范蒙特 (Fairmount) 教会，接着回了一趟家。另外还到过伊利诺斯州。

秋季神学院开学时，他又回到了学校。他接受了一些任务，其中有一项是在调查社 (the Society of Inquiry) 讲一次道。他去讲了，而且讲得很好，学生们投票表示要把他的讲道稿公开发表。他在日记中说准备这次演讲，“加强了他要做一名传教士的决心”。圣诞节前停课期间，长老会海外宣道部的一位秘书威尔逊 (J. Leighton Wilson) 博士来神学院访问，在会议上大力激励传教士精神。他发现狄考文是一个渴望听讲并有所反应的听众。12月12日，狄考文写了封长信给母亲，因为不知道母亲是否知道了他要去国外传教的事情，在信中阐明了他要做一名海外传教士的心情。他说：“不直接明确地和您说明之前，我不会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接下来，他向母亲讲明了他那时的态度：

我一直考虑海外传教士的工作，但在最近两三年以前并不是很认真。自到了神学院学习之后，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确信我应该做一名海外传教士。这种信念一直在不断增强、深化，尤其是

最近一段时间。就我个人而言，我大致已经决定要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我认为我不是草率地做出这一决定的。放弃我在国内所可能有的各种前途，是经过相当认真考虑的。您可能对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困苦和自我牺牲都考虑过了，我需要大恩惠，我为此祈祷。但是，即使我在国内拥有各种有益的前途，做我确信要做的工作肯定也不会丢失什么。的确，做一名海外传教士要比在国内工作拥有更广泛的意义，是最令人鼓舞的。粗粗想来，可能不会做出做一名海外传教士的选择，但进一步仔细考虑了各个方面的因素之后，我想，肯定会做出另一种选择。

信写得很长，完全敞开了心扉，这是他只有面对母亲才能做到的。这封信是一位坚强、自信、成熟但又充满孝心、思虑周全的基督教青年和未来牧师向给予他生命的母亲的深情倾诉。

1861年1月7日，他收到了母亲的回信，同意他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只是指出了一两个并非不能克服的困难。在大约三星期后的学生祈祷会上，他找机会向同学们宣布他要做一名海外宣教士。不过，直到4月5日，离毕业还有两周的时候，他才完全正式地写了一封大家预料中的适当信函，向海外宣教总部表达了自

己的意愿。在写这一封信那天的日记中，于记述了这封信的内容之后，他接着写道：“这是我迈出的严肃、重要的一步。在这一星期里，我一边写这封信，一边又认真地把这一问题重新考虑了一遍，求神给予帮助和指导。我完全相信这就是我要做的。一直以来，我最大的担心是我不能情愿地去做我应该做的事，但我把自己献给了基督并迈步向前进了。”4月13日，他收到了差会总部的来信，总部批准了他的要求，但关于具体的出发时间和宣教地尚未确定。

狄考文的终身职业问题也终于解决了，这确实可以说是他努力争取的结果。他母亲希望他晚一年再出去，对此狄考文没提出什么不同意见。但是，事情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而是又过了两年多他才得以奔赴宣教地。之所以耽搁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爆发了内战，财政紧张，海外差会总部不可能承担任何额外费用。在这期间，大部分时间前景昏暗，他几乎放弃了从事自己选定职业的希望，尽管每想到这里心中就觉得悲哀。他强烈忠于联邦政府的事业，如果不是领有传教士开业证书，他几乎肯定会应征入伍。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他如果被征召就去当兵的决心。的确，在他等待期间，有一次成了到一个团去做牧师的候选人，幸运的是

他没有被选中。有几个月时间，他在匹兹堡周围地区各教堂传道，也访问过俄亥俄中部的一些城镇，其中有一个城镇就是特拉华（Delaware）——俄亥俄韦斯利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所在地。此后不久，他收到了特拉华旧派长老会（Old School Presbyterian Church）发来的去他们那补缺的紧急邀请。大约与此同时，也收到了宾夕法尼亚的范蒙特（Fairmount）和布雷兹（Plains）去他们那儿做牧师的正式邀请，但他谢绝了。他接受了特拉华的邀请，我猜想部分原因是那里给他留下了当有可能赴海外传教时的行动自由。在特拉华，他呆了 18 个月时间，直到最后，由于神的恩惠，他奉派“奔赴前线”，到中国去。

在特拉华教会服务的情况，无须详述。但是必须清楚地指出，狄考文在那里获得了高度信任。事实上，人们可以看到，那里的条件有利于训练他后来在宣教区所需要的勇气、耐心和忠诚。特拉华的教堂力量薄弱，甚至长老会基础也因有或多或少缺陷的新派组织而出了某些问题，内部困难使教会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狄考文去了之后不久，是否能恢复元气的问题便烟消云散，在他服务的末期，那里的教会再现了活力，比以前团结了，他们希望狄考文留在那里担任牧师。

1862 年 11 月 12 日，在负责特拉华教会期间，他作为特拉华执行理事会马里恩 (Marion) 地区布道师被派立为全职牧师。

1862 年 12 月 27 日，他在特拉华同俄亥州基列山(Mt. Gilead) 的布朗 (Julia A. Brown) 小姐在布朗小姐的舅父家结了婚。在此之前，他们经过两年互致友好信函，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后来他们的友谊成熟地发展为相互爱慕，在订婚 8 个月之后，他们结成了生活伴侣。狄考文在日记中说：“虽然不乏欢乐，但婚礼场面很小，很平静。”他又憨厚地补充道：“结婚还没有求婚一半难。”朱利亚——狄考文婚后总是这样称呼邦就烈，对他来说是一位杰出的妻子。她一生从事传教事业 35 年，无论是在自己的家里、在学校里，还是在教育她的中国男女学生、编写“音乐课本”、向妇女传道以及旅行布道方面，虽然体弱多病，大部分时间都遭受疾病的困扰，但她却总是有效地艰辛劳作，直至逝世。邦就烈去世后，她的丈夫把她安葬在登州城东的一块小墓地，紧挨着她同样献身于传教事业的姐姐玛吉 (Maggie)，那里也安葬着其他一些先去了的同道朋友。

他们结婚时仍然极不确定海外差会总部何时能派他们出去，确切地说，他们还完全不知道差会总部到底能不能派他们出去。

于是，他们策马旅行，去狄考文在西宾夕法尼亚的家，12月31日、星期三到了家。回家一星期后，狄考文收到了差会总部的来信，通知要派他们做好到中国去的准备。狄考文关于此事的记录值得全文摘录于下：

在我一生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如此出乎意料。冬天晴朗的天空一声雷鸣也不会使我比这感到更震惊。当我早晨来到祖父楼下的时候，接到了总部的来信。读了信之后，我上楼读给“我的宝贝”听。我想，不到三分钟，我们就都明白过来。我永远不会忘记，听完了信之后，她第一个喊道：“哦，我好高兴啊！”这是一名海外传教士恰切的呼喊：语气短促，有悲伤的叹息成分，但却坦率、高尚、富有牺牲自我的内涵；“哦，我好高兴啊！”我不会忘记那一刻、那张面容、那种表情。我虽然没说什么，但我感觉心情是一样的。我想我真的可以说很高兴。我毕生的渴盼现在就要实现了。我将在异教土地上度过一生并且死后要埋在那里。我本来已经完全做好了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准备，大部分情况下就像在特拉华那段时间一样，但突然间一切都改变了！我唯一后悔的是我不能年轻5岁。那将会使我有何大的掌握汉语的优势啊！但现在这样，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曾经对去海外传道感到绝望，在我如此强烈

地渴望工作时，却茫然不知上帝如此强有力地引领我前行，不知道上帝已经把我带到离工作如此近的地方了。现在，我明白多了。现在我见到了强有力的证明，我马上就要出去了。神没有欺骗我。他只是以我不了解的方式在引导我。正当黑暗得不能再黑暗的时候，突然明媚的阳光照射下来。这看起来是多么的奇特啊！路完全堵死了，没有资金派人到中国去，我也不能去了。突然，有两名传教士去世了，另一名健康出了问题，总部感到至少不得不派一个人出去，去替补他们的位置，就这样，大门向我敞开了。我将到中国去，上帝已经为我打开了通向那里的大门。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海外传教事业，做好了出去的准备，我要义无反顾地迈向目的地。我已经上路了，不能回头看。我不希望走回头路。不过，在这里布道一年半，周围确实有些牵挂。现在，我不能像我第一次离开神学院时那样轻易离开了。离开特拉华那些伙伴们对我来说将是痛苦的考验。我知道，他们将努力挽留我，但我想我已经拿定主意，我必须走，我高兴离开，我将会离开。主会为特拉华做出安排。我在那里的工作掌握在主的手里。我坚信主将继续把那里的工作安排好，我也坚信我在那里的劳作并不是毫无成效的。昨天是我 27 岁生日。我希望我的以后的生日在中国过。

主安排我在自己的国家度过了 27 年，请再安排我在中国度过 27 年！尊贵的主啊，请大大增强我在中国度过那些时光的力量吧！

这位坚强不屈、持之以恒、自觉自愿、克己自制、一心奉献的男子，终于确定了他毕生的职业。

第四章 奔赴前线

“如果没有其他方式回美国，而是通过这种类似的经历，那么是否能再见到我的祖国是值得怀疑的。”——摘自 1897 年的自传手稿

作为一名海外传教士，对他所要去的国家的选择，一直是他认真考虑和祈祷的问题。他在 1862 年 9 月 12 日的日记中写道：

最初，总部希望我去中国广东。这与我的意愿和先前的计划完全抵牾，但总部不派我去任何其他别的地方，直到上一封来信，

他们才表示派我到日本去。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去北印度或非洲，特别是希望到某个新宣教区，那里还没有开辟宣教事业，从而使我能够不受一些规章和严格指令的束缚。东亚的语言也很难掌握，在那里的人民中间的传教工作令人沮丧。

然而，两天以后，他写信给总部说他愿意到日本去。到最终明确确定他的工作地时，却变成了华北。指定他去的地方是登州，山东省一个开放对外贸易的口岸。

4 月底以前，狄考文夫妇一直留在特拉华。狄考文在这段时间里继续负责他的教会。向那里的人民做了动人的告别之后，他们一站站地缓慢向纽约进发。

在那时候，到中国去生活，这两位年轻的传教士要面临的告别事宜，是一个比我们现在几乎不可能意识到的还要严肃得多的问题。最难的是向他们的母亲和父亲、以及兄弟姊妹道别，兄弟姊妹中有些还是孩子，狄考文觉得如果不是半个地球的距离将把他们隔开，他也许能为他们做许多事情。

1863 年 7 月 3 日，他们终于在纽约登船，绕过好望角大南端很远，然后向东进发，几乎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北海岸，最后，经漫长的茫茫海上旅程，向北到上海。这一海上旅程耗时 165 天，

或者说是差两周就是半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们从未登岸。我们必须清楚，在 1863 年，苏伊士运河才刚刚开工，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尚未建造，也没有从我们西部海岸到亚洲的轮船航班。因此，我们不能责备海外差会总部用一艘帆船送他们委派的人出去。挑选送他们去中国的这艘船是一艘商船，虽然不是为了快捷运输而建造的快速帆船，但型号够大，质量不错，能够承受相当的航行速度。与狄考文夫妇同行的是郭显德和他的妻子，他们也被总部委派到登州。船上还有 6 位乘客，他们都不是传教士，船上职员除了船长等一干高级船员，还有 16 名水手。

乐观地说，这样的海上旅程也一定是单调乏味、令人厌烦的。乘客的膳宿设施必定匮乏，特别的舱房都是一些小密室，通风很差，坏天气时连风也不能透。船上唯一一个可以用来活动一下的地方是船尾楼甲板，约 30 英尺长，在这上面来回走步当然没有什么愉快可言，较大型船上的各种娱乐活动，这里完全不允许。在这样漫长的海上旅途中，食品的种类必然单调，而且也必定多多少少地腐坏了。当然，热带海域很热，离赤道以南的海域远了又冷，11 月和 12 月北上航行，也很冷。晕船是不可避免的。一伙性格志向如此缺乏共性的乘客和船员们如此之长时间挤在一个

狭小的空间里，是极不合适的，他们之间发生一些摩擦也是可以预料的事。

旅程中，这艘船也碰到了一些令人烦恼和危险的事情。他们在起航以后数星期内一直担心南部联盟的私掠船¹。一旦他们确信一艘误认为他们是美国商业的破坏者要将他们捕获时，他们既要慌张地做准备躲避，也有可能被捕获的风险。当 they 从纽约出发时，葛底斯堡(Gettysburg)战役正在进行，双方胜负尚是未知数。直到 10 月 15 日，他们被一艘比他们从纽约晚出发 11 天的船追上，才不再担心了。米德(Meade)将军打胜了，维克斯堡(Vicksburg)也攻下来了，他们无比激动和兴奋起来。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群岛外，遇上了激流，他们无奈被迫迅速驶向一座荒岛，岛外海滩布满了乱石，船长绝望透顶，要弃船逃难。上帝保佑，一阵微风吹来，使他们脱离了危险。旅程中没遭遇什么大风暴。有几次，倒是遇上了旷日持久的无风天气，这对他们的耐性是个严重的考验，在太平洋中，有一次 17 天才航行了 340 英里。

上述这些事情都不是船长和船员们所能控制的，传教士们则把这些当作是应该平静、耐心地去面对和经受的考验。但是，除

¹ 狄考文他们出发时，恰值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期间。南北战争爆发后，南部邦联即特许武装民船掠捕北方的商船。

了这些自然的因素外，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们还要受制于霸道、专制的船长，这个人除了航海知识外，其他方面很无知，言语粗俗、满嘴脏话，做事情暴虐、野蛮，可当遇上能够大胆面对、指责他的行为的人时，却又是一个不值一谈的胆小鬼。他不让船上的人吃饱，食品质量也很糟糕，这部分是由于他的吝啬、贪心，部分是为了满足他的恶毒性情。他憎恨传教士，似乎要尽可能地使船上的这些传教士觉得不舒服，他就特别开心。他几乎不能容忍像吃饭时祈福这样的宗教仪式，不能容忍在船舱里举行主日礼拜仪式，禁止所有人作任何宗教方面的事情，即使是在船员们中谈宗教的事也不许可。他能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嗜好而下作到搞各种各样的小卑劣手段，有时候甚至要他的那些高级船员同情他、与他一块合作。当我们尽可能地充分了解了这些情况时，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狄考文博士在年过半百之后，还在写给他的大学生的自传手稿中说：如果为了回美国要再经历一次出来时那样的海上旅程的话，那是否能够再见到他的祖国就值得怀疑了。

不过，这次海上旅程终于就要结束了。如果不是除了 3-4 个其他船员都由于缺乏适当的食物和虐待都得了坏血病，他们有可能提前几天抵达港口，坏血病那时即使在长途帆船旅行中都已经

几乎根绝了。12月16日，他们幸福地在中国靠岸，很快就被接到那里传教士和其他朋友们的家里。郭显德身体不适，狄考文一直认为朱利亚和郭显德由于在海上旅途中遭受的虐待，身体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

在旅程中，传教士们就警告过船长，说他们到上海后，肯定要他对在船上的行为做出说明。他们遵守了诺言。在同上海宣教区的传教士们、一位律师以及美国领事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对他进行正式指控。船长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来找传教士，吓得浑身哆嗦，祈求他们宽恕他。他们商定了下一次会面商量，但郭显德不愿见他，狄考文只好单独同他会面。他在日记里记述说：

我拿着已经读给上海领事听了的那份指控函读给这位船长听，并做了大量的评论和说明，同时要求他如果可能的话，做出解释或修正。在我的一生中，从未给人上过这样的课。我整整忙活了一个半小时，向他说明他是多么自私、卑鄙和无赖。然后，我给了他一份我建议要发表的文稿，那上面说明了他已经道歉，我们同意暂时不予起诉。他接了文稿，一幅极其可怜的样子请求离去，说这份文稿会毁了他。

第三天，他又来了，恳求狄考文的同情，宽恕他，不要让他滞留在上海，诱使狄考文同意接受他的私人道歉，并向纽约相关方面知会这件事就完了。数年以后，狄考文在去上海的一艘近海轮船上发现了这个家伙又当上了这他乘坐这艘船的船长。他立即废了船票，回到了岸上，直到又找到了另一只船才去了上海。

登州离上海 500 多英里。到登州的唯一办法是再坐一次船，沿海岸航行北上去烟台，从那里再陆路去登州。1864 年 1 月 3 日，狄考文夫妇和郭显德夫妇登上了“汕头号”近海轮船，向烟台进发。他们逆风而行，船上几乎没装什么货物。由于船上没有铺盖，这次他们不但晕船，而且挨冻。出发的第三天晚上，大约 8 点半钟光景，他们围着炉子坐着，以为很快就到烟台了，突然船底触礁了，响起了要引擎倒退的铃声。一下接一下地碰撞，直到似乎这艘船要破碎了。船长虽然不熟悉这条航道，但他凭借一艘沉船的桅杆安慰自己，设想那是一艘在烟台港停泊的船，刚刚进港，而他的汽船触礁了，离海岸大约 15 英里。我们还是用狄考文的日记来叙述他所经历的事情吧。

一片难以名状的混乱。船长自己慌了神，完全不能控制手下那些人了。他的船上职员和仆人大部分是中国人和马来人，丑恶

一面这时候暴露无遗。他们拒绝执行任何命令，忙着去捆包他们自己那点东西，同时把凡能拿的东西往自己包裹里放。这些人到处乱窜，看看什么东西能拿就拿，不能拿就毁掉。船上一片混乱，海上的海浪迅猛拍打着不能动的船，看上去很吓人，有把船打成碎片的危险。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大副和两名乘客（一名商人和一名英国海军军官）放下一艘小船，推着靠岸，他们成功了，并用一根绳索把船拴到岸上。他们发现，事实上我们离岸边比想象的要近得多。我们的处境十分狼狈，不知道该登上小船上岸还是留在大船上。我们大部分人主张留在大船上，但船长催促我们弃船登岸。在风还不是很大的时候，我们留在船上会是安全的，但在天亮以前风大了，我们就可能有生命危险。船长说他认为离烟台至多不过 8-9 英里远，他很想派人给那里送个信。最后，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大约在 11 点钟的时候，我们登上了一艘小船，顶着浪花登了岸。天气很冷，我们打开行李取出了毛毯，想肯定要用这东西来保暖。船上有我们 9 名¹乘客（我们四个²，韦廉臣³牧师夫妇和他们的孩子，麦克拉奇¹，

¹ 从狄考文在括弧内所作的说明看，实际上他所说的“乘客”应该是 10 名，而这里说是 9 名，当是未把韦廉臣夫妇的孩子计算在内。

² 这里应指长老会的四人，即狄考文夫妇和郭显德夫妇。

³ Williamson，英国浸礼会传教士。

这几位都是传教士；威尔森——Wilson，一位商人；瑞德尔——Riddle，一位海军军官）以及 6 名中国人。我们希望向烟台方向进发，找一个住处，让夫人们住下来，顺便也让郭显德先生休息一下，其他人继续赶奔烟台寻求帮助。根据这一计划，我们上路了，但很快就发现我们面前全是冰，没法走，不得不返回来，要从远处一座小山上走，越过这片冰地。到小山这段路走得很累，地上的雪有好几英寸厚，很多地方还有大冰块和成片的冰地。疲惫不堪地在走着、转悠着、争论着怎么找一条最好走的路，就这样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终于走到了几座小山前。我登上了第一座小山头，试图说服他们翻过山去，直接到内地，找个住家或是村庄。然而，其他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我们在山脚下走了近一英里。最后，我赶到了前面，告诉他们说除非离开海滩到内地去，是不能找到住家户或村庄的。然后，我们沿着一条地埂，顺着我们的脚印折回到了小山的另一边，最后好不容易说服了那些想坐下来的人，继续走，清晨的时候才看到了我们那些中国人去内地的脚印。很快我们就见到了一个村庄，这确实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冻得不行，脚还是湿的，非常疲劳，尤其是妇女。可是我们

¹ McClatchie，英国安立甘会传教士。

的困难并未就此了结，因为我们没办法让这个村的中国人允许我们留下。这时4点了，我们已经在冰天雪地里摸索着走了5个小时，受尽了折磨。但是，村子里的人家家大门紧闭，不让我们进家。韦廉臣先生和麦克拉奇先生可以和当地人交谈几句，但他们拒绝接纳我们。

在寒冷的早晨颤抖了约一个小时，我们终于进了一家简陋的小屋，但却没什么舒适的条件可言。屋子里有一铺火炕，几位太太设法在炕上暖暖脚。天放亮时，瑞德尔先生和威尔森先生启程去烟台，他们认为烟台离这里仅半英里远。这是韦廉臣夫人根据当地人的说法推测的距离。过了一会儿，麦克拉奇先生又出发了，他认为到烟台有三英里的距离。酒馆的人给我们送来了米粥和甜薯，我们这些人留下来吃早饭。

早饭后，我返回海边去照看我们的船和船上的东西。船一点事也没有，物品也都安然无事。我上船取了几件行李，韦廉臣到了海滩，把取下的行李运到村子里，村子与渔船之间至少相距两英里。然后，韦廉臣先生也设法上船拿下了一些物品，并运到了村子里。这一天天气很好，没有风，但我们担心会有大风，因为在这个季节这一地区经常有大风暴。如果来了大风，我们的船很

快就会被撕成碎片，所有的物品则都将毁于一旦。

我们现在开始寻找过夜的去处，找到了一处不是很舒适的地方。烟台（就在芝罘湾对面）来了几个英国人检查失事的船只，这艘船前段时间就在同一地点出的事，他们很厚道，送给我们一些晚餐——这是他们自己的晚餐，还给了我们一些皮货和毛毯。我们有一铺大火炕，5个人盖着毛毯，挤在这铺火炕上，我则打地铺睡在地上。这间小屋子的其他地方堆满了行李和中国人的各种废物。然而，因为太累了，前一个晚上连眼都没闭一下，所以我们睡得很舒适，很香甜，恢复了体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这样的寄宿条件也有理由心存感激。

那几个英国人给我们留下了24个熟鸡蛋和一些面包，这些就是我们的早餐了。早餐后，我立刻去船上，因为天气很好，打算尽可能多地把我们的东西取下存起来，等着有条件时运往烟台。当我到了海边小山顶上的时候，放眼望去，看到一艘汽船正向这边驶来，我想那是从烟台来的英国炮艇，心里高兴得怦怦直跳。我们终于得到了帮助，没有从陆路去烟台。无疑，我们的物品也保全了。

陆路去烟台28英里，而不是那些出发步行去烟台的人说的很

短的距离，但那些人坚持认为很近，在他们的鼓动下，开来的英国炮艇去接后面没走的人。经数次努力，炮艇将搁浅的“汕头”号拖下了水，可以安全地飘浮行驶了。从村里出发步行那些人又返回来，行李等物品也带回来放到了炮艇上，狄考文在汕头号船上又留了一夜，第二天到了烟台。他在日记里说，虽然郭显德非常虚弱，但海滩上那可怕的一夜，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妇女们从外表上看显然也没有受任何影响。他在日记中还提到了村子里有些当地人故意尽可能地令他们不快，而另一些当地人则非常厚道。他补充说：“以前从没遇到过像在这些当地人中这么无助的情形，我不能同他们说一个字。”

当然，在烟台他们受到了那里的传教士的热情欢迎。到烟台后的第二周的星期三，他们出发奔赴 55 英里外的登州，乘坐一种在中国来说是特别的交通工具——苦子，由于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马车道，这种交通工具在那一带很流行。所谓苦子，就是一种简单的有篷的担架，由一前一后两头骡子驮着，乘客在苦子里，随着两头牲口的行进晃来晃去，由着牲口的性子，毫无计划地在山区或平原的小路上这么走着。狄考文在日记中记述那次旅行说：

我们乘坐苦子走了约 15 英里后，停下来在一家中国小客栈过

夜。我们自己带了食品，要了一些茶，吃了一顿很美的晚餐，为了暖和和大家挤到了一铺中国火炕上安眠¹。第二天早晨醒来，天气很冷，直到大约 10 点才上路。我让他们把我乘坐的苦子倒过来（也就是让前面的没有遮挡的入口避开风），否则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来避寒。大约下午 5 点，我们又进了一家客栈，但很快就觉得很懊恼，没办法我们还得在这样的中国客栈里再住一夜。顺便说一句，这样的客栈，除了说它是在寒冷的夜里一个舒适的去处之外，别的简直不值一提。然而，我们还是很好地利用了它，第二天早晨又踏上了去登州的路，大约下午 2 点安全抵达。我们的旅程终于结束了，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工作地安顿下来了。

他们到了前线。时为 1864 年 1 月初。

¹ 从烟台到登州时，没有那么多的人了，这时应该只剩下狄考文夫妇和郭显德夫妇了。至于赶苦子的人，按当时的情况，是不能和雇主在一起休息的。

第五章 新家

“我们的新宅子现在建起来了，我们称心如意地住了进来。新住宅确实适合我们，我认为它将适合所有在我们以后来的人 ... 我祈求上帝允许我们在这里住许多年，祝福我们为了他的荣光做很多工作。”——摘自 1867 年 12 月 24 日给罗瑞尔¹干事的信。

根据 1860 年生效的《天津条约》，登州城作为对外贸易港口正式开放。尽管登州城有 7 万或更多的居民，比中国大多数城镇清洁、卫生，但除了一小帮传教士外，对西方各国的人民并没有

¹ Lowrie，美国北长老会国外布道会本部干事约翰·C·罗瑞尔博士——译者。

吸引力。登州港不能提供良好的泊锚地，所以对外贸易一直不能令人满意。

狄考文到登州之前，美国南部浸信会和美国北长老会都已经开始了在这里的传教活动，尽管规模很小。事实上，根据可利用的最权威统计数字，整个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仅有 100 多名有牧师职位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以及同样数目的女传教士。此外，有少量医生和印刷工。本地牧师约有 250 名，大约还有 250 名贩卖圣经等宗教书籍的小贩。所有本地牧师都宣讲福音，少数小贩也进行布道活动。全国有 16 处布道站，大约 100 处布道分站。中国信徒总计 3500 名。

整个山东，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仅有沿海的烟台和登州曾是打算开辟布道站的地方。1860 年秋，美国南部浸信会来到登州。美国北长老会的丹福思¹和盖利²先生紧随其后，翌年夏天，倪维思(Nevius)夫妇从宁波来到登州与他们会合³。

¹ Danforth, 又作但福思、旦福斯、旦福德、旦富德。

² Galey, 又作干理、甘雷、甘霖，

³ 据 1885 年来华，最初在山东青州传教，后至济南任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的美国北长老会方伟廉(William P. Chalfant)所作“山东的美国北长老会”(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hantung)一文，美国北长老会登州布道站是倪维思夫妇最先开辟的，丹福思和盖利到登州的时间晚于倪维思夫妇。详见法思远主编、上海广学会 1912 年出版的《中国的圣省山

登州人对外人的态度，确实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甚至直至今天的态度要友好一些。然而，要得到能住下来的房屋，却也是一件旷日持久的麻烦事。住处问题解决不久，丹福思夫人病逝，成为葬在登州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接着就来了“长毛反”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来了一帮入侵的强盗，使山东那一地区一片荒凉，大量人口死亡，这些长毛一直攻掠到了登州城下，致使登州城及周围乡村陷入贫穷、悲凉的可叹境地。美国南浸信会的两名传教士出去与劫掠者谈判²，结果被砍成了碎块。随后一段时间，谣言四起，说传教士向井中投放药物或通过其它手段施展妖术，这使许多本来有可能冒险前来听福音布道的人闻之却步，并差一点制造出严重的危险。在这之后，霍乱病严重泛滥，家家户户和街道上到处都有丧礼和哀悼情事。开始一段时间，传教士们没有

东》(*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第 235-239 页。

¹ 指捻军，民间当时也称长毛。

² 据法思远主编、上海广学会 1912 年出版的《中国的圣省山东》一书所载“花雅各牧师”小传记，花雅各是同美国圣公会 (the 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 的巴克(Parker)去捻军军营谈判的，而不是和“美国南浸信会的两名传教士出去与劫掠者谈判”的，详见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Compil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171,孰是孰非，待考。

得这种病，还能够为中国病人们做一些事情。但很快传教士们自己也得了这种病，于是他们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照料他们自己身上，忙着埋葬不幸的死者。第一个去世的是盖利先生，接着是他的孩子，随后是浸信会传教士的一个孩子。其他传教士或家属患这种病的慢慢都康复了。霍乱在中国人中流行的时间长，这使传教士们有机会实施治疗，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并因此消除了人们的偏见，打开了通向福音之门。有十个人加入了教会，这是北长老会在登州收获的第一批成果。但是，紧接着工作人员令人悲哀地损耗殆尽。先是盖利夫人带着她剩下的孩子回国了；接着丹福思先生由于健康问题也不得不离开；既而此前就长期身体状况堪忧的倪维斯夫人，景况越来越糟，医生命令她离开这里，于是她便和丈夫一起去了南方。这样一来，丹福思和盖利开辟登州布道站三年之后，在狄考文夫妇和郭显德夫妇到来之前，这里就只有梅理士（Mills）夫妇这一对美国北长老会国外差会本部派驻的代表了。

狄考文夫妇和郭显德夫妇来到之后，只能暂时入住梅理士一家已经住进的地方。梅理士一家住的地方是集中在一块儿的四个石头建的单层的小建筑，其中一处用作厨房，一处用作餐厅，一

处用作客房，最后一处是客厅兼作卧室。这四处小建筑虽然都集中在一块儿，但都是相互分开的，并没有相连接的房顶。四个建筑中最大的过去曾是供奉观音的庙宇，外国人称观音是中国人的慈善和怜悯之神。根据普遍的迷信说法，天空中充满了超人力的神灵，中国人总是敬畏神灵，他们的大部分宗教仪式都是为了使神灵们高兴。然而，在这些想象的不吉的神灵中，观音是个例外。关于观音，一直流传着许多神话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关于救苦救难的。中国人总是在特别需要的时候向观音发誓、许愿、祷告、献祭。部分由于妇女特别迷信观音，部分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慈悲是女性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不严肃的神话学中，观音就被塑造成了女性。当传教士们来到登州的时候，掌管观音堂的和尚正缺钱用，结果很容易就诱使他把观音堂出租了。这位和尚把观音塑像留在了庙里。如何处理庙里的塑像是个很实际的问题，狄考文从跟他一起住的一个男孩那里了解到了有价值的东西，解决了这一问题。当问及这些塑像能否对人造成伤害时，那个男孩立即回答说“不能”，理由是那个放在屋子里的最大的塑像，过去他们就在这屋子里说要把它埋到大门外面！原先那些其他塑像围有一道墙，不久就把这些塑像都推倒并以各种方式处理掉了。狄

考文说，那尊最大的观音泥塑像，大约四英尺高，重二百多磅，1870年还放在他的阁楼上。

新来的传教士家庭都挤到了梅理士住的地方很不舒适，也不利于急切要展开的工作。狄考文夫妇占用的餐厅，设计用作他们的居室，这是可以做出的最好安排。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汉语毫无成效可言，而汉语是开展任何直接的传教士工作之前必须掌握的。时间白白地浪费，狄考文非常痛苦，像困在笼子里的狮子焦躁不安。因此，当先前存放的倪维思先生的物品可以运走的时候，他便立即进行清理，紧接着就着手建造烟囱，把这一间屋子打理得井井有条，自己占用下来。这样他就慢慢地开始了他不熟练的当地技工经历。原来那间餐厅里没有炉子，由于天气寒冷，必须想办法取暖。在登州，不可能购买到取暖用的炉子，在烟台有可能买到，但很可能这时上海缺货，烟台无货可进。对狄考文来说，施展他技工天才的时机到来了。他说：

梅理士先生和我开始用马口铁制作炉子。我们以一个旧铁板炉底和炉顶作基础，做成了后来证明非常好用的炉子。做这个炉子，我们一共用了160个铆钉。接着，我独出心裁地费尽心机要

造一部机器，把当地烧的优质煤压制成煤球或煤块，以便我们使用。制作煤球很简单，用一种树胶水把煤掺和一下，调成煤球就行了。这样做出来的煤球，非常松软，有很多气孔，很好烧。由于那时正值中国新年，我们找不到教师，于是我就索性动手做这种压制煤块的机械。困难是相当多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合适的工具，我成功地制作了一台把煤压制成结实方块的机械。最初，看样子好像失败了，因为虽然把煤压制成方块很成功，但似乎不能把煤块顺利地取出来。然而，这个障碍排除了，机械运转良好，看起来是台不错的装置。

后来，他对这台机械装置进行了改进，一个小男孩就能用它非常迅速地制作煤块。

传教士们的住处尽可能作了最好的安排，但还是过于拥挤，有必要进行某种缓解。郭显德夫妇对没有适当的住处感到失望，回到了烟台附近，永远未再回来，对烟台来说，这是个巨大收获，但对登州来说，却是个巨大损失。梅理士先生则要为自己和家庭找所新房子，由于当地人民不愿意和官员不允许可恨的外国人获得长久的立足之地，因此久经磨难，最后才终于找到了一处。但

要住进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中国的房地产，一般最好的房子只是一层建筑，通常是泥土地面而不铺地板，仅有屋顶而没有天花板，或者是只有个薄薄的麦秸或玉米秸和纸做的天棚。窗户是格子状的，上面糊有薄纸。为了安足够多的窗户，屋墙要拆掉一些，以便装上适当的窗框。门低矮且数目少，制作很粗糙，都是两扇的。中国房屋或许足够大，但通常所有房间都在一座大屋子里。

修整梅理士弄到的这套房子的任务落到了传教士们的肩上，整修时正值夏天，整个夏天几乎天天下大雨。他们不仅要监督极不令人满意的雇工，而且要亲自动手做大部分事情。最后梅理士病倒了，剩下狄考文独自完成这项工作。不过，在他的同事迁居新住所那天，狄考文记述说他和邦就烈¹还是很高兴，因为这座破庙成了他们自己的住所了。不幸的是，他们都患上了痢疾。梅理士一家搬走的那天，狄考文在写给他兄弟的一封信里说：

邦就烈能起来坐半天了，我还没有好转。你可以想象我们在炉子上做饭、拿着炊具里里外外进进出出的样子，不，你想象不

¹狄考文夫人的中文名字，亦作邦就列。

出来，因为你不知道当你对一个中国仆人说三个字他只明白了一个、搞错了两个的情形。然而，最终我们还是协调好了，一切都还顺利。



观音堂部分原始内景

他们一直在这里呆了三年；在这里建起了真正的“新家”以后，他们热望继续进行学校教育工作。

尽管现在不那么拥挤了，但不久后，经验告诉他们需要建造一所新住宅。现在的住处既不卫生，也不适合于他们正在开展的

工作。他们的住处卫生条件很差，这部分是由他们住所的位置造成的。观音堂位于登州城的低洼处，雨季易受水淹。一条流动缓慢的小溪，刚好在观音堂的前面，这条小溪经一道矮门流到城墙外，如果突然河水暴涨，这道矮门又偶尔关上了，水就会涨到观音堂里。观音堂至少是主屋铺了地板，但只是用一些四英寸厚的小木块铺成的，并且是直接铺在地上的。这些小木块并没有挖沟槽，结果在潮湿的季节，足够紧凑地铺在地面上，像是地板，但在干旱季节，就裂出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英寸的缝隙。屋墙外面一层是石头砌的，没有用石灰，而是用大量灰泥浆填塞石缝，里层则是用干砖坯垒砌的。结果，墙壁潮湿至离地面数英尺以上，弄得脏兮兮的这片墙壁，在最干旱的季节也没办法弄干净。不把门和窗户进行必要的改造，地面是不能垫高的，而且改造门窗、垫高地面，是否会对房屋造成损害也值得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狄考文夫人患上了风湿病也就不奇怪了，这个病她一生都没有治好。此外，还有一些其它令人不快的事，像天棚有时候就给他们带来麻烦。这里的天棚是用玉米秸做的，用小细绳拴在房顶上，天棚的外表糊上了纸。大雨天天棚会突然掉下来砸到屋主人的头上，裂开的天棚缝隙逐渐扩大，以致到了冬季根本起不到防寒的

作用。

他们向美国国外差会本部发出求助信，请求拨给资金建造新住所。很幸运，美国内战即将结束，财政前景看好。几个月以后，差会本部准予建造新寓所，并拨给了经费。建造新寓所，首先要有一块土地。狄考文已经看好了观音堂毗邻的一块地，认为可以买下来。在中国，这种买卖很少会很快就做成的。他耐心地等待，直到临近中国年关大家都需要钱的时候，他趁热打铁，买下了看好的那块土地。

在这一切准备就绪前很长一段时间，狄考文即确信他会成功，预见他必须自己担任建筑师和工头，于是他写信给美国的朋友，询问关于建造房屋每个细节的专门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似乎巨细靡遗。他甚至想知道建造某个部分时工匠们如何站位才是恰当的。

1867年2月，狄考文去烟台采购了砖、石料和石灰，材料一到手，天气适宜了，便立即开工。建房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季，他不得不尽可能地搁置其他事情，把主要精力放到建房上。要把地基打牢固，基础框架设计好，以便能使上部顺利建造，需要极其仔细和极大耐心。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后来的建造进程的：

当要建房子第一层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做瓦工砌砖，砌好拐角，一个一个地演示给瓦匠们看如何做。我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训练他们怎样正确使用瓦刀，怎样正确地安放砖块，一点困难都没有。当要做窗户上面的拱顶时，我又不厌其烦地教他们如何做，接下来教他们如何安放小阁楼、怎样安装上层的门和窗。工作进展很慢，在建到相当高度时，再教他们如何安放横梁和椽子。不过，一切都做完了，今天他们封盖屋顶了...未来几天内，我希望能恢复我的工作，因为所有特别要注意的工程已经都做完了，所以我可以把剩下大部分事情交给中国人去照管了。

1867年11月初，狄考文夫妇“半新半旧地”住着。11月21日，他们终于完全搬进了新居。这一天是星期六，夜里，狂风怒号，大雪纷飞。星期日早晨他们醒来时，看到厨房灌满了雪，原来夜里大风刮开了一扇门。风依然很大，厨房里的炉子返烟，无法做饭。楼梯门没有安上，主屋厅堂里到处飘的是雪。不能安装取暖的炉子，其他一切收拾屋子的事都不能做，直到星期四，暴风雪才有所减弱。

不管怎么说，狄考文夫妇住进了新住宅。那时这个新住宅，虽然上下层都有封顶的阳台，一层屋外有走廊，房子中央有大厅，

两头各有房间，后面有餐厅和厨房，但还只是个简单的两层砖砌的建筑。现在，这个新住宅外面墙上大部分都爬满了美国藤 (Virginia creeper)、紫藤和蔷薇。在到外国旅行的爱挑剔的旅行者们眼里，或者说从表面看来，狄考文夫妇的寓所是一所舒适的住宅。他们在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会告诉周围的人，说他们亲眼见到了基督教会传教士们的奢侈生活。但他们如果仔细地了解一下，细心地考察一番，如果不是出于其他动机，便会轻易地认识到，这样的住所是为保证传教士健康和有效工作的需要，会间接有力促进在当地人中进行社会改良工作，便会对那些值得尊敬的基督的仆人的自我牺牲和节俭感到惊讶；正是依靠这样的自我牺牲和节俭，这些基督的仆人设法为他们自己和后继者建造了这样舒适、雅致大方的居所。



狄考文在登州建的新家

狄考文住所坐落在北长老会占用的土地上，长老会的这块地位于登州城墙内靠近水门地方。后来一些年间，这里建起了一些其他用途的建筑。总体上看，绿树点点，构成了一道吸引人的风景。

狄考文夫妇的住宅一点也不浮华，但却很舒适，适合他们的需要；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可说这所住宅完全是他们自己建造的，因而更加喜爱。邦就烈在这里住了 31 年之久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以后，狄考文博士的侄女富知弥¹与梅森·韦尔斯 (Mason Wells) 结婚前，照料这所住宅，结婚后也继续照料了数年。后来，这个住所就交给了狄考文博士的老伴——继室夫人狄文氏 (Ada) 照料，狄文氏现仍健在。狄考文在这个住所从 1867 年一直住到

¹据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 年刊行)，富知弥是狄考文夫人邦就烈的侄女 (参见该书第 52 页)。此处谓狄考文的侄女，很可能是因为前面叙说了邦就烈已经去世了，于是就说是狄考文的侄女。不过，从英文名字看，富知弥 (Margaret Grier) 应该是邦就列的外甥女。当然也可以说是狄考文的外甥女。

1904年。正是以这个住宅为依托，狄考文完成了他一生的大部分工作。圣经官话校订委员会在这里召开了首次会议。

狄考文这样的家庭，一直是最引人注目的家庭。这在基督教国家，每个读者都能够很好地理解。但是，在周围全是充满愚昧、偏见并由于偶像崇拜而道德低下的异乡人的地方，狄考文夫妇是外国人，他们的生活习俗是遭排拒的，这种差异正如来访的中国人所说的，是“天地之别”。不过，登州这个小寓所之所以能成为最真实意义上的家，主要还是能使之孕育幸福的爱。在后来一些年间，狄考文常常说：“在我们三十一年婚姻生活中，从未发生过一次争吵”。这并非是因为在这个家庭中一个居于统治地位，另一个处在屈从地位；这种和谐家庭的秘诀在于夫妇间的完全融洽，彼此都给予对方最大自由。

到登州狄考文新家访问或做客的人都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和殷勤的款待，对此，那些至今仍然健在的人回想起来，还是极为愉快。在孩提时代受到狄考文夫妇款待的那些人，似乎尤其津津乐道他们在狄考文家中所享受到的温馨。也许，那些认为自己非常了解狄考文的人会对这些人说的事情感到吃惊。莫里森（Morrison）小姐是众多讲述自己在狄考文家中经历的一位，她

的父亲是传教士。这位传教士在北京去世，后来遗孀和四个孩子迁到了北长老会在南方的一个布道站。下面是莫里森小姐写的在登州狄考文的新家做客的情形，她写道：

我们孩提时代两位最好的朋友是狄考文和他的弟弟约翰（John）。我们在狄考文登州的家度过了两个夏天，躲避我们那个比较靠南的地方的炎热和痢疾。把我们四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接到他们安静的家里，对于两个中年人来说，不可能总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但是，狄考文博士和狄考文夫人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打破了他们宁静的生活。我记得，狄考文夫人是一位最可敬爱的通情达理的妇女，狄考文博士总是一有空就和我们嬉戏。我们还能回想起他高高瘦瘦的身影，在房前的走廊里大步走过来走过去，把我的小妹妹放在他的肩上，小妹的手抓着他的两只耳朵。小妹叫他“骆驼”，我想她那时觉得骑在狄考文的脖子上，就像骑我们在路上看到向北京运煤的晃晃荡荡、毛茸茸的骆驼耸起的驼峰上，既感到害怕，又十分快乐。

狄考文博士喜欢拿我们开个小玩笑。当他同孩子们玩的时候，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绽放出了多么好看快乐的笑容啊。他有一个似乎很大的球，我猜想是个足球，他经常从后面把球扔向我们。这

时候，我们就极其兴奋地奔跑，试图躲开那个球，可是那个大大黑黑的东西总是在后面跳动着向我们追来，快追上的时候，我们就蹲下来了。这时候他就几步跨到我们前面，用他拿的报纸打我们，直到报纸破了。然后他会斥责我们把报纸扯碎了。我记得当时不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但抬头看到我姐姐脸上的笑容，我就安心了。

莫里森小姐还讲了其它许多类似的嬉戏故事。一些老熟人说狄考文爱孩子，愿意和小孩子们一起游戏。他深深地喜爱所有天真无邪的嬉戏，或许这与他通常举止不相吻合，以致许多人特别强调他的性格特征。

在那个时代，中国北方的北戴河 (Pei-taiho)、南方的牯岭 (Kuling) 和莫干山 (Mokansan) 都还没有辟为避暑地。烟台和登州是唯一可以避暑的地方，这两个地方除了传教士们的家，都还没有接待客人的住处。由于美丽的位置，相对清洁的城镇，登州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去处。通常，如果有人向任何一位老传教士提到登州，他都会接着脱口评价说：“非常讨人喜欢的地方，我曾经在那里同狄考文度过了一个夏天”。狄考文一家像欢迎小朋友们一样，欢迎老传教士和新来的传教士到家里做客，对志趣相同

的其他人，狄考文同样也愿意到他们家里去。在他的书稿付梓时，就住在上海费启鸿（Fitch）博士夫妇家里。他也在烟台的差会之家、中国内地会差会疗养院住过几个月。费启鸿夫妇以及疗养院长斯渡克（Stooke）都说，通过显然是很愉快的“茶话”或其他方式，狄考文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爱戴。

一拨一拨来登州度夏的客人通常都是清一色的外国传教士，这种情况对狄考文一家来说既有利也有弊。一方面，他们没有为商业目的或其他世俗目的从基督教国家来的外国人的不良生活偏见；另一方面，他们走了以后，为供应他们方便舒适生活的东西也耗尽了，这些东西常常是狄考文夫妇极其需要的，是保证健康甚至是生活的必需品。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同外部世界的交流方式单调且极其困难造成的。例如，狄考文夫妇离开烟台时留在那里的货物，要六个星期才能送到登州。登州与烟台的来往信件，要通过私人邮差送达。后来，他们一伙人联合雇佣一个信差，一个星期往返烟台、登州一次，这样看起来就好多了。寄往美国一封信的费用是4角5分钱。

不过，狄考文他们最需要的还是称职的医疗服务。关于派一名医生加强他们的队伍一事，狄考文给国内写了多少封信啊！恳

求、计划，有时候甚至是叱责。与此同时，他们用从国内带来的药品为自己治病，或者把病人陆路送到烟台，或者在危急情况下从烟台请医生过来。很快，狄考文不得不尝试着给自己和妻子治病，同时也尝试着为其他人治病，为贫穷的当地患者治疗。他早期治疗的其他病人，有一个是严重烧伤的孩子，结果成功治愈了；另一位是个破伤风患者，尽管尽了一切努力，但没有治好，去世了；还曾治疗过一位断了腿的妇女。他也曾试图亲手为他的同事梅理士先生拔牙，但由于他那时用的钳子太糟糕，放弃了。后来，他可以做得好一些了，因为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套完全的牙科设备，不仅有拔牙和补牙的设备，也有了制作假牙的设备。他经常用这些为人治疗牙病。在第一次回国休假期间，狄考文在费城（Philadelphia）进修医学，参与了大量解剖实习。新住宅的一个壁橱成了药品储藏室，他用这些药品为许多人解除了病痛，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尤其是在霍乱流行期间。应这里传教士们的请求，首批派到登州的医生没多久就离开了。多年来，大部分医疗都依仗“新住宅”楼梯下这间昏暗的壁橱。



从北面看登州差会居住区，[最左边的入口通向赫士博士家](#)，赫士博士家后面是狄考文博士家的背面。[居住区南面](#)的菜园子是中国人的。

第六章 内心世界

“我非常清楚我们这里没有达到我们应有的水准，这是我们的罪孽。我们不停地祈祷上天为周围异教徒洗礼；但也要为我们自己能像我们所表白的那样而不停地祈祷。我们的环境既不利于增长体面也不利于心理文化的成长。我们仅仅同当地基督徒有联系，他们的敬虔常常是低层次的那种。他们的敬虔是从我们这里获得的，但他们却不能传授我们任何东西。精神上，我们完全孤立，没有在家乡周围人们的健康促进因素、各种砥砺及出众的智慧。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人大部分在精神方面都极其低下，没有公众意见能够有力地促进我们去努力工作。可以说这些就是导致我们这里水准低的原因。或许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家乡时，所有对文人的有力影响，几乎不了解或感觉不到，直到没有这些影响的时候才显示出了这里与家乡的不同。”——摘自 1867 年 10 月 1 日致西方神学院调查协会的信

On high

我们的传记写到这里，除非是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便不能再遵循时间顺序写下去了。我们必须论及狄考文生活和工作的各

个侧面，由于所要叙述的主题各自独立，只能就各个主题本身进行相关记叙。这样做完全不是因为他本人缺乏目的的连贯性或毅力。他这个人，从踏上中国大地开始劳作，到走完他的生命旅程，一直从不间断地全身心地在那个伟大帝国的人民传布福音。但是，在传布福音的过程中，他发现必须经常同时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尽管这些方法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为能把问题讲清楚，我们最好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各个主题分别加以记叙。

不过，在进一步就各个主题展开叙述之前，显然最好还是先探讨一下他的内心世界。关于这一问题，并非是去叙说他的天赋，或者是探讨他的外在特性，因为这些所有与他有联系的人都熟悉和了解。探讨内心世界，要从魂生命 (soul life) 尤其是宗教方面着手，似乎只有深入一点才能做到。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伤脑筋的事情，应慎之又慎。笔者现在要做的事情尤其困难。狄考文无论在讲话中或文字里，从不习惯于向别人讲述他的内心经验。一度曾在信中和日记里偶尔打破缄默，透露了一点信息。不过，他的日记截止到 1876 年 11 月 27 日就结束了，而在结束写日记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时间，他一直忙于工作，几乎没留下与魂生命有关的内容。在他的通信中，就更少涉及这一问题，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职业使然，不得不尽可能中断通信联系，去忙于其他事务。如此一来，我们这里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揭示狄考文的内心世界。

有一种流行观点，尤其在“见多识广的人”(man of the world) 中广为流传，说传教士几乎总是感情用事的梦想家，忽视严酷的现实生活。训练大量以传教士身份献身基督教事业，认识更多的传教士，一直是我的工作。可以公正地说，我现在不认为有一个传教士有这种性格。在我的记忆里，恰恰相反，大量传教士完全不是这种人。当然，如果说要把福音传入地球上的黑暗地区，并坚信最终取得胜利，称之为做梦，那么，每一个真正的传教士都是感情用事者和梦想家，而狄考文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就他的生活经历和他所做的工作来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要去这样指责他。的确，他事实上是一个连他最好的朋友都希望他多一点感情用事、多一点梦想。我仔细翻阅了他数千页日记、信函和文章，只记得有一小段有感情色彩的内容。这简直是个例外，因此我们这里要摘录下来。在 1861 年春季写给他朋友(我想是朱利亚) 的一封信里，他是这样说的：

迄今为止，我这一生几乎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我非常喜欢农

村的幽静美色。我喜欢这个季节在绿地上漫步，倾听春风吹过嫩绿树叶的声响，在堤岸或布满**藓苔**的岩石遮挡的背风处，坐下来沐浴春天的朝阳。我爱回想过去，展望未来，就这么坐着思考，聚集应付严酷生活现实的勇气。

这不是那个歌德笔下的令人烦恼的少年维特，自此以后的青年也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在那个季节，青年们的思想闸门被爱打开了。

但是，如果我们因为他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就认定他没有温柔的心和深厚的情感，那很不幸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富善 (Goodrich)博士在 1909 年 1 月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上的纪念性文章中，谈到狄考文，他说：

我记得他在用英语或中文布道时，有时嗓音颤抖，说不出话来，要这么个强壮的男人控制好一会感情才能继续讲下去。他经常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向穷人和不幸的人们表达他的感情，当读一些充满哀婉和泪水的故事书的时候，他常常哭泣。义和拳结束后的第二年，登州文会馆的学生学唱一首他刚刚翻译的简朴但优美的赞美诗——“有人要进天国之门”，一天早晨，我们在祈祷会

上唱这首赞美诗。刚唱完，我回过头去看看他对唱的是否感到满意，见到他的脸上泪如泉涌。

这种同情柔弱之心与他强劲坚韧的力量一样，是天性的一部分。... 他非常地爱小孩子，也很容易赢得小孩子们的爱戴。幼小的婴儿会向他伸出小胳膊，大胆地拽他的胡须，这让他非常高兴。

他的学生们既怕他又爱他，而爱要多于害怕。因为对那些做错事和懒惰的学生来说他是可怕的，但他对这样的人也宽宏大量，随时都乐意原谅和帮助他们。我们常常看到狄考文博士的学生在他的书房里，倾心询问，得到忠诚的劝告和父亲般的爱。他热爱他的学生，在他们毕业工作之后，也还经常关心着他们的成长。

有一位女士说，文会馆第一批“孩子”被按立为传教士时她就在那里，亲眼见到狄考文在谕示他们宣誓忠诚时，他努力地克制着，眼泪不住地顺着脸颊流淌。

对于母爱，他报之以孝道，使母亲无限满足。朱利亚理所当然地不会渴望得到她从丈夫那里得到的更多的爱了，后来的艾达 (Ada)¹也得到了同样深厚的爱。当他启程到中国时，有一件事对他的伤害最大，那就是他与兄弟姊妹的分离，他到中国以后，

¹ 狄考文的第二任妻子。

还不断地设法帮助、关爱他们。

他是一个信仰必须凭借圣灵重生才能开始真正基督徒生活的人。这种信仰是最大的悔罪表现之一，对此他从不怀疑，老而弥坚。因此，在他 19 岁加入教会时，他就公开宣称确信内心的变化是他成为基督追随者的保证。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外在的宗教方面的突然转变，也没有宣誓信教。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简短自传手稿中，他说：

我有一直祈祷的双亲，父母自幼就教我诚心诚意地祈祷。我说不出我的宗教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宗教感觉伴我一起成长，但亨特斯镇（Hunterstown）教堂海斯（I. N. Hays）牧师忠诚的布道，尤其是 1852-1853 年冬季的一系列会议，使我的这些感觉极大地加深了。

至于他外在的道德品行，并没有什么能看得出来的“转变”，他没有要抛弃的坏习惯，没有要分手的不好的伙伴。他的变化发生在精神层面，但到底什么时候那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他自己说不出来，这种情形，往往是敬神的家庭里塑造出来的孩子的一个特征。

我在大学里与他建立联系时对他的印象是他生活正直，绝不忽视任何他应担当的义务。我知道，他不参加一些象布雷纳德会（Brainard Society）、少数人组成的祈祷会这类学生的宗教协会，而是在主日上午步行两英里到农村查忒尔斯教堂（Chartiers church）去给一个查经班上课。如果被问得紧了，我很可能会犯错误，犯一些年后那些只看到他生活表面的人很容易犯的同样的错误。我会说他虔敬有一主要缺陷，那就是没有注入感情。我会说他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基督徒，但他的心灵深处还需要宗教力量激发，才能使他成为在他自己和别人看来有能力成为那样的人。这样的表述，对于他在那个年代的生活状况而言，也许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是，就后来了解的情况而言，这肯定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判断，而我在大学和神学院和他同学时对他的判断，其错误程度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1856年10月13日，他开始写日记，随时有间断，但一直坚持了20年。开始写日记之初，他就说明了要写日记的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他是这样说的：

我也将在某种程度上记下我的思想和感情，以便后来能回过头来了解我个人生命的历史，了解我之所以不得不那样做——正

确的和错误的——的动因，因为一个人做事消沉或积极向上，确实是由他的心理状态决定的。

很明显，他写日记是为留给自己看的。有一次读他的日记，对他的直率感到惊讶，他偶尔会对在路上遇到的人做出评判，喜欢哪种人，不喜欢哪种人。关于他自己，日记中也同样公正率直。说他自己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他的表面行为，但有时候也揭开面纱，揭示他心灵深处的秘密以及宗教生活。结果我们发现，他无论如何也不是我们仅从表面现象所推测的那么平静的人。无意的表露自己情感的内容，并非不适合公之于世。这里可以选出少部分予以披露。在某个星期六，他记述说他先分发圣餐作为他和大学其他同学斋戒日用，提及一处他先前听说的地址，说这个地址强烈地吸引着他，接着他继续写道：

我知道，我一直没有像我应该的那样忠诚。虽然相对来说我在基督徒生涯中还是个孩子，加入教会才一年多一点，但我吃了主的宴席，却信仰模糊，心情冷漠、死气沉沉，没有适当的反省，没有祈祷主的面光。我这一个晚上都在回想我过去的生活和与人的谈话，祈求神的宽恕，求神恩救助。我过去的生活显现了不曾

有过的罪孽。确实，我的行为在许多事情上与一名基督徒是不相符的。罪孽常常在我这里得胜，完全按照它的意愿俘虏了我。我把我的情况摆在上帝面前，求上帝贬抑，安排我正确地遇到救主。但愿这一次上帝满足我，展示面光，赐我恩惠和力量，由是我就可轻易地甩掉我周身所有的负累和罪孽，心平气和地向着既定目标前行！刚才不久的时候，我似乎有了一些不适当的兴趣，我希望神将赐福我们，或许在我们中间成就辉煌事业。为了得到祝福，这一天向神作了许多祷告，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忧伤见不到上帝，那是因为我们的罪孽，说明我们不信神。我一直努力把向神忏悔、祷告当作是真正的斋戒日，但我的心告诉我说，我并没有像我应该的那样去做。我的忠诚里混杂着罪孽。不过，我不是没有希望，因为公正的唯一尽善尽美，施展权能无所不至。赞美神难以名状的礼物。

然而，第二天，在记述其它事情时，他写道：

我想我从未享受如此快乐的亲密交谈...这一天，我对天国的信心更强了，我的信仰增强了，如果我了解我的心（哦，我现在更了解它了），我就会更加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上帝会

赐恩于我，许我为上帝增添荣耀！

这样向我们揭开他内心宗教世界秘密的年轻人，确实不能说
他严重缺乏激情。这使我想起了诗篇作者“如鹿切慕溪水”的诗
句。¹

在神学院读书时，他依然有时不安地自我内心反省，不满意
现状，渴望一种更佳状态的基督徒生活。在读了一本叫做《严酷
考验》的书的部分内容之后，他写道：

这个安息日我没有享受应有的欢乐。我的心不正，我恐惧。
我离基督还很远。我如此经常地受到诱惑，心神不宁，我通向施
恩宝座的路堵塞了。我要和保罗一起呼喊：“哦，我真不幸啊，谁
将救我脱离这死亡的躯体？”但愿我也能确定地像他那样说：“通
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上帝。”

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他正在向着较高级宗教经验阶段进发，
正在超越悔罪和誓约阶段，日趋走向“完美”。他阅读巴塔哥尼亚传
教士《理查德·威廉姆斯传》，然后坐下来写道：

¹ 这句赞美诗的完整句子是“神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As the hart panteth after the water brooks, so panteth my soul after thee, O God）

他是一位令人惊叹的人，度过了令人惊叹的一生。他的信仰无论在哪方面都超越了我所达到的高度。他经常愉快地同神灵交流，不时达到这样一种高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几乎想象自己是在天堂里”。他听从神的旨意，以最佳的方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事业。他的生和死都令人惊异地展示了神恩的力量。在暴风雨中，天气很冷，他乘坐一艘很不舒适的小游船或者说就是个木筏子，由于患坏血病几乎肯定要死了，没有任何食物，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这位忠实的人念诵着神的话，谦卑地卧着向神祷告，从容宣称他不与任何活着的人交换位置！这是多么神圣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一名基督徒的生命达到了何等壮观的高度！我越来越确信，我们享有神、感到与基督同在的甜蜜以及在荣耀神中取得成功，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向神奉献的方法，有赖于我们完全顺从神。因此，我祷告忠实神的意旨，顺从神的意旨。那么，我就会幸福。

我不认为狄考文有任何步威廉姆斯后尘的可能，尝试神以难以预测的方式暴露其生命和健康的危险；他准备奉献给神的事业。这时他似乎在日益渴望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圣救主、完全顺从神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关于参加海外布道团这一问题上，他经受

了严峻的考验。起初是他是否应该承担这一使命，以及他是否愿意承担这一使命的问题。对这一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对他来说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是个强健的人，知道自己的力量。对他来说，到世界某个遥远的没有传布过福音的地方去，那就意味着要放弃他迄今为止设计的人生蓝图中几乎所有吸引他的“美好志向”。在国内，他拥有大量美好的机遇。在这一问题上的决定，令他不能不考虑他的亲戚和朋友们，想到离开他们之后几乎就不再有在这个世界上见到他们的机会，心里很痛苦。在 50 年前，要出去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大多数情况下要经受比今天严峻得多的考验。然而，他勇敢、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神给了他足够的恩典。他申请加入海外布道总会并得到了批准。接下来，他又面临另一严峻考验。在最终被派出去之前，他要等待一年半的时间。有几次，他似乎没有被派出去的希望了，他必须学会顺从这似乎是神的旨意，尽管这使他感到心碎。1862 年末，当总部的一位秘书告诉他说除非一条道路能迅速开通，否则他最好是在家乡找一个永久性的工作地，听闻这一消息，他写道：

看来我不能放弃。我充满信心，我应能够出去 ... 我历经反复思考打定了主意，现在不能因为有人推想的原因就前功尽弃。

这是怎么回事？我最热爱、报最大希望的计划为什么不能实现？

不过，上帝将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一点我清楚。仁慈的上帝，帮我愉快地顺从您的意旨，假如我永远不能出去到异教徒的土地上，让我在国内保持光荣的海外布道团精神。

他就是这样被抛入了一个严格的修炼环境，不过他获得了圆满成功。

人们完全可以想见他在海上旅程中不时经受的心灵压抑。

1863年11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如下的文字：

鉴于我的精神状态，午前祈祷，念诵神的话。我一度感到怀疑、担心的情绪笼罩着我，是以不能像我应当的那样进行灵命操练。我一直焦虑，思绪翻滚，考虑自己的情况，担心自己不适合海外传教士的工作。这一天我开始非常沮丧，但是，应当称颂神，我在基督里找到了宁静、喜悦和自信。祈祷中，《诗篇》第86章中“乐意饶恕人”以及“丰盛的慈爱”等诗句强有力地在我心底闪现。我确信我依靠耶稣我的救主重新抛弃了我自己，感到很高兴。晚餐前，我到甲板上散步并静思默想有些问题。乔治¹ (Georgie，

¹ Georgie，原作者注：B夫人 (Mrs. B) 的小女儿。似应为韦廉臣夫妇的小女儿。

B夫人的小女儿)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正在用她孩子气的方式唱圣诗:“他将赐你恩惠去征服”。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仿佛是唱给她自己听。这些词语来得及时,我的心高兴地抓住了这声音,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将赐你恩惠去征服”。我想到了与这声音相似的经文:“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圣灵就在这话语里,这些话非常宝贵。我的担心飘到了九霄云外。我准备带着这力量去中国,去做上帝交给我的任何工作。我回到了我的房间,全身心感谢上帝的这一安慰。你从小孩的口中得着了赞美¹。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专门寻求神,这对我大有益处。主令我感受到了这一机会对我的影响。起初,我思绪纷乱,但神仁慈地把我拯救了出来。哦,我可以保持惯常的虔诚心灵,离应称颂的耶稣非常近地生活!

虽然那时他只是朦胧地理解,但主在那一经验环境中训练了他在后来所有工作中需要践行的品质:根据神的允诺在黑暗中休息,在令人失望的迟滞情况下耐心等待,以基督精神忍受不信神的人的反驳,为了他们更高的福利,愿意做出任何牺牲,无论对他来说要多么昂贵的代价。

¹ 语出《诗篇》第8章,原句为“Out of the mouth of babes and sucklings hast thou ordained strength ...”(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又译为: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作为一名海外传教士，在他的宣教区履行自己的职责过于忙碌，以致无暇写下太多关于他内心世界的文字。我们没什么理由认为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事实上，从加入教会到去中国工作的十年时间里，他的宗教经验已经非常成熟了，虽然后来宗教经验日益丰富，但他的性格方面并未发生多么显著的变化。在此以前的日子里，他已经把自己打上了彻底奉献给上帝的事业的标签，而他之所以还认为他在这方面有很大欠缺，那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反省自己，所以才会在有时候为自己的精神状态困扰不已。自此以后，作为已经具备的奉献精神，只是不断地付诸实践而已。很可能他在这方面对自己认识不足，他一生已经竭尽全力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内心世界与此有关的两大鲜明特征。其一是他坚信宗教真理。他相信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是神的话，他确信这是一名传教士信仰的根本基础，不准备欢迎任何在这一问题上游移不定的人加入教会。他也同样坚定地相信正统派教会宗教信条和神学中的其他伟大福音学说。他本人信奉加尔文主义和长老会派的教义，但他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宗派主义者。他渴望与其它教派的传教士合作，而不仅仅是长老派传教士内部的合作，对参与合作的人的全部要求是他们应坚守他所认定的基督教本

质。由于他坚定信仰这样的宗教真理，因此他也就不断地把这些真理传布给中国人民。郭显德博士在他出版的一部编年史中谈到狄考文时说：

大约在 30 年前，我问一位诚实的请求施洗的年轻人，他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对宗教真理感兴趣的。这位年轻人回答说：“自从狄考文博士在我家附近的集市上讲道那天，我就开始感兴趣了，他说在最后的审判日，每个人都必须向神陈明。他讲的给我印象太深了，从此我就坐立不安，直到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才恢复了平静。”一位能干的中国牧师，与我一起在内地时，获悉狄考文博士去世的消息，他说“凭良心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狄考文博士几个星期前在烟台中国教堂里的精彩布道情形”。这是他最后一次讲道。信主耶稣基督得救赎，人有罪，要忏悔，每个基督徒都要忠实、负责地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不停地为耶稣作见证，他总是强调这样一些伟大真理。他在信仰他为之传布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可称颂的福音中去世。

与这些重要信念相辅而行的是对职责的绝对忠诚。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他之所以辛苦地自己动手建住宅、

造机械、制作仪器，并非是因为他对做这些事情比传道更感兴趣，而是因为他确信形势所迫，他不能心安理得地不去做这些事情。花数年时间搞官话圣经翻译并不是他的偏好，他之所以这样做很明显是因为他认为从事这种令人厌倦的差事是他的职责。他用笔为上帝也就是汉语中的神而战斗，甚至在被认为是少数的情况下，他也依然拒绝妥协，那只是因为他认为他这样做不仅是坚持真理，而且是在维护对中国的基督教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在旷日持久的压力下，他也不愿意在登州蒙养学堂和文会馆开设英语课程，看到文会馆迁到潍县之后加设了英语课程，他感到心要碎了，这也不是因为他顽固，而是因为他坚信他所认定的职责¹。

他是这样一种人：具有丰富的智慧、坚定的志向，完全忠实于他所认定的职责，沿着既定方向，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长途跋涉。情绪不稳定时，他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固执或危险的狂热者。甚至可以说狄考文博士有“他品质上的缺点”。他并非总是原谅那些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当其他人的行为与他所想的应该那样去做的不一致时，他有时会无正当理由地怀疑这些人是否正直。但是，这些缺点不足以毁损他性格的优点，或妨碍他性格中美好的东西。

¹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本书第八章不开设英语课的有关记述。

一般来说，他的智慧，他的正直，他在差会工作中对上帝事业的全部奉献，他宽广的心胸，毕竟是大家都认可的，他造成的任何不愉快，很快就会平复；所有与他有密切联系的人对他都格外尊重和崇敬。

狄考文博士是一位非常“体贴圣灵的人”吗？尽管很少有人这样问，但只看到他生活表面现象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因为体贴圣灵是别人难以发现的。他甚至在屋里来回踱步的时候，或者是外出到城墙上消遣一下时，都在私下大量祈祷，除了他的妻子和姊妹，没人知道他这时在做什么。只有进入他的心灵圣地，才能欣赏到 he 敬虔的热情。

第七章 布道

“我乘坐骡苦¹、骑驴或步行走遍了山东很大一个区域，一个村庄一个村地在街道上或路边讲道。离住处较近的地方，去过很多次。布道旅程总计 12000 英里至 15000 英里，向 8000 至 12000 名异教徒宣讲过福音”。——摘自 1897 年自传手稿。

狄考文到登州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掌握当地人的语言。

¹ 胶东山区的一种交通工具，类似于抬轿，俗称“苦子”。与抬轿不同，苦子是用两根长杆，将两端用绳或皮子适当联结，分置于前后两头骡子两侧，联结杆子的绳或皮子放在骡子背上固定位置。两头骡子间的悬在半空中的杆子用麻绳编结成网，上铺铺草，铺草上再辅以褥子之类，乘客或坐或卧其上，再于杆子上打上席棚，状如城门洞。前面的骡子，需有人牵着，适合于山地旅行。

学习中国方言的艰难，外国人十分清楚，毋庸赘述，对狄考文来说也不例外，他不比别人有语言天赋，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完善教育。1902年1月，他应斯庇尔（Speer）干事的邀请，为差会本部写一篇关于“传教士与语言”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声言要讲述他自己的经历，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他是怎样做的。在这篇文章的导言部分，他写道：

学习一项新东西，是传教生活的艰苦工作之一，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这种新东西常常就是难掌握的语言。就传布福音而言，在学会所在布道区的语言之前，是不能很好开展工作的。我认为，每个到国外的传教士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明确无误地下决心学习所要奔赴国家的语言，而且要下决心学好。不要犹豫退缩，不能半途而废。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有任何松懈麻痹情绪，无论是谁，他都不适合做一名传教士。有一位年轻传教士，在踏上他所要去的国家的土地几周或几个月后，就说“我憎恨这种语言，谁能学会说得这样快又不清楚的奇异语言”？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能否做传教士工作就大打折扣。每一位年轻传教士，应当考虑到他或她工作的特殊性，尽可能快地爱上所在工作地的语言。

接下来，狄考文指出了到国外去的传教士应当遵循的一般原则，并详尽讨论了如何努力把这些落实好。他坚持认为，每个人都能够学会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学习一种语言，不仅要学到可以磕磕绊绊地说这种语言，而且要完全掌握它；并谈了关于要完全掌握这种语言的最好方法的一些建议。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并非是所有传教士都能够完全掌握所在外国布道区的语言，以至于有能力为所去的国家做可永久性服务的基督教著述工作。

在他本人的经历中，初始工作极其困难。书籍、字典等印刷品很少，质量也不好。在登州，几乎找不到称职的当地教师，而且即使找到了教师，他们也随时都可能离去。此外，狄考文夫妇那时与其他传教士住在一座破庙里，居住条件极不方便，他不得不几乎竭尽全力去修缮和建造住所，否则他有可能就无法学习当地语言。1864年12月24日，在到达登州几近一年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一星期，我一直很有规律地学习，可是回头看看，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学习中文是一项很耗费时间的事。中国人在专门知识方面从未取得重大进步，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中文是如此难学，它使得一个人把精力最充沛的时光都花在了学习语言上。

这就好像一位技工把半生或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准备工具事情上一样。在到中国之前，我就担心会在掌握中文方面遭遇困难，现在我发现这种担心还是很有道理的。

这段出自狄考文手笔的自白很值得注意，在他去世以后，他的一位同事说，狄考文“不仅成了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唯一的官话演说王子，而且从根本上掌握了中文，这使他得以在未来的一些年间利用中文作了最完美的工作，写出了所有说中文的学生普遍使用的教科书”。此外，还应提到的是在中国传教士大会上，他被推举为圣经官话修订委员会主席，在修订官话圣经工作中，自然成了领袖人物。狄考文夫人狄邦就烈在一封信中，展示了他努力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学习中文的情形，狄夫人在信中说，晚上狄考文练习写汉字的时候，她就对着她的丈夫大声朗读。

事实上，狄考文取得了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大的进步。1865年1月14日，他开始定期到学校，去给孩子们讲授一种汉字语音写法。2月7日，他记录了他负责的早祷，并就此作了说明：

用中文祈祷，对我来说确实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除了感到奇怪，并未觉得有什么为难的，我发现在做祈祷时没有我起初想

象的那样窘迫。或许我早些时候就可以轻易地用中文主持早祷，但这由我们学校的老师做，他做得很好，我就把这件事一直交给他来做，直至我完全做好了准备。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在家里说中文了。

登州是科举考试府试的所在地，考试季节，数千名考生都集中到这里。1865年5月11日，狄考文写道：

很多学子来看我，索取书籍，听讲“教义”。我有机会做相当多的布道工作，没有浪费这些机会。他们当中有些人很明白我讲的东西。我发现与这些学子们谈话，同与没有文化的人谈话有很大区别。这些学子比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明白多了。他们大部分人集中精力听讲，其中有些明显感兴趣。他们对我很尊重。我发放书籍给他们，他们答应说要阅读这些书，并且在下次考试的时候再来。

这种提供同学子们接触机会的考试后来每年都有，狄考文尽一切可能加以利用。几乎没有人给他制造麻烦。那年5月22日，他到城门外的集市，开始露天向各种各样的人讲道。临近中午，他讲累了，下午又回来继续讲，但他不知道效果如何。直到天下

起雨来，他才停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噢，我多么希望能像讲英语一样讲中文啊，那样我就可以愉快自如地布道了”！6月19日，安息日，他第一次到在登州组建的一个中国小教会讲道。他只是得到了一个简短的通知，说梅理士生病了，要他去补讲道坛的缺。他记述说：“我不能够准备一次讲道，只能小心谨慎正确地翻译。我仅仅准备了一些惯用语，以及一些主要问题的陈述句，其他只好依靠我的中文发挥了。这次讲道，尽管至少在我看来够糟糕的，但结果还是比我预期的要好”。我们不必再历数他后来学习中文的具体情形，只要指出尽管他不久就能说中文，用中文写作，但他总是在不断学习，不断寻求改进就够了。稍后，他的中文已经非常熟练，中国人更喜欢听他这个外国人用中文讲话，阅读他用中文写的著述。

作为资深传教士，梅理士负责在登州组建的教会，狄考文在这里讲道只是偶尔为之。不久以后，组织了一次街头布道活动，他很高兴参加这种形式的工作。他也急于得到一间他可用作小教堂的屋子。他第一次获得这样一间屋子的努力，由于当地人的激烈反对，尤其是官员们厌恶他在这一问题上根据条约坚持他的合法权利，没有成功。直到1867年4月中旬，他才得到了一间屋子，

他和他的中国助手有了布道和出售书籍的正规场所。这间屋在位于城里一条主要街道上，因此非常适合单独做布道工作之用。开办这样一间布道屋，也为地痞无赖聚集一起提供了场所，他们往门上扔石头，制造骚乱，不过，地方官逮捕了他们的头头之后，这种聚众闹事的流氓行为就终结了。当然，狄考文开办的学校也为福音布道提供了机会，这从建校之初就有效地利用了起来。

登州城本身对福音反响并不大。人们对布道书的要求很快即得到了满足，随后就卖得很少了，街区布道和小教堂服务的新奇感也逐渐消失。安息日除了正常来的人之外，吸引不了多少人。不错，登州这么多人口的城市，尽管有诸多限制，但似乎足够在这里定居的这帮传教士全力以赴工作之用了。但在城墙之外的山东所有其他地方，除了烟台和登州以外，却没有一个人布道。山东的面积约比宾夕法尼亚州大三分之一，现在人口约 3000 万，尽管人们也经常到城里来，但大部分都分散居住于难以计数的村庄里。山东的气候类似于肯塔基州，农产和肯塔基没有多大区别。地表有些为山区，有的地方有中等高度的山，但大部分为平原或丘陵地带。狄考文在 1869 年 5 月 10 日写给差会本部一位干事的信中，关于山东在使中国基督教化的伟大事业中的重要战略意义，

表达了如下的观点：

我认为，人们普遍承认济南府（山东省城，位于登州西南约300英里）是在中国最有希望取得传教成就的地方。省城所在的那一地区，是中国的宗教中心。中国的伟大圣人孔子和孟子都出生在那一地区。省城稍向南一点的泰安，是举行中国盛大宗教节日的地方，在那里，毫无疑问地显示了山东人民中的宗教成分，而这在中国其它地区是看不到的。我冒昧地建议北长老会在山东扎根发芽。在过去的时代，山东为中国提供了宗教和政治学，在未来，山东将为中国提供基督教信仰。

山东的先驱传教士起初通过巡回布道，继而通过开设布道站，谋求尽可能快地在该省广泛传布福音。在这方面，他们的条件远不如他们大部分在南中国的同行，极不便利。在南中国，可以依靠江河以及难以计数的运河广泛旅行。在山东，有一条大河即黄河，由西向东；一条重要运河即大运河，南北流向。这两条河离烟台和登州都很远，烟台和登州的传教士巡回布道，根本不能指望河运的方便条件。结果，他们只好采用当地习惯的旅行方式。甚至即使在今天，虽然起自胶州，横贯山东抵达济南府的铁路已

经开通，另一条穿越山东西端并经济南府的铁路也接近完工，但烟台和登州大部分地区，与半个世纪前没什么两样，仍然没有方便的旅行通道。旅行者可以雇一头骡子，或者很可能是一头驴，把他的行李搭在驮鞍上，就这样开始上路旅行，牲畜的主人沿途跟随牵牲口；到一个地方后，如果旅行者要继续旅行，他就必须再雇一头骡子或驴，如此这般一直到旅程结束。人们也可以乘坐手推车旅行。手推车这类交通工具被认为是很体面的，大多为中国妇女乘坐。车轮子很大，制作粗糙，没有润滑油，发出令人担心的咯吱咯吱声，而且这种车子不安装弹簧，乘客备受颠簸之苦。这种车子是一个男人靠两个车把推动前行，常常需要另一个人帮忙，有时候是前面有一头驴拉着，也可以挂一张帆利用风力帮助前行。在山区，苦子或者叫骡苦是普通交通工具。对苦子这种运输工具，狄考文在一封给美国主日学校的信中作了如下描述：

乘坐苦子，要不停地动来动去，变换各种姿势，远不同于乘坐一般交通工具。有时候两头骡子一齐迈步，而有时候不是。当两头骡子步调不一致时，你就会像摇晃胡椒瓶一样猛地向前倾斜，然后又像筛子一样晃动；紧接着，一会儿像摇篮一样起伏摇晃，一会又各种运动轮流交替，变来变去，一刻不停。我常常想，如

果有人筋骨僵硬，坐坐苦子放松放松是个不错的选择。总之，你完全受这两头骡子的摆布。如果你在苦子里坐着，你就会想躺下来可能会舒服点儿，而如果你躺在里面，你又会想坐起来可能会舒服点儿。除非你从苦子里出来步行，不然就得一刻不停地晃来晃去。

最时髦的旅行方式是乘坐大车，大车总是沿着被称为大道的路上行进，这种路宽敞、平坦，足够大车行驶。我在主日学校信函中找到了如下一段关于乘坐大车旅行的描述：

中国的大车很笨重，制作极其粗劣。这种车不安弹簧，没有座位，没有垫子，宽狭足够一个人坐在里面。保证不被车顶部碰伤胳膊和头的唯一办法，是裹在被子和枕头里。载乘客的大车，通常使用两头骡子拉着行驶，一头在车辕里，另一头在车辕前面，由两条一端拴在车轴上的长绳套住，套着前面骡子的两条长绳，分列辕骡两边。赶车的人或步行，或坐在车辕的后边 ... 我乘坐过一次这样的大车，终生难忘。我们几个人一起到离登州 120 英里远的一处乡村布道站，去参加一个长老会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们希望到 40 英里远的另一处布道站。由于下了一场大雨，路

面很松软，找不到交通工具。最后，我们找了一辆大车，要拉的人有我和梅理士博士，外加我们的行李。为此，他们在车上用木棍和席子搭了顶棚。这个车队有两名车夫，一头骡子、一匹马和两头牛。狄考文夫人骑一头驴，哈丕森 (Capp) 夫人坐一顶轿子。梅理士博士和我与一位中国长老及助手轮流步行。当我们把我们的物品、行李、炊具等装上车以后，车里的空间只能坐一个人，另一个人必须躺着。第一天，我们在松软的泥地上行了 15 英里路，为行这 15 英里路，我们在天黑以后还走了一个小时。路上漆黑一片，没有提灯照明，我们几乎迷了路，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我们到了以后，小旅馆忙了好大一阵子，才把我们安顿下来，最后总算吃上了晚饭。我们为两位女士定了一个小房间，但梅理士博士和我住得就不那么舒坦了。我们睡在一个没有门的棚子里的地面上。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就上了路，发现路比昨天好走一些了，想尽办法又赶了 25 英里。这天我们要过一道沙河，由于大雨后河水上涨，我们有陷在沙里的危险。那位中国助手挤到了车里，中国长老则一只脚站在车轴上——中国大车的中轴外加长几英寸，手抓着大车的一侧支撑着。两位车夫，一位像那位中国长老一样，搭在在大车的另一边；另一位横跨辕骡

站在车辕上。站在车辕上的车夫一手挥动鞭子，一手打着手势，这时两位车夫一起扯着嗓子喊，拉车的牲口都激动起来，抬头竖尾，趟着水猛地向前冲去。终于，我们安全地过了河。

还有一种旅行方式，也许是所有旅行方式中最常见的一种，即使传教士巡回布道也采取这种方式，那就是步行。当旅行者徒步旅行要过一条河时，如果他有足够的耐心，可以等待摆渡过去；如果河水不太深，则可以涉水过河。不过，狄考文身体强壮，做事风格朴实，完全没有等待这些小交通工具的烦恼。在早期巡回布道时期，他同其他传教士一起外出在省内传道，过着粗糙的生活，他感到很愉快。他多次巡回布道携带的全部饮食用具就是一把勺子和一瓶盐；饮食也就是一处一处小旅店里那些东西。他在巡回布道方面的经历，对他开办中小学以及大学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对他精通中文白话也有巨大帮助，他的文字工作展示了他的中文白话水平。

1864年10月14日，狄考文第一次到乡村旅行，可见他此前已经学了足够多的汉语，使他能更多地开展传道工作。事实上，这次旅行只是登州美国南部浸信会和北长老会的所有外国传教士去10英里外的一位中国基督徒那里的一次访问。不过，从方式上

看，这是一次典型的旅行。道路极其糟糕，狄考文和另一位传教士共用一头骡子，轮流乘坐。翌年 8 月 22 日，他和要求做一次真正巡回布道的郭显德一起，做了一次这样的旅行。其实，这个时候特别不适合巡回布道。中国的旅店在任何季节对习惯于西方文明方便舒适生活的人来说，都会感觉很不舒服。在前面引述过的给主日学校的信函中，狄考文写道：

中国的旅店虽然大小不等，但风格却都一样。你通过一道宽阔的门口走进旅店，事实上这个门口就是面街的一座长长的、低矮的房屋的中部。这道门或者说是过道的一边，有个厨房，厨房通常有一两把茶壶，一口大水缸，几个碟子，一把剁肉刀，一个剁肉用的案板。一般情况下，远处有个分出来独立的屋子，作账房和仓储之用。过道的另一边很宽敞，有两英尺高用泥砖砌成的平台¹（胶东俗称炕——译者）。这个平台就是赶骡子的人和

¹ 这里所谓的平台（platform），实际上应是胶东地区农村普遍使用的“炕”，只不过不是建在屋里，而是在院落里搭的棚子下。下文砖砌的“平台”，则是屋子里的“炕”。事实上，所谓砖砌的，也只是炕的一边的外脸是砖砌的，炕面，无论是屋外棚子下的炕，还是屋里所谓砖砌的炕，都是混有麦草的干土坯。只有这样建起的炕，里面才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烧柴草取暖。狄考文作为美国人，初来乍到，对这些情况不很了解，从而在日记里才有了这样的记述。

卑下的旅客睡觉的地方。在这一建筑的后面，有一个院落，院落的一边或两边建有长长的棚子，棚子里有喂牲口用的槽子。在这个院落远一点的地方，有的是在这样的院落的一边，建有供客人住的房间。这些房间里除了一张桌子、一两条长凳和一张粗糙的木板床或者一个砖砌的平台当床以外，没有其他家具。旅店不提供毛巾、肥皂或其他盥洗必备品。他们通常提供一个洗脸盆，这个洗脸盆除了用来冲洗骡子背部的痛处或作一些其他必要事情之外，大家传着轮流使用。没有炉子或其他方式为房间取暖。有时候，旅店在砖砌的床下烧火，搞得满房间是烟。或者你也可以订一盆炭火，这会使房间里充满煤气。旅店的房屋都是一层建筑，没有天棚。屋顶的椽子让烟熏得漆黑，总是挂满了蜘蛛网。房间地面从来没有木地板；时尚一点的旅店，地面铺了砖，一般旅店的地面就是泥土地。夏天，跳蚤和蚊子成群结队，向所有来住店的人发起攻击，丝毫没有尊重人的意思。旅店的院子里，每天夜间都有演奏的，隔一阵子演奏一回，直到天明，所有客人都可以免费欣赏。驴、骡的叫声，赶骡人的叱责和咒骂声，成了这种夜间演奏的伴奏。在美国经常听到的十分响亮的声音，当十几头或两头中国驴子一起叫或互相竞争声音高低时，除了真正的悲怆和

令人精神兴奋的效果之外，没有什么比得上它们的声音响亮。旅店没有公共餐厅，订饭和吃饭都是在客房里。饭食一般都是按盘索价。

很不幸，狄考文和郭显德第一次巡回布道，就选择了一年中跳蚤、蚊子和其它害虫最多的时候，因此他们吃了不少苦头。

他们只出去了四个星期，旅行 225 英里。旅行期间，大部分时间下雨。因为下雨，他们在莱州府滞留了一个星期。他们在莱州临时住进了一间漏雨的屋子，雨漏得很厉害，以致不得不用油布和雨伞遮挡，地面积水有三英尺深。有一天，他们蹚过 24 条溪水，这些溪水虽然不深，但常常给他们的行李带来不少麻烦。他们一度曾雇了辆苦子，驮驾苦子的两头骡子瘦骨嶙峋，快要死掉的样子，其中一头是个瞎子，动辄就要滑躺下休息，偶尔还会躺到泥坑里，或倒在斜坡上。赶骡人用尽了各种办法，但大多数时候不见什么效果。在这一地区，外国人依然是新奇的，常常吸引大群的人围观，人们来听听，拿本书读读，想搞明白基督教义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一个男人坚持要拿走一本书，狄考文不得不把他赶走。他们两个人每人都在各种场所讲道 40 次，他们最大的成就是散发书籍，大部分书籍都是出售的，这些书册总计 277000

页。狄考文的日记详细记述了这次旅行的情况。如果作为在山东讲授福音的初始档案保留下来，这些日记会引起中国基督徒的极大兴趣。

翌年春天，狄考文和郭显德在中国助手的陪同下再次巡回布道，出售书籍。狄考文4月5日从登州出发，5月19日返回了登州。他们这次带了28箱书，每箱约70磅重；由于带的书散发完了，他们没有到达最初想去的地方就返回了。这次巡回布道中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他们到过潍县和青州府。潍县现在是北中国美国北长老会最大的布道站，也是山东基督教大学文学院（也称文理学院——译者）的所在地；青州府则是现在山东基督教大学神学院的所在地。北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在这两座城镇联合行动，共同合作。关于潍县，狄考文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述：

我们只是在城郊一带走动，并没有穿城而过。街上到处都是人，他们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和轻蔑神态。在潍县城附近，我们见到了很多雅致的拱门，了解到这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周围许多讲究的墓地，坚固美观的城墙，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今天走过的各处乡村，也都非常富庶。路上一位似乎了解情况的人告诉我们，城里有一位最富有的人，拥有300万两银子（这要比

数百万美元身家的人都富有)。

青州府引起了他更广泛的注意。他说这座城市明显要比它曾经规模小得多，但依然够大，商业繁荣。他对周围乡村极为赞赏。的确，他看到的景象深深吸引了他，有些景象甚至令他回想起宾夕法尼亚“老家”的自然景色。当然，并非他们所走过的地方都这么美好，总体上说大部分事物远非那么吸引人。

这次巡回布道经历丰富，其中有些经历很不愉快。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好奇的成年人和孩子们都会围上来。这种情形在潍县和青州府尤其严重。当他们在旅店住下之后，想独处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在窗上窥视，或窜进他们的房间。有些时候，他们**不得不**泼水或用细藤条把窜进屋子里的人轰走。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对他们使用的无礼称呼。狄考文写道：

我每到一个村庄，耳边就会响起“洋鬼子”、“洋鬼子”这个词。他们并不总是冲着我喊，而是在他们相互之间喊着，过来看我们。不过，我听起来常常觉着是非常恶毒的语气。我认为在最后两天，至少有一万张嘴喊出了这个词。很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词会这么普遍流行？这表明，与其说是他们憎恨福音，不如说是中国人

对外国人持有民族敌意。

现在的情形令人感到愉快，中国人已很少再用这种称呼迎接外国人了。在张庄 (Chang Tsau) 遭遇了两次严重骚乱。第一次是一位类似占卜的人引发的，当地人很信任这样的占卜人。当时是一群围着在那里卖书的狄考文，这个占卜的人挥动着很难看的一把长矛，冲了过来，声音激动地说“哼，哼，我要杀了你”！并用长矛对准了狄考文的胸膛。狄考文在巡回布道的早期阶段，当到一些可能受到攻击的地方时，为了防身，总是携带一把转轮手枪，他认为他在道义上有权保护自己不受坏人的侵害。面对这种情形，他立即拔出了手枪。当那个人离得很近的时候，狄考文抓住了长矛，警告那个人说如果他再往前跨一步，后果自负。占卜人没有勇气承担风险，狼狈地离去，但嘴里还在咒骂着传教士，威胁要回头来杀了他，并诅咒那些买书的人。骚乱过后，原来那些要买书的人就不那么想买书了，有一位官员还劝说狄考文不要再卖了，但是，部分地是为了表示对这种事不太在意，他坚持继续卖，最后直到他太疲劳才收了摊子。

另一事件的发生，与在一个集市售书有关。有个人趁狄考文从购书者手里收钱之机，拿走了一本书，但被狄考文发现并让他

把书送了回来。这件事导致了中国助手与偷书那个人之间的争吵，随后两个人厮打起来。骚乱开始蔓延，一帮似乎事先安排好的几个人袭击狄考文，就在这时，他向人们提及他有枪，这才使骚乱平静下来。为了向人们表示传教士是在根据条约做合法的事情，不能忍受侮辱和侵犯，他们要通过该地方官员要求赔偿，并警告那位偷书的人说这件事将向美国在烟台的领事报告。

此后至 1869 年，未见到有关旅行布道的记录。1869 年 2 月下旬，又一次巡回布道。这次旅行时间不长，巡回地区也不广。狄考文夫人邦就烈和她的姐姐玛吉 (Maggie) 已经在狄考文的陪伴下向大量妇女宣讲福音。是年 7 月 21 日，狄考文夫妇开始了一次长达 12 个星期的旅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到招远，那里有一位年轻的热心皈依者开办了一个小教堂。关于这位年轻人的故事，将在另一章予以最恰当的叙述。

1869 年 11 月 10 日，狄考文夫妇启程开始为期 24 周的旅程。这次旅行，他们总计行程约 250 英里，有些路段多山，崎岖难行，天气也很冷。启程后直接向目的地进发，所要去的地方有一些皈依者，这些中国基督徒已经开始向他们的邻居传布福音。目的地之一的莱州，有两位当地基督徒一直在散播荣光，其中一位还建

了一座宽敞的小教堂，这座小教堂附设一间客房，狄考文夫妇来就住在这里。在这里的三天时间里，他们向很多人讲道，特别是最后一天，所有反对情绪都一扫而光，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来听讲。在平度县的一个村庄里，他们主持了安息日礼拜。在一封给差会本部一位干事的信中，狄考文写道：

小教堂里拥挤不堪，几乎不能为当地基督徒履行任何正规仪式。最后，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主要仪式推迟到晚间进行。我施洗了五名信徒，其中四位先前已经被接收为信徒，另一位虽然没有经过很好的指导，但信仰诚挚，我们觉得不应该拒绝他。洗礼之后，安排了圣餐。这一次的境况，是我有幸主持的最有趣的一次礼拜仪式。这里是登州长老会布道区最远的地方，已经建立了一个传布福音的据点，一位中国基督徒为了礼拜真神，单独建了一座房屋，他的同伴中大多数人都未曾参加过这种礼拜仪式，这次礼拜成了他们长久难以忘怀的事情。

1873年2月13日，他和隋斐士（Crosset，当时在登州学习汉语——译者）启程开始了长达三个月之久深入山东内地的一次旅行。这次旅行总计行程约1000英里，在100多个城镇布道、出

售书籍。有一次，狄考文受到了一个拿着粪叉子的人的威胁，有一次被人群里一个歹人扔石头击中。通常所到之处人们都呼喊他们洋鬼子，但总体上说，并未受到恶意干涉。在这次旅途中，他们访问了泰安，参观了岱庙，登上了神圣的泰山。他们在泰安逗留了一个星期，在岱庙中向成群结队的人们布道。他们还参观了孔子的墓地孔林，以及孔林毗邻的纪念、祭祀孔子的华丽的孔庙。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多少外国人见到过这些中国的圣地；现在太多的外国人已经经常地描述这些圣地，几乎已不再注意正当地引证狄考文日记中关于他在这些圣地看到的事物和做过的事情的丰富而有趣的纪录。在那以后，他们去了省城济南府，狄考文在省城滞留了 18 天，而隋斐士则由一直在山东活动 6 或 8 年时间的苏格兰圣经会 (Scottish Bible Society) 的一位代表陪同，又向北、向西旅行，行程达 200 英里。在这次旅行结束时，他们认为在山东大部分地区出售书籍的工作，此后应当更深入地到下面一些地方去。在省城期间，狄考文部分时间布道和出售书籍，部分时间留在他下榻的旅店里接待来访者，在此期间，有不少人来访。对狄考文来说，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他看到了黄河。在返程途中，他们去了青州府和平度县，这两处的基督徒那时遭到了迫害威胁。

这次旅行之后，他仅进行了一次这种专门长途布道旅行。一些新设立的教会以及其他事情，需要他不时走出家家门或远或近地到处转转；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他也顺便做了大量布道工作。例如，1881 年去济南府参加一次差会会议时，就顺便在 160 个村庄中布道。专门去从未传布过福音的地区做长途旅行的布道工作，他不再做了。1875 年 6 月 28 日，在写给表妹吉尔格瑞斯特 (Gilchrist) 夫人的一封亲切信函中，他说：

在到中国后的最初一些年间，我经常长途旅行，在各地街上布道、出售书籍。过去两三年间，我不再经常长途旅行布道了，而是一直更多地忙于我开办的学校事务。长途旅行布道主要由差会里的年轻人来做了。现在我正在著书，准备出版，这占用了我大量时间，将来我的时间也主要花在这方面。

上面提到的他的最后一次长途巡回布道是 1878 年，10 月中旬开始，11 月中旬结束。这次出来是在平度和莱州府广大地区巡回布道。这次巡回布道团的成员有狄考文、梅理士、狄考文夫人、邵夫人 (Shaw)，以及两位中国助手。狄考文夫人和邵夫人造访当地基督徒，男人们则到一些没有教会的地区。狄考文在写给美

国北长老会国外差会本部的一封信中说：

我们每个人都雇了一头驴驮行李和书籍，而我们这些人则从一个村庄步行到另一个村庄，在各村的街上讲道。我以这种方式讲道 190 个村庄，梅理士大约也这么多。我们避开大道，去一些以前从没有外国传教士去过的村庄。各地听众从十来个人增加到二三百人。有时候，听众中妇女占很大比例。每次听讲人数差别很大，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计数。有些时候，很多人围观并听讲；而有些时候，似乎没人关注我们，很多次在我们吸引一群人即将讲道时，有些人又溜走了。在有个村庄，我没找到一个人来听道。有很多人来看我们，但他们根本没停留就从我们身边过去了。有个小孩子，冒险前来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但附近一个正干活的男人，立即因为他同我们谈话对他予以斥责，助手和我坐在那里等了半个钟头，然后去了下一个村庄。我们手里拿着一些书，作为我们要讲道的一种广告手段，并把这些书分发给想要的人。有时候很容易把书分发出去，多少书都能分发出去；但经常的情形是谁也不要我们的书，一本都分发不出去。很明显，有些人非常想要一本书，但他们羞于在那么多他们的邻居和熟人面前接受大家都憎恨的外国人给的一本书。向我们公开表示敌意

的情况只有两三次，而且仅局限于两三个人，没有成群结队的人跟着起哄，所以尽管他们企图驱散我们的听众，但依然有很多人听我们讲道。

关于这种传道方式的价值，他认为自己从来都有清楚的认识，接着又重述了这种传教方式的要旨：

这种布道方式非常好，同时也很辛苦。这样传教可以深入穷乡僻壤和那些呆在家里不出远门的人们中间，否则是不能向他们布道的。在一年中人们有空闲时以这种方式布道，是会成功的。

第八章 登州蒙养学堂

“我认为，差会学校对当地学生实行智力、道德、宗教方面的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使他们皈依上帝，而且要使他们在皈依上帝后，能够成为上帝手中保卫真理事业的有效力量。另外，传播西方科学和文明的差会学校，还必须花大力气搞好学生的体育和社会教育”。——摘自 1877 年在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宣读的论文

——《新教差会与教育的关系》。

美国北长老会差会本部于 1884 年授权登州蒙养学堂办大学。登州蒙养学堂在此之前数年已经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因为那些年间它已经在进行高等教育。与此同时，它依然保留了小学教育和中等教育。在这一章中，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将主要重点叙述登州蒙养学堂从开办到被正式授权更名为登州文会馆这 20 年间的历史。正式更名之后，登州的这所学校则属于在登州的文会馆 20 年以及随后在潍县的广文学堂(即齐鲁大学文理科)的历史，留待后叙。

1864 年 4 月 2 日，狄考文在他们夫妇到登州还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已经计划开办一所学校”。那时他们的计划是梅理士夫妇留在观音堂，他们夫妇去找另一处可以居住和开展他们事业的住所。但是，这一年的夏末，梅理士夫妇搬走了，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在观音堂院子里修建一些小建筑，以便开办寄宿学校。是年 9 月，登州蒙养学堂开学，招收了 6 名异教徒男孩，这些男孩以前从未读过书；学堂有两间宿舍，一个厨房，一间小教室。教狄考文学习汉语的张 (Chang) 教这些孩子读

书；一名当地妇女为孩子们做饭。狄考文总是把这所学堂归功于邦就烈，因为最初十年间，学堂几乎完全由她管理，狄考文则在做别的工作。许多年后，在同上海的费启鸿夫人¹的一次谈话中，他说：

邦就烈在登州开办寄宿学堂之初，我认为那是相对说来不费力气的一项工作；但随着学堂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我看到那不再是她独自所能承担的工作。我知道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了，我能做的只是她以前做的一些工作。

在约半个世纪前登州蒙养学堂开办时，以及后来一段时间里，无论低等或高等教育，差会和传教士都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将其看作是在非基督教世界传布福音的媒介。有些非常重要并了解情况的人，坚决认为一位受命作牧师的人在学校里教书，不合天职，因为他已经不专心于传教工作了。为了支持这一立场，他们引证使徒范例，并指出以前传教士试图通过办学校使人皈依上帝的效果微不足道。主张开办学校的人，在办学的直接目标问题上也意

¹Mrs. Fitch，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费启鸿博士的夫人。费启鸿 1888-1914 年间曾担任北长老会在上海开办的美化书馆主任，狄考文在上海出版他的著作时，就住在费启鸿博士夫妇家里。参见本书第五章。

见不一。是不管其他，一心把基督教学校的学生们培养成基督徒，并由此建立中国传教士队伍呢？还是要把开办基督教学校看作是为以后传布福音播撒上帝真理良种准备土壤的有效途径？在本章开头引述的那篇论文中，狄考文对这些问题作了适当充分的讨论，在公正地概括了这两种意见之后，陈述了他自己在开办学校之初就已经确立并终生恪守的坚定信念。他否认教育作为传教媒介比其他媒介重要的观点，尤其反对把兴办教育凌驾于传布福音之上。关于这个问题，他从教育的特性和经验出发，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一些主要原则性意见。他说，为了培养高效可靠的牧师，为了造就基督教学校的教员，并通过他们向中国引进西方先进教育；为了培育带头引进西方文明中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人才，作为接近中国上等阶层的最好途径，使本地教会自力更生、坚定其抗御内部迷信习惯的侵蚀和外部有教养阶层怀疑宗教论者攻击的信念，应重视教育工作。在阐明了这些问题之后，他又深谋远虑地进一步指出：

只要中国的基督教著作是外国人的作品，中国本土教会就永远不能摆脱软弱、依附的地位。中国急切需要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本土传教士，这些人要能够著书立说，保卫和强化基督教义，

并将其运用到中国的教会实际工作中去 ... 另外，随着中国本地基督徒数量的增多，以及散播内地，他们将日益摆脱外国传教士的直接教诲和控制，因而将出现遭受异教迷信侵袭和中国经典有害影响的危险。五花八门的迷信在人们心中有共同的土壤，迷信形式时常变换，但本质不变。中国形形色色的迷信不易消亡，除非经常地对其进行地抵制、搜寻和揭露。不然它们就会混杂于基督教之中并损害基督教的名誉 ... 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不会太久，西方文明在中国广泛而迅速传播的日子，将会很快到来。谬误与真理传播得一样快。面对异教，击退他们的攻击并维护真理，需要高等教育。没有文化的基督徒能够抵御没有文化的异教徒，但却不能抵御有文化的异教徒。总之，一言以蔽之，不能单纯地将基督教引入中国，我们要依靠教育这样的武器和支持，确保基督教不受侵蚀，维护它的纯洁，保护它不受所有魔鬼的侵犯。

为了实现上述关于基督教学校的理想目标，他断言：基督教学校应当进行高等教育，尽管不排除初等教育；自然科学在学校教育中应置于突出地位；应从基督教家庭中招收学生，而不是从异教徒家庭中招收学生。关于人们疑虑的从西方引进教科书的问题，他宣称已经着手进行。

必须承认，早在开办登州蒙养学堂时，狄考文就有了上述思想。但是，他又不得不可怜地做一些几乎毫无理想可言的事情。首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得设定条件，招到值得教又能够教的学生。这些条件之一，即是学生家长要签订契约，保证让孩子留在学堂6—7年时间，以便可以学完规定的课程。不然，学生们由于自己或家长的原因，随时离开学堂，他们就会受异教的影响，所受的基督教教育等于是白费。另一方面，这一契约要求学堂不仅免收学费，还要免费为学生提供食宿、服装等。逐渐地，这一规定有了很大变化，改由家长准备衣服、被褥及书本。为了满足学堂开办经费，要确定每个学生的平均费用，努力在美国各主日学校得到够学生花费的捐献。在中国的家里，考虑促成美国某所主日学校资助登州蒙养学堂的某个学生的计划，由于学生行为的不确定性，很少落到实处，结果常常令人失望，备受挫折。为了每年都能获得这样的捐助，必须仔细的写好一封信函，然后再抄写，起初是手写，后来平版印刷，寄给每一所承担捐献的主日学校。这些信函具有很高价值，其中含有中国人生活的某些重要阶段的所有内容，以及差会工作的方式方法。把这些信函结集出版，或许更能显现其价值；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则会名列同类

著作中最好的著作之列。准备这些信函，使他们的工作和花销倍增；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邦就烈付出了极大努力，最后甚至一个人承担了除印刷外的全部工作。

登州蒙养学堂的学生最初预计每人平均 40 美元，但数年后随着物价的上涨，这个数目已经不够了。由于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加之其它一些问题的解决，登州蒙养学堂不仅得以很好地继续开办，而且学生数也在不断增加，全部招收寄宿生，毫无问题。办学之初，学生都出生于没有条件就读中国学堂的贫穷家庭，而这些学生在狄考文办的学堂读书，除了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外，还能解决吃穿问题，结果就使穷孩子不再顾及人们关于他们屈从可恨的外国人的责骂。在基督教新教初传中国的时代，这种情况非同一般，因为事实上，在义和拳事变之前，即使是基督徒父母，送孩子到登州传教士办的学校读书，也是不多的。一位早先在登州蒙养学堂学习，现在已经是受尊敬的中国牧师写道：

在父母最初送我上学的时候，全村人都强烈反对。他们恐吓我母亲，说外国人是吸血鬼，能用魔法吸干孩子身上的血。我必须承认那时我很小，被吓坏了，可我还是被送去上学了。当我寒假回家的时候，那些邪恶预言家都来对我进行仔细检查；在发现

我不仅脉搏跳动正常，而且脸色、身体都比以前好之后，他们就说我才在那里呆了三个月，还不到出恶果的时候，等着看吧！德国占领胶州并开始修筑铁路以后，我们那一带的谣言就更凶了。人们说每块枕木下面都得埋一个小孩。还说为了给“火车”轮子提供润滑油，必得榨人油，谁都能见到，火车上的大汽锅就是榨人油用的；那些新翻起来的大土堆下面，埋的就是人骨头。

天津教案发生时，盛传狄考文养肥蒙养学堂的孩子，是为了杀了他们挖眼、掏心，制造迷人药。

除了公众骚乱、流行病等原因造成的短暂间歇，登州蒙养学堂总是满员办学。学堂开办的第二年，有学生 12 名，是第一年的两倍。应当注意的是，1867 年狄考文建造并搬进了新住宅，这样就把观音堂地方腾了出来。在写给差会本部申请建造新住宅的信中，狄考文写道：

我们不打算放弃观音堂，而是要把那里用作办学之用，那是个极好的办学场所。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学校扩大。然而，我们现在的学生已经占用了所有我们能腾出的房间；如果要扩大招生，我们不仅要建宿舍，而且要建大教室。确实，这不需要花建一所

外国房子那么多钱，但也不会是像你们可能想象的那么少。主建筑要有一或两间最值得称道的教室，这样的教室将适用于我们将来可能拥有的任何学校。主建筑的一边，要建非常方便的餐厅和厨房，另一边，可建一些辅助性的空房，稍加整修即可，至少应比我们现在的房屋多出十间。这很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办到。

虽然上述设想眼光极其宏远，计划为登州长老会差会做更多事情，也为自己和妻子健康和舒适地生活，但那时他还没有预见到蒙养学堂会发展为文会馆。



登州文会馆蒙养学堂时期最初招收的六名学生

登州蒙养学堂开办之初，由于语言不通，只好雇用一位中国

人，狄考文和邦就烈都不能参与教学；所有教学工作都由这位中国助手负责，他是一名基督徒。然而，不久以后，尽管这位助手依然做教学工作，但狄考文夫妇已能开始参与教学了。学堂用中文教授学生读写，以便他们自己能学习圣经和其他我们希望其学习的书籍。算术是学堂初级班的课程之一，一开始就由狄考文负责。狄考文夫人教授地理，向孩子们介绍中国以外的世界，开阔他们的视野。她每个星期还有三次特别难做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教孩子们唱歌。当然，学堂有早祷，在教室里举行。早祷仪式包括唱赞美诗，朗读新约全书一个章节，以及祷告。学堂也做晚祷，亦是在教室进行。安息日上午，所有学生都去中国小教堂。下午，开设主日学校课，学习圣经，狄考文教大点儿的孩子，狄考文夫人教年龄小的孩子。安息日晚祷时，狄考文要挨个提问学生上午所学的圣经内容。登州蒙养学堂，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开办起来，并踏上了向迄今人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迈进之路。

登州蒙养学堂开办三个月后，由于有的学生家长不愿签订把孩子留在学堂规定的年限的契约，当初招收的六名学生曾减为三名。学堂开办十年以后，狄考文在一封给美国主日学校的信中说：

我们的学生有 9-10 岁的，有 18-20 岁的，他们中有些已经在

学堂学习 7-8 年了。如果招收来的学生从未上过学，我们希望他们在校学习 12 年；如果他们入我们学堂前已经在本地私塾读了几年书，则可据情少学几年。我们试图招收读过书的学生到学堂来学习，因为这样既可节省劳动，也可节约金钱。

在登州蒙养学堂开办第 25 个年头这一年的年末，狄考文说：

这些年间，我们招收了许多不成材的学生。有的是因为太笨拙，在能够阅读和了解一些圣经知识之后就因为他们送走了；有些坏孩子，被我们开除了；有些是不愿继续读下去自己退学了，或者是他们的父母想要他们在家中劳动把他们领回去了。我们也筛选出了一批好学生，他们很聪明，有望成为优秀人才。

在学堂开办的第十个年末，筛选留校继续读书的学生，尚不足总招生数的一半。关于学堂的日常学习工作情况，狄考文写道：

学生早上 6 点钟开始学习，8 点止。然后，全体到大教室做早祷。早祷之后，休息一小时，吃早饭。9 点半钟，再开始学习，直至 12 点半。下午，还有 4 个小时的集体学习时间。在冬季白天最短的时候，早晨的学习时间挪到晚上。这样的学习时间安排，

在当地县学是很普通的。最初，我们认为这么多学习时间，对学生健康和学校工作都不利，但试行了几年之后，我们确信，对中国学生和中国人的学习方法来说，当地人这种安排是最好的。中国各类学堂里最重要的教学内容是熟记经典，学生们可着嗓门有节奏地吟诵，一个人一个腔调，很明显都在试图使出全身力气要盖住别人的声音。他们制造的这种噪音会使我们头晕脑胀，但中国教师似乎很享受。这种高声朗读记忆，要花更长的时间，或许对肺部有好处。当我和邦就烈到教室去的时候，当然是不让他们这么高声读，而是要他们默读。我们学堂的学生约有半天时间学习基督教和科学。基督教方面，他们学习基督教义问答集、“天路指南”(The Peep of Day)、旧约历史、“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天道溯源”(Evidence of Christianity)，背诵圣经某些章节。科学方面，他们学习地理、古代历史、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他们还学习唱歌、写作和辩论。他们学习的中国课本是主要内容为记述孔孟言论的《论语》、《孟子》，以及大量的诗歌。这些中国书教人们诚实、正直；教孩子们要顺从父母和兄长。另外，这些中国书籍里还包括大量人民对统治者和统治者对人民的责任。这些书称颂优秀和有道德的人，劝导所有人要

过有道德的生活，但除了称颂人类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内容。关于神或来世，这些书没有任何论述。这些书都是用一种被称为文言写的，文言对中国孩子来说，就像拉丁文对美国孩子一样。所学的这些书，学生都要记住，在教师面前背诵，尽管他们并不明白所背内容的意思。当一名学生能把一本书从头背到尾的时候，教师才开始向他解释书的内容。学生既不知道语法，也没有字典帮助，只能从他们老师的嘴里学到一切。当一个成年人能够把这些书都背诵下来，并能明白它们的意思，可以用文言写文章的时候，中国人就认为他是一位学者了，而当一名学生在这方面达到这一程度，并且**掌握了**我们上述学堂开出的其他所有课程内容后，我们就认为他完成了学业，他就可以从我们学堂毕业了。一名男孩学习 12 年要毕业的话，必须头脑聪明，而且非常勤奋。

学生们的服装当然完全是中国布料做的中国样式，饮食也是中餐。宿舍房间低矮，泥土地面，学生睡在土坯垒砌的炕上。狄考文在上面引述的信中继续写道：

在我们这样的学堂里，给学生上课只是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我们还要通过各种办法，为学生购买和准备饭菜，防备饭菜被人

偷了，注意不让学生浪费；为学生准备不同季节的衣服，并要为他们缝补和浆洗，照顾他们不要把衣服弄坏了；倾听学生们的抱怨，评判和解决他们之间的争吵；必须规劝和训斥那些坏孩子，或许要用种种手段对坏孩子进行惩罚，想法要他们做守纪律、诚实、可靠的人。我们也注意培养他们勤奋刻苦、不屈不挠的习惯，没有这些教育，他们将是不健全的。这样说来，你们就会明白，培养这些学生，使他们成为优秀的有用之才，需要大量的劳作、耐心、信心和祷告。

上述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但我们要了解狄考文与这一工作有关的生活，却不能忽视这些琐事。

在任何一所有这么多和这么复杂年龄段学生的学校，惩戒都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而在登州这样一所中国学堂，事情更是特别难办。有些事件，非同一般。撒谎、偷盗、吵架、贪食甚至于鸡奸犯罪，都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进行处理。狄考文的日记里有对一次惩戒事件的描述，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值得在这里引述给大家。1869年4月9日，他写道：

本月内发生了一件十分令人苦恼的事。雷俊基 (Leon Chin

Chi) 在与尚云 (Shang Yuin) 婚约事情上，遭父亲逼婚，一时绝望，到外面买鸦片，吞服自杀。有的学生觉得他有点可疑，就跟在他后面看。他们发现他躺在炕上，很明显头痛得厉害，除了说一句他的事都结束了之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我从这种情况以及他曾对他的一位同学说再也见不到他了的情形推测，他一定是服了毒，很可能是鸦片。我出去弄了一副强效催吐药，配好要他喝下去，但他就是不喝。为了让他喝下去，我找来了一根棒子，不一会，他高兴地把药喝了。结果恰如所料，他很快就把吞下的鸦片吐了出来，心跳得不那么厉害了。很明显，通过这种方式让他把药喝下去，他有了新的想法。一两天后，当他又来上课的时候，我当着全体同学的面，按规矩狠狠鞭打了他一顿。我认为鞭打这件事情很严重，并觉得我应该那样做。现在我认为，那样做对他有好处。上星期让他站到讲堂前，反复道歉、忏悔。安息日早晨，又对他当众进行了训斥和警告。我对他的软弱感到难过，这极大地降低了我对他的信任，不再那么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有宽恕之心，在本可稍微宽恕一下就过去了的事情上，中国人往往想不开而走极端。这个学生没有从他所受的教育中了解这一点。

与那些简单地把学校看成是为使学生皈依基督的有效机构不同，狄考文把学生皈依基督看作是开办学校寻求和期望得到的主要结果之一。登州蒙养学堂开办近两年后，他非常高兴地为一个人学生施行了洗礼。在向差会本部的一位干事描述这件事的时候，他写道：

他是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事实上早就是一位成年人了，尽管还没有完成学业。这两三个月以来，他一直觉得他有责任信仰基督，但由于他天生谦逊，不愿出风头，没让人知道他的愿望。最近，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对母亲有着非同寻常的依恋，于是，他作了最后的决定。在谈话前进行的考察非常令人满意，这表明他很好地利用了学习真理的机会。我对他未来的作用抱有很大希望。他头脑聪明，是一个极其勤勉的学生，如果加以培养，得到圣灵的教导，对我们来说，有可能成为一个向异教徒布道的不可多得的人才。

三个月以后，他又描述这位年轻人发展良好，操行堪称楷模，并补充说：

非常欣慰，现在我可以说一下那位年轻人受洗以后的情况。

他是学堂中年龄最大的，事实上几乎是位成年人了。他皈依基督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有一个过程，这几乎与所有中国人的方式一样。然而，我们相信他是上帝真正的孩子，我们强烈希望，假以时日，他将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人才。

翌年，又有三位年龄最大的学生加入了教会。这一学期还考察了另外两位学生，但认为最好再等几个星期；另外一些希望加入教会的则暂不考虑。就这样，皈依基督的学生日渐增多，到蒙养学堂成为文会馆时，凡是毕业的学生，以及几乎所有在读的大年龄的学生，都表示信仰基督。

邦就烈的姐姐邦玛吉 (Maggie Brown) 早就加入了登州布道站，在蒙养学堂创办初期，对蒙养学堂的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1871 年，她同哈丕森 (Capp) 先生结婚。狄考文确认女子学堂是必须设立的机构之一，他的理由是女子学堂在为他训练的年轻人培养合适妻子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结婚之后，哈丕森夫人即负责一所女子学校，她和妹夫狄考文在办女校方面继续合作。为了教学需要，她翻译了一部心算课本，在这方面，狄考文给予了帮助。郭显德博士说：“尽管在获得永久、得力的工作人员方面总是令人失望，缺乏帮手，但他在支持女子学堂的事情上从

不犹豫，总是为女子学堂的发展出谋划策，因为他认为基督教会要取得最终成功，女子学堂是个基本的必要条件。”在狄考文的鼓励下，哈丕森夫人去世时¹，把她的微薄积蓄捐献给了女子学校，用于校舍建筑，她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登州女子学堂。

登州蒙养学堂创办后 13 年才有正式毕业生。首班毕业生共计三名学生，他们学完了全部课程。在这三人毕业时，登州蒙养学堂所设课程，已经突破了前述范围，大加扩充了，包括天文学。登州蒙养学堂的天文学教科书是一部很好的天文学教材，水平极高，为翻译的赫歇尔（Herschell）的著作²（应为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John Fredrick William的《天文学纲要》——译者）。狄考文谈到这第一批毕业生时说：“他们很可能至少要从事一段时间的教学工作。目前，需要更多的是教师，而不是牧师”。关于首届毕业典礼，狄考文在 1877 年 5 月 2 日这样写道：

¹关于哈丕森夫人即邦就列的胞姐邦玛吉去世的时间，据连敬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哈丕森于 1871 年（同治 10 年）即结婚当年就病故了，哈丕森夫人则是 1885 年病故的（参见《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 1937 年版，第 183、171 页）。但据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所著《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一书，邦玛吉是在“1873 年和 1874 年”间去世的（参见 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P.48）。孰是，待考。

² 应为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John Fredrick William的《天文学纲要》。

我们所有人都参加了这次毕业典礼。毕业的年轻人的毕业感言非常精彩，对学堂的整体影响令人感到十分愉快。在校学生清楚地看到了他们前面的明确目标，树立了朝向这一目标前进的雄心壮志。

下面是关于这一年的情况报告：

三位毕业生都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们在中国语言、文学以及西方科学方面的成绩都非常优秀。其中一人去了杭州，负责那里的一所教会学堂，该校比登州蒙养学堂早创办几近 20 年，繁荣兴旺。另一位去了烟台，在苏格兰长老会一所学校中教书。第三位去帮助倪维思博士开展广泛的农村工作，我确信他将对倪维思博士的工作给予最有价值的帮助。我们以前的一位学生，去年一直在学校教学，今年也去帮助倪维思博士开展工作。虽然知道这种工作要比教学更艰难，而且薪金少，但他自愿去做。我们希望明年多招学生，担心想到这里来上学的太多，难以容纳，我们将尽最大努力。

1879 年 5 月至 1881 年 1 月，狄考文夫妇第一次回美国度假，不在中国。在这期间，登州蒙养学堂由其他传教士负责，虽然没

有一位常设监督，但学堂运转良好。狄考文夫妇返回时的欢迎场面，必定令他们感到格外愉快。在 1881 年给主日学校的信函中，他对这次欢迎情形作了如下描述了：

我们乘坐苦子从烟台到登州。天气很冷，地面铺满了雪。不过，我们一路上很舒适，并安全抵达登州。学生们已经听说我们要来，准备好了迎接我们。我们到登州是在星期六下午，学生们没有课；他们都来到了城外，在路上迎接我们。他们列队欢迎我们，喜气洋洋的脸蛋，愉快热诚的表情，使我们觉得确实是在欢迎我们回到登州。他们的面容看上去很熟悉，虽然有一些年龄较小的在我们休假期间长高了很多。到登州的第二个星期，学校放假，过中国新年。

1881 年下半年，狄乐播¹和莉莲²前来加强布道站的工作，他们感到非常高兴。狄乐播一直是山东美国北长老会中最能干的传教士之一，现在仍然在做着非常杰出的工作。莉莲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姑娘，她的工作表明她也是一个非常称职和成功的教师。后来，她同萨缪尔·沃克 (Samuel Walker) 先生结了婚。由于沃克

¹ Robert Mateer，狄考文的三弟弟。

² Lillian，狄考文最小的妹妹，当地人当时称其“狄姑娘”。

先生的健康原因，夫妇被迫返回美国。

1882年，学堂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似乎可说是学堂创办以来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学生数增加到了65名。新来的学生是根据学堂的招生能力，经过考试挑选进来的，都是一些在工作和品格上极有前途的人，其中有些是已经有很好学习基础的青年人了。学堂生源扩大的根源，在于总体上说学堂在中国人中赢得了声誉，也有中国基督徒数量增多的原因。或许，最大的改进是学堂学生素质和所学课程；学校拥有了更多的经过考试选拔的高素质学生，设置了更充分、程度更高的课程，完成学业后可获得**正式公认**的学校文凭。

翌年，鉴于学堂过于拥挤，没有足够的足以使这里的学生在思想和生活习惯上明显优于他们同胞的必要设施，又建了一处建筑，增加了设备。当然，学堂的发展以及不同层次的课程设置，必须增强相应的师资力量。有一些毕业的学生，被留在了学堂任教。莉莲在这里帮助工作了一段时间，但同沃克先生结婚后不久，就不再为北长老会工作，并离开了登州。1883年秋天，赫士(Hayes)夫妇的到来，给学堂带来了重要和长久的帮助，他们在这里的大量工作情况，将在类似这样一部适当传记中予以介绍。邦就烈一

生事迹，本应在这里叙说她在学堂中的杰出业绩，因要另外写一部适当传记进行充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狄考文在这所学堂的工作，只从事部分课堂教学，但无论什么课，总是非常明显地展示出他自己的特色。他和邦就烈都十分重视个人影响力，不很愿意招太多的学生，以免因此而难以很好地对学生进行教育。郭显德博士说：“作为一名教师，他十分热心，也极为成功。他总是极其认真，从不马虎；所以他能够注意到每一个学生情况。任何想欺骗他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学生们每当要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感觉不自在，除非他们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结果，他很高兴地看到，每个学生——无论年龄大小，在他面前都中规中矩，勤勉自持，决不敢耍滑头、做错事。Matter 博士的姓，在中文中念狄，tiger 中文叫做老虎。他的学生有时候说他是狄老虎，那是有所指的。他全身心地笃信宗教，力求以各种正当的方式在这方面给学生以深刻影响。一般说来，基督徒的最高职责是福音牧师。狄考文在学堂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培育忠诚、有能力、有教养的人，胸怀圣灵，立志做基督的使者，争取中华归主。正如郭显德博士所说：“为了这一目的，他制定了理智的计划，费尽心思，不停地艰苦劳作、祷告。他用自己的钱无条件地

帮助穷人，把有希望的青年人培养为有用之材”。



上图左边是文会馆的新教学楼；中间的建筑是过去的观音堂、现在的小教堂；右边那根木杆上端有铃，是上下课或集合学生用的，杆子后边的小平房是文会馆备馆学生用的小教室。

以上我们简要勾勒了登州蒙养学堂的历史，它创办以来 20 年间的情形充分展示了它的创办者的智慧和远见。它从创办之初的初等小学堂，已经发展为一所包括小学、中学并最终开设了完全大学水平课程的学校。在它正式更名为文会馆时，有在校生 75 名，其中包括三名走读生。这所学堂总计培养了约 200 名学生，

都来自中国家庭，其中有些是基督徒家庭，很多是异教徒家庭。他们在教会学校的长期训练陶冶下成长，走向成熟，所有学生都公开表明信仰基督。他们学会了过正直、虔诚的基督徒生活；其中有的已经平安地荣归上主。走向社会从事各种职业的学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他们的工作已经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这里要毕业的学生，不仅山东，全国很多地方都要求他们去做重要工作，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这是过去 20 年间所取得的成就，相信未来前景更加广阔。

第九章 出版与著述工作

编著书籍是传教士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决无轻视这项工作之意。但是，要从事这一工作，必须先确认自己是否有必要去做，不能过早地投身其中。相对于实际的福音传道工作来说，人们认为坐在书房里翻译或研究语言文献，不那么艰苦费力，甚至或许更合自己的心意。有时候许多宝贵的时间就这样浪费了，在传教士工作的早期阶段，在还没有能力把握自己能否做这一工作的阶段，尤其如此。确实，很少有一个传教士在他头五年的时间就能写作或翻译一本书，而且即使有人这样去做，也要在他年长的同工建议和同意的情况下。——摘自 1902 年“传教士与语言”

狄考文并没有给国内的杂志报刊撰写过太多的文章。他曾经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经常为《长老会旗帜》撰写关于他和在中国其他一些人所做的差会工作的通信。但此后由于太过忙碌，除了很长时间偶尔写一篇，就未能再连续写下去。他有一两次寄回美国的稿件，比较费力地回击他认为关于中国情况的一些误导性文章，这些文章曾刊登在诸如《普林斯顿评论》上。他极不赞成

在一些琐事上赞美中国人而对他们的国家不久的将来不抱什么希望。他极力地要分析美国在四十或五十年前在中国实行的政策的明智，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在家乡发表他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除了偶尔为国内的报纸和期刊写的这些稿件外，他出版了一两本小册子，多半是应海外差会总部之邀而写的。有时候，他怀疑是否因为自己不像有些人那样经常给国内写稿件而被人遗忘了；但事实上，人们不会忘记他，他全力投入了他亲手开创的其他工作上。

他在中国出版的当代文献中的大多数稿件是写给《教务杂志》的。他几乎整个传教生涯都是在这份期刊上发文章，有些很简短，但有许多是精心讨论直接或间接影响非基督教国家福音布道工作大问题的。他关于中文上帝这个术语的著作，直到 1902 年才出版，当然，是用英文写的，尽管有大量中文文献的摘录。他唯一的另外一部英文著述，是对倪维思博士的《[传道方式](#)》(Methods of Mission) 的评论。

正像我们稍后介绍给大家的，他的中文著述数量相当丰富，其中大部分对传道工作都极为重要；因为他决不允许自己转而去写任何对他奉献一生的事业没有帮助的作品。但是，在他开始利用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书籍之前，要他去负责掌管一家出版机构，

他却不愿去，有些被迫无奈的感觉。原来在上海已经设立了一家差会出版社——美华书馆¹，资金一直是主要用于为上海服务，也一直是由那一地区的长老会传教士们管理。1870年秋天，根据美国长老会大会的命令，组建了“中国宗教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美华书馆的有关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提了出来，交由与会的传教士们处理，这是比较恰当的。狄考文^{时为}大会某个分会的委员，起草了该出版社运营的一揽子计划，宗教大会赞同这项计划，寄送国内差会本部审批，及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必须立即做出规划的一件事情便是要确定负责这家出版社的人选，结果是经过反复推选，任务落到了狄考文头上，但一开始他拒绝出任，直到最后才达成了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案，即狄考文答应如果只负责一年，并且必要时可以在登州住一段时间的话，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要在上海负责一年时间出版社的工作，必须对登州学校的事情做出临时性安排。为此，请朱利亚的姐姐邦玛吉来做这一工作；在帮忙管理学校期间，邦玛吉的工作令人十分满意，同时她还照看狄考文在登州的宅院。关于他在上

¹前身是1844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以下译名均用“美华书馆”这一名称。

海这段临时性的工作，狄考文在日记中写道：

对我来说，去上海工作是个巨大的考验，去那里工作并非没有诱因。在那里将极大地增长我的知识，扩大我对中国和中国事务的了解。我也希望到那里或许会找到对朱利亚的健康很有帮助的办法。很遗憾，为她治病的那位医生已经离开了上海。我最大的遗憾是在上海工作将极大地干扰我的中文学习，使我不能够完成我设计的任务了。

直到 1872 年 8 月，狄考文才返回登州，继续开展那里的工作。

大部分读者很可能对狄考文在上海工作的细节不感兴趣。

1872 年 1 月 29 日，他在日记中说：

我全力投入到了出版社的工作中，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勤勉努力地工作过。原来曾希望到上海后能有时间学习，但到这里工作后才发现这根本不可能。出版任务都很急迫，我只有全身心地做出版社工作。

他的两项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发挥。其一是作为一个生意管理者的做事效率，这种做事效率部分与他的天赋秉性有关，部分是

由他精确、深谋远虑、细心监管及要求所有雇员忠诚工作的习惯所致。他的这一面性格，通过他的“通信册”展示得很清楚。离商品供应地半个地球的距离，要求必须提前 8-10 个月订货。为了方便掌握相关情况，他的每一封商业信函以及许多其他信件，都抄录留底。特别是在他负责的登州的学校逐步发展时，狄考文要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事务。他不仅要提供他的家庭和工作所需要的物品，而且还要充当其他人的代理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他的订单有时候要寄到上海，但更为经常的是要寄到伦敦、纽约或美国内地一些其他地方。由于定购的货物性质和种类的原因——从蒸汽引擎、望远镜、昂贵的化工用品到订书针，许多订货稀奇古怪。有些订货单的货物名称要开列十多页纸。有些伦敦、纽约或上海的商人或代理人不幸弄错了，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对与所定货物不很相符的物品做出充分的说明，出错的商人或代理人就可能收到一封措辞尖锐的信，要求其在可能的情况下弥补过错。登州差会司库的经历，也培养了他这方面的能力。狄考文痛恨那些工作懒惰、磨蹭的工人，有时在日记里痛苦地诉说这是可怕的事。当他卸任美华书馆管理职位后，这个出版社已经组织有序，运行良好，达到了当时条件所能达到的高效

率。狄考文在他主持美华书馆这段时间，成立了一个图书部，一个工作部，**建了**一所监督住宅，为中国工人修建了宿舍，并为这些工人建造了一座小教堂及其他设施。

在上海期间，尤其需要他发挥其另一方面的才能是他机械方面的天赋。在前面刚刚提到的同一天写的日记中的相关记述，能够说明这一点：

我必须要印刷一部日文词典，这是件极为麻烦的事。我的前任曾经允诺出版这部词典，但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工人们要印刷了，但我们必须寄信到英国购买纸张才能印刷。所有韦氏音符也都要加进去，而我们没有字模。我必须把这些字母刻到木头上，做出字模；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有一些字母，至少刻了六遍，但结果还是远不能令人满意。我还刻了一套音乐活字，刻好这套音乐活字花了大量时间，很费事，然后又制成了字模。最终，我的这些工作都相当成功。... 我还大量试验铅版印刷，并取得了成功。我训练了一名学生，在我离开之前，他用铅版制版法印刷了《马太福音》。为了使美华书馆有效迅捷运转，我制作了一座熔炉和一架印刷机，后经多次改进，效果非常好。... 我还做了一个新式的中国活字盘，我认为它比旧式的有所改进。对字模也**进行了**完全

彻底的改造，重新进行分类，做了一个新的活字分格盘。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肯定它将有助于提高美华书馆的工作效率。

狄考文同意管理美华书馆并非是要一直干下去，他只答应干到找到能胜任的人员为止。在被迫同意管理美华书馆一年后要物色这样一个人物时，他直接就想到了他的弟弟约翰¹。约翰原本想上大学，准备当牧师，出国做一名海外传教士，但是，后来由于健康的原因，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关于他在机械方面的天赋以及广泛地运用这一天赋的能力，约翰与狄考文在伯仲之间；狄考文确信约翰很快就能胜任管理上海美华书馆的监督之职，因此建议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总部对约翰的情况进行调查。结果，约翰被选中了，于 1871 年 8 月到了中国。在他能够令人满意地担任其职责之前，还必须学习一些中文，掌握他所要从事的职业方面的知识。因此，狄考文一直呆到了这一年年底；回登州住了三个月后，为了把美华书馆迁到已经选好的新址，他又回到上海。出版社搬家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需要做一个星期的脏活、累活。搬迁主要走水路，大约一英里远，但两头都还有 100 码或更远一点的陆路。这时狄考文虽然已经不是美华书馆的正式主管了，但为

¹狄考文的二弟约翰·劳瑞尔(John Lowrie)，参见本书第一章。

了让弟弟把时间主要用在学习中文和其他必须掌握的知识上，他还是承担了负责搬迁的工作。

美华书馆新搬迁的地址就是北京路今天的社址。在费启鸿(G. F. Fitch) 牧师的管理下，它不仅已经成为长老会的中心，而且成了整个中国所有外国传教士活动的中心。早在 1869 年 11 月写给弟弟的信中，他就谈到了这家出版社，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能使你拓展做有益工作的领域。的确，与像纽约、费城这样一些城市同样的出版社比，美华书馆社不是很大；但它却是目前中国最大和最好的出版社。它不仅为我们所有的外国传教士搞印刷出版，而且为其他人做大量工作；此外，还制作和出售大量活字。”卸任美华书馆的管理职务之后，在帮助约翰步入工作轨道期间，他写信给差会总部的一位秘书说：

我不赞成美华书馆扩大，但我并不想看到出现它目前的效率降低的情况。美华书馆现在所做的大量有益工作，不仅是为我们的差会，而且是为整个中国。由于能够印刷出版各种科学书籍、字典等，它已经在中国和日本产生了一系列巨大影响。撇开传教工作的普遍利益不说，仅就我个人的工作而言，应该说是一个不

小的牺牲，我在美华书馆已经工作一年多了，现在还有我弟弟在这里负责，我对它的未来十分乐观。

我们见到的关于他在上海美华书馆工作情况的最后纪录是：“我们刚刚卖给中国政府大量中文活字。他们要使用活字铅字了。对他们来说，这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将发挥良好作用。中国转变缓慢，但她一定会转向基督教和西方文明。”

狄考文此后一生没再担任过出版机构任何管理职务，但他却间接地继续做了大量与出版事业有关的工作。他是负责出版事宜的山东和北京差会的一个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就此而言，他要了解需要什么书以及有什么书能够出版，以便做出明智的判断。作为朋友，有人私下请他帮忙，他即对同工请他评论的几部书进行校订。在 1877 年上海的传教士大会上，他是一个委员会的成员¹，

1 根据上下文推断，狄考文所在的这个委员会应该是“益智书会”，又名“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 Committee)，负责研究规范传教士在华创办学校的学制、规范新学译名、编撰出版教科书等。这个委员会由 7 人组成，最初三年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任总干事具体负责。该委员会在 1890 年的第二次来华传教士大会上重组后，更名为“中华教育会”，一般认为傅兰雅(John Fryer)任总干事。1905 年，改称“中国教育

这个委员会受命采取措施，准备差会学校使用的一系列教科书。不久以后，他即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篇精心写作的论文，文章讨论了这些教科书应具备的特点，特别提请人们注意要专门照顾到在科学论文中使用中文术语的问题。这个委员会开始辛勤地开展工作，制定出了措施，要由不同教派的传教士编订一套相当完备的教科书，以满足公认的教会学校之需。委员会要狄考文编订几种教科书，有几种他愿意编写；其他几种由于不适合他编写就推辞了。他不止一次要求自己先写出论文，为其他人编教科书提出建议。当 1890 年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再次召开时，发生了一些摩擦，先前的委员会解散。在狄考文的带领下，重新组织了以熟知学校需求的传教士参加的中华教育会，并进一步限定该委员会的功能在于出版教科书。狄考文担任第一任会长¹。他热情地赞成委员会的这一变化，成为该会的积极分子。他还兼任这个委员会下设的负责中文科学术语委员会的会长，中文科学术语是编订教科书的一大难题，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程。此后一些年间，他大部分时间忙于校译官话圣经以及其他一些事务，只是附带地做一

会”，1916 年又改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但对外始终习称“益智书会”。

¹ 未见其他资料有这一记载。

些专门术语方面的工作。尽管如此，他在负责这项工作六年以后说：“我已经收集了大量化学、物理、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冶金学、摄影术、钟表制造、机械、印刷、音乐、心理及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神学等学科和专业的专门术语”。此后他还继续做这项工作。

他的第一部中文著述是关于幼儿洗礼的小册子，是根据登州当地情况而作的。接着他还编写了一本叫做《官话祈祷文》的小册子。作为中华教育会指派的术语翻译委员会的负责人，他提交了一份关于化学术语的报告，推荐一套新的专门为中国人使用的化学符号。这份报告印刷出版了。

1871年9月，他写了一份关于美华书馆计划出版情况的报告，在这份报告开列的准备出版的书目列表中，他提到的他自己编的书目有：“1、《〈创世纪〉教理问答》（附比较困难问题的答案），已完成，仅需稍做校订。2、《十大诫命道德法解析》，完成了一半。3、《圣经学习指南》（学习圣经的参考文献，附有大量书目索引），已完成三分之一。”数年间他一直在编写这些书籍，但由于经常有一些更紧迫的任务，又不时地搁置自己的计划。在写这份报告以后不久，教理问答就出版了。朱利亚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一

书，他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创制适当的术语方面，尽管他从未说他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他与倪维思博士一起编写出版了中国人使用的圣诗集；直到晚年，尤其是在安息日不布道的时候，总是不时地补充中文圣诗集。事实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听到一首新圣诗，特别是令他感动的圣诗，就想译成中文，以便进一步丰富当地的圣诗集。当地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首赞美诗是狄考文翻译的胡格诺教派的歌曲“主和我”。狄考文一门心思征召牧师，他最后做的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是翻译一首有叠句“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赞美诗。到他病倒的时候，这首诗没有译完；但是，在最近的一次有 150 人参加的中国学生志愿者会议上，那首诗印在了卡片上，准备做牧师的人每人都有一张印有这首诗的卡片。1907 年，他为一个神学班讲授《威斯敏特小教理问答》，随后就将译文出版了。这是他的最后一部中文宗教著述。在长期的传教士生涯中，他为许多神学班讲授过各种不同学科的课程，都被认为是非常出众的，但他没有出版过这些学科的讲义。

狄考文编写教科书，源于他作为一名教师的工作需要。最初迫使他注意这一需要的是教授算术。早在 1868 年，他就开始编著算术教材，但直到他弟弟约翰主管上海美华书馆的时候才出版了

这本教材¹。编写这样一本教材，对于不熟悉编写时的情况的人来说，或许会认为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只要懂中文和英语，就没什么问题了；但实际上，编写这部教材当时还是要面临一些复杂问题的。例如，那时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横向书写数字的方法。新编算术教材是使用西方的方法编写，还是继续使用中国传统方法编写？继续使用中国传统方法编写，用这种方法训练出来的学生在以后阅读西方数学书籍时就会感到困惑；而放弃中国传统方法，同样会在教材的印刷上出现混乱，因为根据中国人的使用习惯，教材必须是竖排版的。这一难题通过重复列出两种方法的例题解决了，一种例题，搞一次横排版的，再搞一次竖排版的。学生在使用教材的时候，允许他们自己选择使用哪种方法，但教材本身，所有的数字都是竖排版方式。这样一来，像分数算式中分割分子和分母的分数线，也都是竖排版，数字按从右向左的顺序排列。在他出版他的算术教材之前，中国人一直使用的是中国数字；他出版的算术教材引进了阿拉伯数字。新世纪之初，在经历了义和拳暴乱之后，西方算术书籍几乎成了教会学校之外的中国教师和

¹ 这本算术教材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笔算数学》。关于这本教材的出版时间，这里的叙述值得注意。从这里的记述以及本书第一章所述狄考文的弟弟在美华书馆“工作五年”的情形推断，《笔算数学》的最初版本很可能是在清同治年间出版的。市场上流传的 1892 年版本，不是初版。

学生的首要需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场上有很多狄考文算术教材的“盗版书”，都是木板印刷的，纸质低劣。中国的出版商那时还都不知道“版权”的意义。不过，狄考文算术教材的广泛流传，却带来了在教会以外的学者圈中迅即提高其声誉的效果。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的狄考文的算术教材，销售数以万计。关于这一点，费启鸿博士写道：“不可能计算出这本教材售出了多少册，”“这本教材已经遍布中华帝国各个地方。”

1884年10月，狄考文向中华教育会学校教科书委员会递交了他的几何教材手稿¹，关于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他说：

这是我万千苦痛和辛勤劳作的结果 ... 这部书是用浅文理编写的，为了使这本教材在表述形式上流畅、所述内容上准确，吃了太多的苦头。在不多的方程式中，我引入了西方使用的数学符号，对此我在教材开头部分即做了充分的解释 ... 数学符号标记是一种世界性语言，所有文明国家都在使用，除非在完全必要的情况下，改变它们是不明智的。在这本几何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年轻人给予了最有效的帮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见，认为我们不应该改变或者说是令人**不可理解的**错误篡改西方的数学符号体

¹ 这份手稿出版后，就是学界所看到的《形学备旨》。

系，而应该完整无误地把这一体系介绍给他们。做出的唯一改变是方程式的写法，由横向写法改成了竖向写法，而这是按照中国书写方式所必须做出的改变。

这本几何教材一年后出版了。早在 1882 年 3 月，狄考文在他给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中说，他的代数教材已经完稿，只需在印刷前校订一下和做某些重新编排就可以了。代数教材在几何教材之后出版了第一个版本¹。虽然那时学习这一学科的人很少，没法与学算数的人相比，但销量还是很好的。

1908 年 1 月 14 日，狄考文将他的代数学第二版序言寄给了上海美华书馆经理人，这个版本与美国的“大学”版代数学内容分量相同。赫士 (Hayes) 博士说：“二十多年以前，他就在编写他的代数学第二版，这个版本的初稿，就是已经使用了很多年的手抄稿。由于急着完成其他任务，他不得不放下整理出版的打算。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这件需要完成的事，而是从那以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完善提高。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他才最后完成了修订工作并予以出版。”

¹ 即学界所知的《代数备旨》。从这里可知《代数备旨》的第一个版本是 1886 年前后出版的，而从下文可见，第二版第一次印刷则是 1908 年的事。

狄考文还计划出版其他一些书籍，其中有几部书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没有一本彻底完成。在这些没能完成的著述中，有一部计划庞大、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值得我们特别予以关注，因为大量事实表明狄考文在他的早期传教生涯中渴望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部著作之中。这就是官话词典。在准备编写这部词典的过程中，他曾谋求与北京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牧师合作。1874年6月6日，他在给富善的信中谈了如下的构想：

我认为这本书应该是一部华北语言词典，在收词范围上，一方面，应包括直隶和山东等使用官话省份在内的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全部口语用语，凡是我們所能搜罗到的，都应收进来做注释，当然，也包括我们知道的仅在局部地区使用的单字和词组。另一方面，应包括全部已有的习语词汇，并把此作为这部词典的显著特色，总之，两个或更多的单字联在一起表意的词组，具有不同含义的简单凝练的单字，都应收录在内。

已经作了相当多初步工作之后，富善因夫人突然去世，不得不退出了这一合作编写词典的工作，狄考文尽管希望能重新合作，

但他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然而，作为这一计划以及类似研究的成果，狄考文在 1900 年出版了一本分析 2118 个汉字的小册子¹。这本小书是用来指导小学生们练习写汉字用的，直到今天，教会学校仍在广泛使用。计划编写的大型词典虽然没有编成，但却直接产生了一些副产品。富善博士依据这部没编起来的词典，编著了一本中国习语集，而后接着又编著了一部袖珍汉英词典，就简练和综合性而言，这部词典令人叹为观止，几乎被每个中国学生视为必备工具书。与出版这两部书的做法明显不同，狄考文留下了一部规模巨大的词典手稿。这部词典手稿全部是中文，分数卷编写，工作尚未完成，手稿已有一立方英尺之多。250 年来，还没有出版过一部中文综合性词典，离现在时间最近出版的那部辞典，基本是供使用文言的人准备的。因此可以说，出版一部全新的大词典很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编写这样一部词典所遇到的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是编制供绝大多数人通用的注音问题。没有一种注音是大家都能够认可的。幸运的是在编这样一部词典的过程中，狄考文博士除了对准备工作进行必要的指导外，并没有把自己的时间都搭上，他雇人抄写素材，不符合要求的就解雇他们。

¹据有关资料推断，这本书应该是《分字略解》。

1897年，狄考文在给他大学同学的一封信中，说他在“写一本关于电学的书，进展顺利，还在讲授神学的时候写一本关于布道的书。”这两本书都没有写完出版。1898年在写给大学同学杜德(S. C. Dodd)先生的信中，说他正在试着写出一部关于伦理学方面的书。1878年3月，他在给北京的丁韪良博士的信中说：“你可能还记得你在这里时我曾说过想编写一部物理学著作的事。”当时你说：“那就动手吧”，并且表示在我要着手编写时你就退休，说十年内做这件事。如果不是太紧迫，能腾出时间来的话，我希望十年内把这本书写出来。你知道，物理学是我的偏好，我教过的物理学很可能比中国其它任何学校教的都要好。我打算回美国一次为这项工作搜集资料、熟悉有关设备。”他没有能够腾出完成这项工作的时间；当后来丁韪良博士邀请他为其专著修订版¹撰述关于电学一章时，同样因为没有时间而放弃了这一殊荣。此外，他很早就完成了《天路历程》的官话翻译。

1892年初，狄考文出版了《官话类编》，立即获得了超出他期望的成功。自那以来，这本书被越来越多地想掌握汉语的外国

¹ 这里所说的“修订版专著”，很可能是指丁韪良的《增订格物入门》或《重订格物入门》。由于作者没有指明这本书的修订时间，也没有明确说出书名，难以确指。

人使用，而且此类著作中至今尚未有望其项背者。编著这本书，花了他 25 年的时间。1873 年 6 月 28 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撰写这本书的有关情况：

近两周的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在编写教程，制定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梅理士先生敦促我做这一工作，以便获个什么博士学位，因为他似乎不想拿博士学位了。没想到早在几年前为邦玛吉编写的三节课教程时，我就深陷这一工作之中了。我现在制定出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计划，如果有时间，我相信能够完成，尽管这需要做大量工作。我认为我能够写出一部比现有这一类著作好得多的教材。我原来没有打算立即做这项工作，现在也不能在这上面花更多时间，因为有更紧迫的其它事情需要关注。

顺着下面引述的日记的线索，我们能够追溯到狄考文《官话类编》最初着手的时间。1867 年 6 月 20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邦玛吉（朱利亚的姐姐）的中文学习一直有声有色。我为她编了三次课的教材，她学习这些教材，现在正在阅读《天路指南》。我为她编写教程，目的是要找出中国方言的特性。为此，我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调查。现在我想重新开始并完成这项工作，有朝一日

将其出版公之于世。我最大的困难在于确定每一部分所能达到的效果。

几年后，狄考文的这个想法和计划逐渐成型。在关于这个计划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每一节课讲述一种习惯用法，随意选取词语。正如你将看到的，句子是从全国各个地区搜集来的，蕴含着不同的意思。我还引入了各种类型的可以称作官话的文体。在第二组一百节课程中主要阐述较深奥的文体。然而，教材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人们去学习讲官话。我一直尽力避开独特的土话，但不排除俗语。对一个要熟练掌握官话的人来说，熟悉俗语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必需的。当然，可能不选用大部分书面语，那些并未丧失基本表达功用的狭义官话，若不是做作不实用的，则要学习使用。不过，中国人自己现在不说的狭义官话，外国人也不应搜寻出来学习。许多俗语已经广泛使用，它们也赋予了中文确切和丰富的含义，在许多场合下表达出其他方式不能够表达的意思。我一直试图去阐释词语在中国各地区的不同含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不得不在**许多情况下罗列出两个或更多的例子。

在实施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为了解俗语和字的用法，同时把在一些传教士居住的中心地区所听到字的发音，制成字音表，狄考文请求华北和华中有这方面能力的学者给予帮助。为了完成这一计划，他还进行了广泛的旅行。1889 年底，在利用一个夏季学习中国的方言后，同邦就烈一起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走访了长江流域，并深入到大运河地区，在大运河流域和南京各停留了一个月。此行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熟悉流行官话，以便完善这本著作。经过这次旅行，他能够对《官话类编》最后定稿了。在狄考文看来，这次旅行后修订的《官话类编》，“好了不止一倍。”他和**夫人邦就烈**一起赴上海对书稿进行了最后审定，由美华书馆印行出版，四开本的巨著多达六百页。1901 年，在艾达 (Ada Mateer) 夫人的协助下，狄考文出版了一部更为基础的大致同一性质的著作。

狄考文在《官话类编》上所体现出来的不断学习和谨慎的性格，也体现在他的其他著作上。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人比上海美华书馆的负责人费启鸿博士更有资格发言了，他讲的都是他的切身体验。他说：

狄考文博士最显著的一个特性是他对自己任何要出版的著述近乎苛求的态度；一而再再而三地修订，请别人评判，然后等待

着看是否能有这一问题的新发现。我现在还记得我刚到中国不久阅读他苦心准备的一份关于充满争议的“术语问题”的论著手稿，文中有大量他煞费苦心地从中国经典和其他著作中搜集的关于用中文“神”这个恰切词汇表达“God”一词的引文。我催促他立即发表，但是他断然回绝了，说还需要进一步的补充。最后并没有发现新东西，但该论著的发表却已经是近 20 年之后的事情了。

狄考文的所有著作都没有表露写作的艰辛而又漫长的过程。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多年钻研的结果。在他图书室里陈列着一长排中文书籍，每一本书上部都有大量小白条。狄考文雇用了一些学者，分别阅读可能使用神这个词的中文著作，大量的白纸条标记就是他们放进去的，小纸条上标明了狄考文需要读的段落。所有标记要读的段落都进行了仔细推敲，找出了其中的细微差别。

从《官话类编》以及新近出版的《笔算数学》¹中，狄考文获得了大笔收益，尽管这时他还不足以称之为富人。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他总是忠实地锻炼和激励自己，过着俭省、精打细算、简朴的日子。当他接到他出书的收入之后，即慷慨地帮助朋友、用

¹ 这里所谓的“新近出版”，实际上应该是再版。

于促进他毕生为之献身的事业。为登州的中学和潍县的大学的花费¹，我们将在下文中谈到。上面谈到的长江流域旅行的费用，也是他自掏腰包。1895年3月9日，他写信给海外差会总部的一位秘书说：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差会会议纪录有我打算建造一座博物馆和公共讲堂的记载，这份记录提交给了总部。我现在就想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践。这需花费1200美元，或者更多。在上面提到的那个会议记录中，我或许谈过《官话类编》的出版费用已经付清等情况，希望在来年能够捐献总部财政1000元墨西哥洋。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总部慷慨地赐予我时间，使我得以编校和出版这部书。当这部书再版时，我希望能够捐献一个较大数目。这并非是说我认为这部书已经大功告成，并将继续获得成功，广泛流传，帮助传教士们学习使用中文，因而就感到非常的满足。我的几部科学著作只能满足出版费用，还没有获利。

1905年5月20日，狄考文给总部一位秘书写信说：“不过，

¹ 1904年，登州文会馆迁移潍县，文会馆校址，为文会中学所用。

我想说，考虑到文会中学对登州布道站以及为潍县的大学提供生源均具有重要意义，我已经从《官话类编》所获利润中提取了足够维持该中学今年的费用。”1906年12月13日，他在给美国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弟弟现在正在召开一个大型长老和该宣教区各布道站的领导人会议。会议共计大约有300人。这么多人十天的食宿就是一笔不小的花费。我正在给他们支付这笔费用。”在最后给我的一封信中，他提到有这种能够提供金钱帮助别人的能力，他感到满足。

第十章 关爱中国基督徒

“中国目前需要的不是创建更多的拥有昂贵建筑的布道站，不是要去广泛地巡回布道。现在更需要做的是培育好已有的布道站，使其适当地发展。我们大多数人应该去征召具良好真理基础的人，培训他们做牧师、布道员和教师，以便使中国教会可以拥有明智、可靠的领导人 ... 本省现有的差会布道站，或布道中心，如果能适当开展工作的话，已经足够了。现在需要的是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布道站或布道中心，尽我们的一切力量设法发展本土代理人，教导和确立那些信仰基础良好的人为本土牧师。”——摘自 1906 年 1 月 6 日致美国圣经公会福克斯秘书函

狄考文比大多数传教士更早地预见到中国基督徒将联合起来，建立独立教会。他认为这种走向联合的趋势不仅仅意味着在中国的长老会各教派的牧师和教会联合起来，就像已经出现的一些情况那样，而是会出现所有新教基督徒的联合组织，以致使外国传教士很少甚至没有活动空间。在他看来，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应该立即做好有效的准备工作，以免未来中国独立教会中出现教义不健康或生活不严谨的现象。与此同时，虽然预见到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前景，但他还是坚持关爱和培训中国基督徒，因为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他长期的传教生涯中，若无额外原因，从未把关爱和培养中国基督徒看作是次要工作。当然，在努力把福音带给一个民族的初期，“做传福音者的工作”¹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那时要通过讲道、印刷书籍使人们了解基本的基督教真理，要努力使他们皈依基督；我们已经介绍了狄考文博士在这一类事务中是何等的勤勉努力。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同样勤勉努力地**去关爱中国基督徒；在登州蒙养学堂和文会馆，培养牧师、教师和布

¹ 语出《圣经·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5节。

道员，也一直是他的主要目的。

登州教会首批中国基督徒人数很少，狄考文没做过对这几个人的监管工作。梅理士来中国和到登州比狄考文早，因此由他管理这些中国基督徒，直到他去世。1867年，梅理士受命为登州教区牧师，在这个职位上近20年¹。在此期间，只有梅理士不在或生病的时候，狄考文博士才代行职责主持讲道和照料教会事务，但大部分时间只是以顾问的身份为登州教区事务提供帮助。我们没有理由因为狄考文在登州或别的地方必须与一些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结果却非常令人失望的人打交道，就认为中国皈依者特别令人失望。保罗在各教会旅行并写下执照时，他的皈依者不也有许多人与这种情况非常类似吗？基督在挑选门徒时不也极其忍耐、忠诚、坚持去做任何值得做的事情吗？即使我们今天的传教士们一开始组建教会时的成员构成也还是这个样子。可不管怎么说，狄考文博士在与中国本土基督徒相处早期的某些经历，还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他在186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¹ 可能有误。据梅理士的继室夫人梅耐德(Annette T. Mills)说，梅理士“从1865年起至1895年逝世，一直担任登州长老会牧师(pastor)，并于1872年至1877年间代理宁家(Ning-Jia)教会牧师之职”。参见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194.

自到登州以来，本土教会一直困难重重。有几位教会成员，道德品行极差。其中一位吸食鸦片；另一位说谎，搞偶像崇拜；还有一位不遵守安息日。说谎的那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当众受到了责备；不遵守安息日的那一位为自己的过错感到后悔，教会又恢复了对他的信任。但是，吸食鸦片的那一位虽然承认自己吸鸦片，却不能保证什么时候可以断绝吸食，结果被驱逐出教会，直到今天也未恢复其教籍。这些事情令我们非常担心和伤心。看到那些承认基督的人还在罪的权势之下，真是让人难过。这是传教工作最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即使是这样一些有弱点的人，上帝也能使他们得到永生。

在 1866 年 9 月 15 日的日记中，他记述了一件更严重的违背戒律的事情：

我们举行了一个由被指控者、指控人和证人参加的听证会，通知了被指控人说他将接受审问。我们写信给烟台的郭显德先生，请他为我们处置这件事。他按我们说的做了，我们聚集一起审问

被指控的人。证据表明被指控者撒谎、伪造账目、通奸，可尽管如此，这个人却否认了所有指控，面对他不得不承认的证据竭力进行辩解。我们决定把这个人开除教籍，两周前把他驱逐了。

我们不必去猜想诸如此类的大量令人气馁的工作；一般说来，中国本土基督徒是要努力过正确生活的；在皈依基督的初始阶段，可以说这些中国本土基督徒大多数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只是基督的“婴儿”。可是，如果不看一下这令人沮丧的初始阶段的情况，我们就认识不到海外传教士们需要对那些新皈依的本土教徒所做的工作。况且，看一下这些人皈依基督初始阶段的情况，我们可以顺便了解一下中国本土基督徒在他们自己的教会中进行品行训练的方法。中国本土北长老会教会每一个案例的处理都像我们长老会教派一样，按照有关规章进行。就像在美国一样，履行同样的程式；进行公平、充分的调查，有见证人参加，举行指控听证会；为了对个人和组织都能体现公正和仁慈，努力做到不偏不倚。关于这一点，狄考文博士在这些特别案例中可说是无一例外都做得很好的；我们至少可以确信他是从心里主张去这样做的。这样的经历也是一位年轻海外传教士践行品质的实际课堂，特别是像他

这样把坚守真理和正义与不折断压伤的芦苇，或不吹灭将残的灯火的宽容厚道集于一身的人，是很难得的机会。逐渐地，登州学堂里的学生和教会中的基督徒都习惯于到狄考文面前倾诉自己的不幸，坦承自己的缺陷，不指望他会不顾原则地宽恕或袒护他们，而是相信他会理解同情他们，可能的话会帮助他们。狄考文不仅仅是向他教的学生们敞开心扉，伸出援助之手。随着人们对他的深入了解，京师大学堂的教习们也来征询他的建议，做苦力的需要时也来找他帮忙，这些人从来不会感到失望。

不过，中国登州传教士们的早期经历，也有比较光明的一面。学堂里有几个学生改变了信仰。这种情形带来的喜悦，我们这些在基督教国家生活的人不可能领略到。登州的小教会在早期阶段也稳步发展。1869年，这个教会已经有约50名成员，这就要求有一座独立的建筑供集体礼拜之用了；美国国外差会本部终于批准建一所供举行礼拜仪式之用的建筑，先是购买了一块地，很快又建起了礼拜用房。那时梅理士牧师不在，长老会指派狄考文博士在此期间代行梅牧师之职。就这样，在先买了一块地之后，他向差会本部打报告恳求建一座大建筑，他在报告中说：

我们在学生的教室举行礼拜仪式，一直有很多不便。这间教室只是一间能坐下所有人的屋子，有时候座位还不够。每个安息日，课桌要搬出去才行；所有教室周围建筑里的长凳、椅子等可用作座位的东西都搬来占用了，搞得礼拜仪式场面凌乱不堪。除了极不方便之外，用教室做礼拜还有两大缺陷。一是这里缺乏宗教社团。所有异教徒都缺乏敬畏之心，需要向他们大部分人灌输这种思想。这一工作亟需一所房屋，特别是专门用于礼拜上帝的房屋。另一缺陷是安息日和平时的礼拜影响了学堂的正常秩序。这间教室处在我们教会院内的中间位置，在学生教室做礼拜时，外面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闲逛、闲聊等情事发生。学堂监督¹感到这对学堂极为不利，也伤害了中国本土基督徒。

任何一位熟悉学生习性的美国人，都会感觉到在这种场合下的中国青少年与我们国家的非常相似。

在那份吁请报告中，还有一段话值得在这里引述：

人们常说异教徒国度的基督徒应该建造他们自己的教堂，但

¹ 这份吁请报告是狄考文以登州长老会差会名义写的，而登州学堂的监督即是他本人，是以他没有用第一人称“我”，而用了“学堂监督”的称谓。

在海外传道的早期阶段，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差会的布道中心，这里有外国人亲自讲道和教导，而大部分听众都来自很远的地方。在这样的布道中心的教堂的角色定位，必须要使大多数人认识到，这里的教堂与许多小地方由他们本土牧师主持的教堂在许多方面的区别。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我们近来做出了决定，要求本地基督徒很大程度上要自助。

长老会委任狄考文博士再担任一年登州教会代理牧师之职，若不是 1870 年应召去上海负责美华书馆工作，他无疑要亲自监督建造这座新礼拜堂。这个礼拜堂是他在上海期间建造的，回来之后看到礼拜堂竣工了，他非常高兴。1895 年，梅理士去世，狄考文博士被选任为登州教会牧师，他能够担任这一职务，因为他已经找到赫士先生替他担任文会馆监督了。自此之后，在去潍县广文学堂之前，他一直担任登州教会牧师。狄考文担任文会馆监督期间，赫士博士在这里默默有效地工作了数年，显示了一位男子汉杰出的能力和精力，狄考文博士对他非常满意。赫士博士担任文会馆监督之后，狄考文博士依然帮助文会馆工作，不过他经常忙于其他工作，不在这里，以致文会馆和登州教会的宣教事务

大部分都由赫士博士负责。

根据美国长老会的“政体”，在“委任”一位牧师时，必须证明有大多数教会成员投票表决授予实行这一权力；并要在相关空栏里填上下面的话：“你或许没有世俗的忧烦和娱乐，兹允诺在你担任本教会牧师期间每季度（或半年、一年）支付你...报酬。”在安顿中国全国各地教会的本土牧师方面，填写那个相关空栏、各该牧师以及各该教会组织所需的实际资金捐献额度，通常要有外国传教士在场和外国传教士的鼓励和指导。如果按教会成员的能力估量，有时候允诺捐献的数额是很慷慨的；有时候捐献的数额则很难保证本土牧师履行他们的职责。本土牧师的工资，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即使照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来看，也几乎不能维持生活。我们要记着这一情况，以便估价在委任狄考文博士为登州长老会牧师的那张表格的空栏里填写的数额。在向美国差会本部报告被委任为牧师的整个程序时，他说：“登州教会委任我为他们的牧师允诺薪水制钱合 50 元¹，这些钱我可以用来雇佣一名我选定和指导的布道师。”当然，除了这笔钱，狄考文还继续从美国差会本部财政中领取一份工资。50 元钱很可能是一笔值得称道的数目，

¹ 作者没有交代货币单位，50 元原文为“fifty dollars”，以当时的情况推算，这个“dollars”可能是美元，也大可能是银元。

因为本土教会成员没什么办法捐献；而这 50 元作为一名本土布道师的薪水来说，则至少是不能说是少的。

在向差会本部报告担任牧师之职时，狄考文博士说：“这是我所热爱做的工作，尤其是讲道。”在普通民众间做布道师的工作，不可能有什么讲道的地方。甚至很少有任何正式的讲演。巡回布道时，一个传教士可能做的最好的就是通过任何合法的手段引起人们注意，然后再进行谈话，听人说，回答问题，并且要忍受各种不相干的事情扰乱。不过，当组建起教会之后，讲道，包括宣讲一段经文，就像我们安息日在国内礼拜堂一样正常进行了。他所提及的担任牧师期间的愉快指的就是举行这种礼拜仪式。主持这种仪式，他做的非常出色。最熟悉他的任何十分赞赏他的伟大价值和效率的人，并不认为他是一位英语布道坛上非常有辩才的布道者。他通过洪亮清晰的语言诚挚地展示其全身心信任的伟大宗教真理，以此来抓住听众。一个人站在他自己国家的讲道坛上，他的人格和奉献精神就是巨大的力量；某些讲演者几乎不考虑所讲东西的思想内涵，只顾让听众能听自己讲下去，狄考文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在向中国人布道时，他注重的是非凡的效果。他的所思所想、语言技巧、热情诚挚的讲演、讲道或演讲的内容，

极大地吸引着中国本土基督徒，同工对他的能力十分折服。经常听他讲道的鲍康宁(Baller)¹先生说：“他讲道逻辑、明了，表达一种思想，词汇丰富，说理透彻。他的观点通常是从中国人的观念中引申出来，所以明显没有外国味。”时至今日，他的一些演讲回想起来也都是真正有文采的成功讲演；1907年在济南英国浸礼会广智院开院仪式上的那次讲演，或许是最著名的一次。在山东，那之前外国传教士从没有过这样的机会，山东所有省级高级官员、50名级别低一些的官员出席了那次开院仪式。狄考文以“正直品格的重要性”为题的讲演，使得那次开院仪式更具价值和意义。在潍县举行的那一地区本土教会约300名妇女参加的大会上的演讲，则是他最值得纪念的一次布道。

¹英籍内地会传教士，1873年来华，1922年在上海去世。著名的汉语语言学家、汉学家和教育家，曾参与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编辑工作，故与狄考文熟悉。



中年时期的狄考文

他担任登州教会牧师多年，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皈依基督使教会得以发展即是成果之一。截至他迁移潍县之前，他记录了在他担任牧师期间，**一直是每季度至少举行一次圣餐礼**。在他担任登州教会牧师之初，很明显地增加了 18 名成员，其中 8 名是文会馆的，6 名是文会女校的。在结束任职时，吸收了 26 名成

员，其中 21 名受洗，这是登州教会历史上接收最多信徒的一次圣礼。这 21 名皈依者只有一名来自于文会馆，其余都是登州布道站其他两位同工——薛姑娘 (Miss Snodgrass) 和慕维甫 (Seymour)大夫¹努力工作的结果。

通过巡回布道以及其他方式在登州城外周围地区吸收了一些教徒之后，传教士们就必须对这些四散于外地的教友进行照看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照看登州城外各处教友的责任很大一部分是由狄考文博士和他的妻子担任的。事实上，这些教友之所以能够皈依基督，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夫妇劳作的直接或间接结果，因此他们觉得特别有责任关注这些人的未来。当然，这需要付出大量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登州布道站开展工作的早期阶段，中国本土基督徒面临着大量的不公正待遇，经常性地干预对他们施以

¹ 薛姑娘，美国长老会女传教士，1893 年到登州，据《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的作者连警斋称“常住登州”，但后来 1936 年前后时，登州已无此人，去向待考。慕维夫，又作慕杂甫，医学博士，美国长老会医生传教士，1893 年到登州，经营长老会医院，并开办医校，训练学生和看护。登州长老会医院在他主持期间，运营良好。1918 年转赴济宁长老会工作，1928 年被国民党军杀死。

保护是明智和适当的。当地的统治者和大多数人民那时非常憎恨外国人和外国宗教。甚至登州传教士们埋葬去世同工和亲属的小墓地里的坟墓，也被反复扒毁，那里的中国人把这种行为看作是对活着的外国人的一种最严重羞辱，会使外国人感到胆怯；但地方官不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对这样的不法行为不加惩治。登州西南 50 英里处的招远县城的苗姓一案，即是典型一例。早在 1869 年，狄考文夫妇与邦玛吉 (Margaret Brown)¹ 在一名中国助手的陪同下，外出旅行布道，在这次旅行布道途中，他们访问了苗。苗在外地转变了信仰之后，立即着手在他的家乡栖霞县努力争取其他人皈依基督。他派人通知他的族人和朋友们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们讲，邀请他们到他家里来。狄考文这几个人正好遇到了这件事，亲眼目睹了这次聚会。苗对应邀到来的人们致欢迎词说：“我派人请你们来，你们来了。我在信中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说请你们到我这里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从前我一直领着你们侍奉魔鬼。没什么我不敢做的，你们也

¹ 狄考文夫人的亲姐姐。有些资料上说是狄考文夫人的妹妹（连敬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37 版，第 171 页；山东省民族志宗教志编纂工作办公室 1987 年编印：《山东省宗教志选编》第一辑，第 30 页），误。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在《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转》一书中说邦玛吉是自己亲嫂子的姐姐，当是可信的。详见：[Robert McCheyn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P.43.](#)

不在意跟着我做什么。现在我发现比较好的事情。以前，我们经常做些令人怀疑的事情。现在，我已经发现了没有疑问的事情：这个事情完全可靠，毫无疑问，有最合理的证据。我已经不再侍奉魔鬼，你们也不要再侍奉魔鬼了。因为是我领着你们侍奉它的，现在我想领你们离开它。我要给你们指条道，让你们到真神面前去。你们自己掂量掂量；琢磨出个究竟；要知道我不会欺骗自己，也不会欺骗你们。基督教义是完全无误的真理。”记述到这里，狄考文补充写道：“这些话语热情洋溢，重点突出，令我热泪盈眶。我为他们感谢上帝。同时，我为他们祈祷，愿他们会有收获。米饭端上来了，这位年轻的基督徒和他的朋友们做到了桌边，请求祝福，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直接、专门为他们做的祈祷。整个村庄的人都来听祈祷，其中有许多人是从邻近村庄赶过来的。除了他们吃饭的时间，这一天我们一直在为他们讲道，直到深夜。一些妇女也从头到尾挤在人群里听道。”在苗本人和其他本土基督徒的鼓动下，他决定到招远讲道，宣讲他的信仰。同年8月，狄考文夫妇再次访问了他，这次是在他的新居所，尽力帮助他开展这项新工作。苗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品格，保证了他能很好地开展工作。按照中国人的一般习俗，当开始一项新事业的时候，要举

办宴会以示庆祝；约 18 个人应邀出席这次宴会，宴请结束，大家聚在一起像是开个会，狄考文博士简短地讲解了基督教的要义，他们要干的这项事业的性质，以及苗同这项事业的关系。他告诉听众说，长老会要为这所小教堂支付租金，但除非苗能得到朋友们的自愿捐献，他是要无偿开展工作的。除了登州教会来的两个人之外，所有在场的人都不是基督徒，但这些参加宴会的客人们捐献了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除了用于这次宴会的费用之外，剩下的则留下来用作支持宣教之用。苗的一些朋友已经允诺要帮助、支持他，为他准备了一间房屋作小教堂，屋墙挂上了制作精美的匾额，苗演讲的地方后面，也竖起了一块牌匾。一切都这么与众不同并充满了希望，狄考文博士离开时，为这个不信仰基督的国家明显准备欢迎福音而感到高兴。然而，风云突变，虽然苗在继续他的工作，但在这项工作开展几天之后，突然来了几个捕役把他抓了起来，并把租给他房子用作教堂的那位房主也逮捕了，将他们一起带到了县衙门。房主受到指控说他把房子租给了“外国鬼子”，当庭遭受毒打，杖 200 板。苗被叫上堂后，指控他搞邪教，跪着祈祷，[呼唤一些看不见的人物](#)。在回应这些指控时，苗简要重述了福音真理，并对耶稣能不能替他受罪这样的嘲弄性问题凛

然作答说他坚信不疑。县令命将他杖责 50 收监。那天晚上，他又过了一次堂，第二天早晨，就在他的脖子上套了铁链子，绑了双手，押解去 30 英里外的栖霞，但是，戴着铁链遭受痛苦，他却高唱基督教圣歌，感觉很舒适。到栖霞后的第二天早晨，栖霞知县升堂提审他，说招远方面指控他同外国人结党，不正当地传播宗教，用狡诈的手法教唆百姓堕落，并说他施展魔法，强占了一所房子，致使一些人欲结伙作乱，整个指控的大小情节均系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令人气愤。知县要他供认，他拒绝了，随即被杖责 300，接着又被打了 100 多耳光。第二天，苗又被提审，他不招供就遭到毒打。栖霞知县特别询问他基督徒是怎样祈祷的，都为什么祈祷，苗当着知县的面跪下祈祷，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最好回答。就在这个时候，已经获悉这件事的狄考文博士来了，他从栖霞知县那里得到允诺，知县答应在接到上司指示前，不再审讯苗；回到登州后，他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美国驻烟台领事，尽管他知道在美国政府现行政策下，几乎不能指望领事会做什么。在《长老会旗帜》上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我不会忘记当我见到这位教友为了福音而脖子带着铁索、遍体鳞伤时的感受。当我与他见面时，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在 1000 英里外谈论基督

徒受迫害，与面对面见到受迫害的情形完全不同。我请他相信我们对他的同情，保证要为他不停地祷告，请他相信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把他救出来...一些中国基督徒勇敢地到监狱里来探望他，有些人甚至同他一起祈祷。这次事件激起了前所未有的祈祷热情，使他们感到唯一的希望是上帝能为他们干预这件事。这位年轻的基督徒从未犯有反对他的国家的罪行。官员们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的编造，假如栖霞知县不是很想找借口把基督徒控制在自己掌握之中，他便不会对这些恶意的虚构故事感兴趣。”狄考文博士尽快地赶到烟台会见了美国领事，在他回到登州后，听说苗已经被释放，但严格限制他的活动范围；对他造成的伤害，也没有给予任何补偿。

这一事件远未就此了结。尽管由于这一事件是国外差会工作在远离外部力量通常足以避免此类事件的地方所遭遇妨害的一个典型案例，有些人可能有兴趣了解，但在该事件进入调停阶段以后，也就不值得再认真详细叙述了，简要叙说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先要记住苗遭受迫害一事发生在8月份。对苗进行迫害的目的，至少是为了阻止基督教进入招远。如果对这样的事听之任之，很可能会鼓励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事件；因此很明显，传教士们有责

任采取可行的措施防止这类事情。对于像狄考文博士这样果敢地坚守条约权利不受侵害的人来说，尤其如此。11月下旬，他再次来到招远，目的是找一处可用作小教堂的房屋；在到招远访问的间歇，原来曾用作小教堂的房屋已经转归别人之手，不能再用作小教堂了。原先那位知县已经升迁了，现在的知县是新来的。狄考文博士很快找到了一处房屋，并得到了新来知县的同意租赁下来。接下来数月之间，卑鄙手段、野蛮行为、欺诈、小把戏，以及无聊卑劣之事，接连不断，迫使他不得不在冬末又去了两趟招远。一次是他与其他两位传教士同行，都带了手枪，以便在遇到攻击时保护自己。这里原来有一位老妇人，生病急需用钱，在其不怀好意的亲戚鼓动下把房屋租给了狄考文，这位老妇人被她的家里人抓起来打了一顿，又被招远知县逮去打了一顿。这些人还打了中间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中间人是负责谈租赁价钱的。全部租金不过 10 元钱¹。这种琐屑可悲的小事，荒唐可笑，比如说，当狄考文博士在得到满意的安排之前拒绝搬出那处房屋时，人们把这位老妇人弄到屋外，声嘶力竭地骂些下流话。直到三月份，招远的这件麻烦事才得到解决。基本上可以说是传教士取得了胜利；在招远知县的同意下，租赁了另一处房屋作为小教堂，

¹ 作者这里没有注明货币种类。

原来支付给那位老妇人的租金也退回了。这件事情的最好结局是制服了那位一直领头对基督教代表做出恶行的男人。知县极力袒护他，但最终还是妥协了。他把那位男人招了来，根据狄考文博士的记述，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他在我面前向我磕了头；磕完头后他试图溜掉，但我抓住了他，要他承认自己的罪孽，并明确保证以后不再重犯；他所说的都由文案记录下来，并抄了一份给我。”上述一切说明，一位意志坚定的人，即使是在中国偏远的城镇，也应该去做他可以做的事情。狄考文博士就是这样的人，关于这件令人厌烦的事件，他在日记中记述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学校事务，他会到招远去，一直呆在那里，直到问题完全解决。或许在后来一些年间，狄考文博士和他的同工们认为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保护一名皈依者是不明智的；但是，在中国传教的早期阶段，这是为争取对基督教采取宽容政策所必需的战斗，而不仅仅是纠正虐待一名基督徒错误的斗争。

在关爱中国本土基督徒工作中，还可以列举其他一些阴暗的事件，但我想最好还是转向主要记述其光明一面的事情。关于光明面的事情很多，涉及许多类型；不过，在今天看来这些事情都不那么具有轰动效应，不可能引起读者太大兴趣。这些都是中国

传布福音过程中的一些小事；但却不应忽视它们；如果在山东布道伊始就把这些记录保存下来，那就会慢慢地积聚成一笔财富。这些点点滴滴小事的发生，带来了通向丰收的喜悦。例如，最后一次到招远去时，狄考文博士写道：

尽管是星期六，但我觉得如果可能我还是必须试着赶回家去，以便不怠慢主日礼拜，那时会有许多望道友在等着听道。我发现不仅有 10 名从平度赶来的人，还有 7-8 位从其他地方赶来的。当然，我立即开始教导他们。我每天给他们讲解半天，一连讲了三周。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听讲。与此同时，邦就烈为一些想加入教会的妇女办了一个班。最后一周，所有人都觉得准备好了，于是进行了考试，大家都通过了。这次接收 20 名加入教会，15 名男的，5 名女的。昨天，他们都受洗了。在登州，这是一个新气象，有这么多人一起站着宣称承认我主耶稣基督。我希望我们能这一标示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场景感到喜乐。我们要增强信心，期待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的教室¹挤得满满当当，当这 20 个人站起来接受洗礼时，几乎很难找出空间供他们站立。让我们

¹ 登州北长老会很长时间都没有正规的教堂，在正规教堂建起来之前，所有宗教仪式都在文会馆的一间较大的教室中进行。

期待在中国这一地区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中国官方或许要对你们进行迫害，西方国家政府不理睬我们，但他们却不可能抑制上帝之灵。这里依然有许多望道友。

在传教生涯的早期阶段，他经常或远或近外出在山东各地旅行布道，帮助本土基督徒组建教会，辅助本土牧师工作，主持宗教仪式，激励福音布道工作，经办圣礼，以及以各种其他可行的方式促进基督教事业。所到之处，当地基督徒异乎寻常地愉快盛情款待，而他也愉快地接受，尽管经常是被领到一个奇特甚至是神秘的所在。狄考文博士描述款待他的那些客房，都是些奇怪的混合体，这些客房里放有木材，安排有卧室和塞满了各种相应的物件的“客厅”，角落里还有一副惹人瞩目的棺材。不过，他在自己家里的生活就很简朴，因而旅行中对当地基督徒招待他的习俗，并未觉得不适应。

在中国传教晚期的那些年间，虽然他把旅行布道这样的工作留给了差会的年轻人，但却没有完全舍弃这项工作。例如，他在1896年二月写给差会总部秘书的信中说：

三周前，邦就烈和我从莱州旅行布道回来，莱州离这里 80 英里远，我们这次旅行布道共计 17 天时间。朋友们曾从健康角度考虑，反对我们这次在冬季出去布道，但我们有自己的判断，出去了，收获很大。这次旅行布道是极其有益的。我们这次只限定访问两个布道站，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做一些特别的礼拜仪式。我为教会接收了 8 名成员。在一处布道站组建了一个新教会，共计 26 名成员，这是从老布道站分出来的一个新布道站。那个老布道站有许多望道友，工作前景光明，有一位文会馆的学生三年来一直在为这里的一所日校教学，这位年轻人在这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上述这样的外出旅行布道，有一次是在他 70 岁生日前不久，下面是关于他对这次旅行布道的一些记述：

我们乘坐苦子从登州出发陆路前往潍县。我在莱州府找了一处地方度过了主日，上午和下午外出布道，去了我们在宁家(Ning Kie) 的小教会，离莱州府城 3 英里远。梅理士博士和我大约在 36 年前奉命开辟了这里的布道站。后来，有了缓慢的发展。邦就

烈在后来一些年间经常到这里来访问，并教导妇女，现在这家教会里妇女占有很大比例。早期曾派布道员到这里开展工作，传布福音、教导人民。那时候反对福音的势力还很强大，工作进展缓慢。后来一些年间，由于布道政策的转变，除了偶尔访问以外，不再派布道员来，所以尽管教会还在，但却日趋衰落了。数年前曾做了些特别的努力，教会又有所发展，最后还为这家教会安排了一名本地牧师，与 15 英里外的另一家教会建立了联系。在义和拳叛乱第一年末，这位牧师被捕，教会遭遇了极大迫害。这位牧师再也没有回来。于是，这家教会的境况令人沮丧，牧师是从别的地方招来的。如果我们现在有可用的人，应该在莱州府安排一位牧师，但我们没有可用之人。

他最后一次到乡村旅行布道是 1907 年 12 月间。关于这次旅行布道，有记录¹说：“两周以前，我乘火车到胶州去帮助我们那里的本土牧师召开妇女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胶州城里的妇女以外，还有大约 70 名妇女是从其他布道站赶来的。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会议，必将产生大量良好影响。会议是由当地本土牧师自行策划组织进行的。有五位当地本土牧师出席和帮助组织会议。

¹ 从下面记述的内容看，这里引述的显然是狄考文本人日记或是写给某人的信。

许多妇女在会议上发言 ,有些做了致词。”与会妇女大约有 150 人 ,其中很多人是步行几英里来参加会议的。他本人在会议上的讲话是向母亲们请求奉献自己的儿子做传教士 ,做这番请求讲话时 ,他泪流满面 ,讲话中他提到了他自己的母亲。

读者必须清楚狄考文博士并非是以个人身份开展工作的 ,而是作为一名严密组织体制的代理在开展工作 ,与美国北长老会管理制度和长老会差会总部规章完全一致。这一严密组织体制的诸多代理机构中 ,有一种代理机构完全处在长老会教派的组织规条之外 ,但却是经过批准作为这一严密组织体制的一部分 ,需要到国外去开展工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差会”。差会成员就是由总部派出的传教士 ,这些传教士居住地要足够近 ,以便集中处理传教事务。差会的责任是要给传教士们安排驻地 ,给他们分派工作 ,做年度资金预算和估算增加物资 ,从总部领取资金 ,根据指令一般或特别地分派使用这些资金。狄考文博士曾做了大量工作创设“执行委员会” ,现在大多数差会都采取了这一管理模式。许多由总部支持的影响差会运作问题 ,需要在差会年会上讨论决定。关于宣教区外的指导性政策方针 ,如果事关重大 ,则应由总部来决定 ;但差会成员充分而坦率的意见 ,无论是差会年会提出的还是差会

成员个人提出的，总部通常都是持欢迎态度。

倪维思博士与狄考文博士之间有一场重要的讨论，尤其是针对倪维思博士在他的“传道方式”一文中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方面。这场讨论不是个人之间的争执，尽管由于他们具有坚强、积极、认真的个性，因而这场讨论不可避免带有争论的色彩。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于是否要金钱支持中国本土基督徒在他们自己人民中传布福音的问题。这里不必陈述双方的全部观点和争论的内容。概要说来，倪维思博士提出的政策的主要观点是福音布道工作主要应由中国本土基督徒来做，可以阅读和理解“教义”的那些本土基督徒应该自愿、无偿地指导还不能阅读和理解“教义”的人；由差会本部支付薪水的外国传教士，则负责进行总体监督，并定期对新信徒和本土教会成员教导的初学者进行考核。狄考文博士与倪维思博士一样诚挚地赞成利用中国本土基督徒向他们的人民布道，渴望中国本土基督徒自立，但他确信在中国采取不支付中国布道人员薪水的激进政策的条件还不成熟，一般来说，所有支付薪水的资金都由差会本部提供；在时机不成熟之前采取这种不支付薪水的激进政策会导致严重灾难。这里的简单陈述足以说明，他们的争论是明智君子之间爽快坦诚的讨论，他们认真充分的讨

论是健康生活的标志。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理论探讨或在差会成员中投票表决，甚至是由差会总部决定都不会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唯一关键性的检验是实际效果。关于这一讨论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一方面，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关爱中国本土基督徒和教会方面，狄考文博士常常是艰辛劳作，长期培训教区居民，支持他们的牧师和布道员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开展工作；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在某些宣教区看到了他所反对的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的确切证据。

依照长老会管理模式规则，在一个外国传教士宣教区内，适合建立教会之前，整个宣教区的宣教事宜都要由差会进行监督；但实际上，宣教区一开辟，就要建立各地长老会教务评议会和长老会大会授予各地长老会所属事务管辖权。各地长老会中的治理长老 (ruling elders)，作为高级神职人员，就是本土教会的代表，所有本土按立牧师拥有与外国按立牧师同等权力。除非特殊情况，差会总部一直不习惯于把资金交给本土牧师们用于他们的布道区，也不会让他们去处理诸如涉及差会本部要施行的政策和计划等事务；不过，组建教会，安置牧师，接收牧师候选人，发放牧师执照以及委派牧师，执行对牧师的惩处，各教会的诉求和吁请

等事，则都由长老会教务评议会来处理。当然，随着皈依者和教会以及本土牧师的增加，总体趋势是大部分问题交由各自的教会处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某些危险；然而，实际形势的发展证明这是唯一的可行之路，除非滥用权力，对本土基督徒还是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这终于使他们与传布给他们福音的外国人平等了，他们有了成为基督的教会成员的权利，也有了与外国人同样的责任。狄考文博士全力主张应尽快建立这样正规的基督教会。1865年11月，他作为少数几个组建山东长老会教务评议会的发起者之一，参加了在烟台举行的会议，那时还没有本土牧师参加。翌年10月，山东长老会教务评议会在登州举行，他被选为会议主席和执事。很显然，对本土基督徒来说，要使一次长老会教务评议会对他有相当价值的话，必须使用自己的语言。依此看来，从下面引述的狄考文博士日记的相关记述可见，那次会议可以说是比较令人赞赏的：“会议投票决定此后会议所有议程都使用中文，这次会议上就是使用的中文。一开始，无论是准备或提出动议都非常笨拙，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就比较习惯了。我们确实开了一次非常令人愉快的会议。会议有一项主要议题是一家本土教会提交的邀请梅理士先生的动议，梅理士先生接受了邀请，

我们也对他前往就职作了安排。”

在山东，取得可以在农村地区举行长老会教务评议会这样的进步，花了十年时间。1877年12月24日，狄考文博士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在农村举行长老会教务评议会，标志着我们在山东的工作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从各地来的许多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很显然他们从他们的所见所闻中获益匪浅。我们的教务评议会正在成为本土教会的重大事件，成为一股力量。我们的愿望是可以日益感受到这一点。”有时候，在接受了一位本土牧师后，由于实行处罚，也会使这些会议令人悲伤；但是，如果是事情本身要求做出处罚，即使是免除圣职或驱除出教会，也要进行处罚，而本土长老和牧师也都坚定地支持做出处罚。与此相反，这些会议也有喜乐，像接收牧师候选人，在他们似乎做好准备时，派他们外出传布福音等。偶尔也有这种情况：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没有读过书，经过数年培养，已经具备了做一名布道师的资格，教务评议会会授权他“施展他的天赋”；不过，通常情况下，授权担任布道师的都是经过长时间学校教育的年轻人。例如，在作为执事的1874年的报告中，狄考文博士说：

这次教务评议会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对牧师候选人进行考察。就通过考察的这些人来看，他们长期以来都拥有巨大的荣誉。有一位候选人领取了布道执照。通常布道执照都是发给年轻人，他不是一位年轻人，约 60 岁了。然而，他对上帝充满了热情，仍可从事良好的工作。我们有一位布道执照持有者被按立为牧师，这是本教务评议会按立的第一位牧师。这标志着我们的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为此虔诚地感谢上帝。培养合格的本土牧师向他们的人民传道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我们相信，其他差会将会很快像我们一样去培养本土牧师。

无论是在基督教机构中还是其他场合，狄考文博士都像对待外国传教士一样细心周到地对待本土基督徒；结果，他赢得了本土基督徒的信任，以至于他有时候能够为解决危险的纠纷做出重要贡献。可以想象，他在自己的“孩子们”中间就更是如此，这些孩子们作为文会馆的学生，一直尊崇他的见识和兄弟般的心灵。

1869 年 9 月，在写给“长老会旗帜”关于山东长老会教务评议会的稿件中，他说：“讨论了在中国设立宗教会议（synod, 也称宗教大会）的问题，也准备了一份通知，决定寄送其他长老会，敦

促立即为设立这样一个会议采取适当措施。自最高裁决会议采取行动期待并为设立宗教会议开辟了通道以来,已经 20 年过去了。”

翌年 10 月,长老会宗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长老会制中,宗教会议是比长老会教务评议会高一级的组织,由含有 3 个以上长老会的较大地区的所有按立牧师、代表各教会的治理长老组成;或者是根据既定标准由各长老会指派代表组成。宗教会议有权审查该地区所有长老会的举措,也有权在其辖区内制定新策略。那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们,有相当一部分视宗教会议为公共马车的第五个车轮,不可能取得与其花费那么多金钱和时间相匹配的事功。在第一次宗教会议上,就这一管理模式进行了热烈而长时间的辩论,甚至可以说是经过斗争才得以解决。狄考文博士坚定地相信宗教会议的重要性,他在争辩和其他讨论方式中公然施加他的全部影响支持设立宗教会议,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其他类似有争议的问题他也予以极大关注。宗教会议中应该只使用官话还是也可以使用地方方言?在这一问题上,他支持只使用官话的观点。是否应该建立神学校?要建的话建在哪里?关于这一问题,这次会议达成一致,并向母会寄送了从“慈善捐款”中申请一笔钱的报告,决定要在中国设立一所或几所神学校,但建校地

址则议定以后再议。这次宗教会议由 24 名成员组成，其中外国传教士 10 名，本土牧师和长老 14 名。会议议题在会期各个阶段翻译成了几种地方方言，以便所有人都更易于理解。会议共开了 10 天，议定下一次于来年在宁波举行。与狄考文个人有关的是决定由他来暂时负责美华书馆事宜。

第二次宗教会议在宁波举行。狄考文博士被选为主席。关于这次会议，他在日记中写道：

宗教会议的最大困难是语言问题，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障碍。作为会议主席，我的感触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时地告知会议的进程和内容。如果我不参加这次会议，我将在上海度过这个夏天，也就不会感到这么失落。这次会议讨论的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牧师候选人的资格问题。本土牧师们坚持说他们必须学习英语，外国牧师则表示反对。最终本土兄弟们的观点得到了会议的认可。会议讨论的一些问题确实令人兴奋，而不仅仅是感到有些许乐趣。

宗教会议第三次会议是在烟台召开的，由于这次不再担任会

议主席，因此他做了一次开幕讲道。他在日记中说：“这次讲道我做了相当细心的准备，全部写了下来，并按讲稿读过。这是我唯一全部用中文写下来的讲道稿。我发现读一篇中文讲道稿非常笨拙和难为情。”作为上次宁波会议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成员，他要准备一份供审议的技术术语提纲，并精确制定出编写顺序，由于缺乏相应中文，这一工作遭遇了极大障碍。他们起草了一份报告，得到了会议批准，被授权在宗教会议和各长老会使用。

尽管后来一些年还有关于宗教会议的记述，但我们必须用他做的记录中的另一段专门的记述来结束他在宗教会议的工作了。这段记录如下：

美国南部长老会差会、苏格兰联合长老会差会、由美国荷兰改革宗教会与英国长老会联合组成的厦门独立长老会都正式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都表示希望相互合作，最终将在中国的所有长老会联合组成为“中华长老会”。会议任命了一个与各长老会机构或差会进行联系的委员会，为最终联合做准备。这种联合可能许多年也做不到，但要尽快采取行动却似乎是有关各方的几乎完全一致的意见。

1907年，宗教会议三分之一世纪以前如此诚挚希望的联合工作有了长足进展。初步协商了数年之后，欧洲和美洲在华八大教区的不同长老会教派的代表聚首，组建了“中华长老会”，并欢迎任何信仰相同的其他中国教会与他们联合。狄考文博士认为，考虑到中国幅员广大，旅行费用以及语言差异等问题，最好是设立两个同样的教会机构。中华基督教会这一新组织除了外国传教士之外，还有约100名牧师和4万名受餐教友。狄考文博士不是这次聚会宣称组建的中华基督教会成员，但作为相关人员被邀请出席了这次会议。根据美国长老会派的规章，按立国外传教士要在外国加入上面提到的这样的新教会组织，其本国最高宗教裁决会议单独编制名册予以记录；那些不用经过审查由各长老会接收的已有牧师资格的人，必须是外国的其它教派出身。这就是狄考文博士去世时的教会身份。他是中华长老会的成员，但他依然是其美国母会的成员。

长老会制教会内部的最高组织是最高裁决会议。它监管组织内的宗教会议（大会）、各地教务评议会、牧师以及各教堂，此外它还具有其他一些与全世界整个长老会教派有关的独特功用。

1880年，长老会最高裁决会议在纽约召开，狄考文博士作为他在中国的长老会的委员参加了会议；1903年，最高裁决会议在洛杉矶召开。他在洛杉矶会议上被提名为大会主席候选人，但未能选上，这并非是有何理由要轻视他。事情很容易理解，一次那样机构的选举，许多偶然的事件随时会发生，选举结果几乎不可预见。最高裁决会议上的陈述表明，洛杉矶地方势力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这次选举，参加会议的人来自落基山农村和太平洋沿岸。此外，很多委员基本不了解狄考文博士的情况。他取得了巨大的工作成就，但却一直保持沉默。回国休假期间也没有到各教会讲演突击展示传教士的辩才以赢得声誉。他令人称道地参加了竞选，败给了一位教会中名望高的人。他被任命为司法委员会主席。

第十一章 登州文会馆

“只要活着，我就不能不强烈关注文理学院¹……我不能忍受完全离开我为之付出一生的文理学院。”——引自 1907 年 4 月致布朗秘书的信

1881 年 2 月 14 日，长老会山东差会寄信美国差会本部，正式请求将狄考文博士创建和培育了近 20 年的登州文会馆更名。这份请求书附有一个“计划”，下面是该计划的部分内容：

¹ 这里的“文理学院”的英文原文为“the college”。事实上，在狄考文的心里，依然是指登州文会馆。考虑到这封信写于 1907 年，这时的登州文会馆先前早已改名为广文学堂，为联合办学后组建的山东基督教大学的文理学院，故这里的“the college”译为“文理学院”。

一、登州文会馆¹组建为学院，取名“山东书院”(The College of Shantung)。

二、书院由山东差会提名的 6 名理事组成、经差会总部认可的理事会管理。

三、书院学制 6 年，学习中国经典、各类科学、基督教伦理，尤其要学习“四书”“五经”、中国历史、圣经、世界通史、数学、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天道溯源等课程。

四、书院的目的是要根据基督教的观点，并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对学生进行全面的中学和西学教育。

¹ 英文名称为The 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直译应为“登州男子高等学堂”，但早在 1876 年，登州蒙养学堂已正式改名为“登州文会馆”，故译名取现名。参见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民国二年广文学堂版，第 26 页；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狄乐播：《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P.50. 按：关于登州蒙养学堂改名为“文会馆”的时间，《文会馆志》与狄乐播的记述一致，即都是 1876 年。事实上文会馆正式公布改名和举行仪式是 1876 年期末放寒假前。由于清末民初记述时间往往习惯于年份用公历，月份用中国农历(这种现象在各种事件中很常见)，所以说登州文会馆改名时间为 1876 年或 1877 年都没有错，因为以文会馆的名字办学事实上是从 1877 年新学期开始的(文会馆每年农历二月初为新学年之始，参见 1891 年上海美化书馆刊行《登郡文会馆典章》英文“史略”部分)。确切地说，文会馆自己确定改名，实际上是 1876 年学期末，按公历则应是 1877 年初的事。

五、全部课程均用中文进行教授，特别情况下附带教授英文。

六、书院附设预科，以为生员之备。

七、书院最终要学生自费学习。为达此目的，严格按照中国水平安排生活，并尽快培训出胜任书院教学工作的中国籍教师。

八、书院现时暂设登州，将来何时迁至更适合的中心地，留待后定。

为了获得总部批准，请求书对学校更名的原因作了详尽说明。这些说明内容太多，不能在这里详述，但可以概要叙述其两大要点。其一是阐述华北特别是山东这样的伟大省份需要设立一所这种高等学校；言明登州虽然或许不是书院最终选址所需要的中心城市，但它是一座文化古城和条约口岸，迄今尚未受到形形色色外来人口的诱惑和侵蚀，至少暂时具有显著的优势。其二是说明登州文会馆所开设的课程表明它事实上已经是一所大学了，有校舍，并配有一所大学应该做的高级工作所需的设备。为了保留它已经拥有的地位，为了获得捐赠和声誉，更改校名是非常有利的。

1885年4月4日，山东差会致函总部吁请为文会馆主要外国助手建一处新房舍以供膳宿，并附带提及了学校的设备。该函称：“总部以一笔极小的费用得到了一处虽然简朴但却广阔的房产，该

处房产非常适合这里的需要。计划今年稍加改建修缮，即可满足 80 或 90 名在校生食宿之需，各房舍均有宽大的院落和活动场地。改建后的房产还将有两间大教室、三间自习室、一间大讲堂、一间物理仪器屋、一间化学仪器屋，并附带一个工作室和储藏室。另外还有一个坚固的石头观象台，价值 160 美元。”1894 年，差会总部曾批准建一处新建筑，要了解他们兴建的具体进度。1895 年 3 月 23 日，狄考文博士写信汇报有关情况时说：“今天我们打了地基，将立即开始动工兴建。”然而，就在那一年，由于他在圣经官话和合本翻译委员会的职责，虽然没有停止帮助对学校进行指导和管理，但却不再担任馆长一职。1896 年 2 月 8 日，他写信给差会总部说：“馆长一职现在由赫士先生担任，主要工作都由他掌管。我特别感谢文会馆的各种利益都掌握在一个有能力的人手中，尽管，当我在登州时，还要分担相当责任，承当相当的工作，而邦就烈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减轻。我们的新建筑已经竣工了，不用说这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奇怪的是我们为什么不早建起来。新建筑提高了文会馆在登州城全体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新建筑计有一座两层主建筑、宿舍及化学实验室。旧观音堂建筑改成了一座小教堂和其他各种用途的小屋子。全部费用最初估计需 8000

美元。这笔费用是否够了，在我手头掌握的记录中从未说明；但由于没有缺过什么的记录，可能是什么也不缺，除非是狄考文博士和其他人当时自掏腰包补上了。新建筑有蒸汽取暖炉和电灯，专门有一所房子安装了提供暖气和照明的设备，新建筑高高的烟囱，似乎是整个这一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后来通过捐献，还增加了一些其他设施。总而言之，登州文会馆的所有建筑，虽然大部分外观极为朴实，部分是中国式样，多少显得不协调，但却足以展示其所做的伟大工作。

山东差会在向总部提出提高文会馆学校等级及变更名称的要求中，强调说文会馆已经拥有“大量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认为文会馆拥有中国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化学仪器设备”狄考文博士也习惯于以骄傲的口吻谈及这些仪器设备，这倒不是一种虚荣心作怪，而是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一种满足感的表现。例如，1897年，他在给杰斐逊学院同学的一封信中说：“我花了一些时间和相当的精力与金钱制作物理仪器设备。我在这方面有天然的兴趣，我认为在中国，自然科学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拥有与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的仪器设备，比我们毕业时的杰斐逊学院的两倍还多；这里的仪器设备三分之二是我自己花钱制作的。”制作这

些仪器要花很长时间，是一项很缓慢的工程。早在登州蒙养学堂开办初期，作为一名教师，几乎不需要什么仪器，因为那时的学生还不具备接受自然科学的程度；但不久以后，他就遇到了困难，比如说在教授气体力学时没有打气筒。在那一阶段，他有时候给一个牧师培训班讲课。他总是尽力要让人们明白他办的学校绝不是一所神学校；他把要人们将他的学校看作是我们称之为世俗的学校这一点看得很重，尽管这所学校从始至终都进行基督教教育。不过，他在中国传教生涯中，又不断地为牧师候选人讲课；在文会馆能够向学生传授西方科学之前，他即习惯于教授学生们一些粗浅的自然界运动变化的知识，以便使他们将来成为他们自己人民的较好的领导者。例如，他 1874 年 2 月的日记记述关于那一年在神学班的工作时说：

我每天都听他们一节课，这次听物理课，下次听化学课。我为此重温了光学、力学、电学课程，详细阅读了一本化学书。实际上我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教学、实验和制作仪器上。大部分时间，我都有木工和铁工在工作。我准备了大部分需要用来演示力学的器物，准备了一些演示光学的器物，也装配了一台摩擦生电设备，并为我的电机制作了大量小物件。用我的新电池很好

地展示了电光和切割金属。鲁姆阔夫感应线圈的确非常棒，演示效果很好。我用氢氧爆气光放了两个晚上幻灯。在化学方面，我制造了各种气体，要比书本上说的多，并且全部进行了实验。这些实验给我带了了不少的麻烦，但我都非常成功地克服了。我制造了轻氢和重氢，并用它们进行了实验。然后我又用煤气为整个屋子照明，整整照了一个晚上。我为学生们做的实验课的内容，要比我自己见过的多。学生们学得很好，非常赞赏他们所见到的实验。我相信以后的结果将证明我的时间没有白费。我自己学会了大量东西，尤其是实验的实际操作方面。也许我还有机会把我学会的这些东西写出来。我还收集了大量各种仪器，将来要努力让它们进一步发挥作用。

狄考文博士就这样从蒙养学堂时期就开始了仪器设备的收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收集品不断增加，每一件都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文会馆的仪器设备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制造的，或者至少是在他的监督下制造的和自费购买的，或者是他的朋友应邀捐献资金购买的。有些较大和费用较高的仪器，则是他请求人们捐赠的，因此他也就有了一些奇特的个人联系。例如，在第一次回国休假途经欧洲时，他遇上了塞勒斯·W·菲尔德（Cyrus W.

Field)¹ ,并使他对登州文会馆产生了兴趣。在休假结束回到中国之后,他即写信给菲尔德先生,请求他能捐赠一台发电机。数月之后,他收到了对方答应捐赠一台电机的回信,这台电机在为文会馆提供照明方面发挥了极有价值的作用²。他在美国认识的两位朋友——纽约的斯图尔特(Stuart)先生和费城的贝尔德(Baird)夫人,为他提供资金购买了一台10英寸的反射望远镜,以及适当的零件和辅助设备。由于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每当经济拮据时,他的“约翰叔叔”就帮他一点忙。在通过一位熟人订购一套电报设备时,他解释说,差会总部没有提供资金购买这套设备,那是他自己花钱购买的,差会和教育界的朋友们也捐献了一些。

关于文会馆仪器设备积累的历史,以上所述就足够了,无论如何,也足以说明他为什么会对拥有这些仪器设备感到骄傲了。

1895年,他辞去了登州文会馆馆主的职务。他这样比较轻松地放弃这一职位,完全是因为现在青州府的赫士牧师做他的继任者,他完全信任赫士牧师的品格和能力。赫士先生一到中国就立

¹塞勒斯·W·菲尔德(1819-1892),美国商人和金融家,曾创建大西洋电报公司,铺设横贯大西洋的海底电缆。

²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所用的一般白炽电灯是美国科学家爱迪生1879年底发明的,历经3年时间的改进,终于使安全、大规模地提供电灯照明成为可能。狄考文第一次回国休假是1879年,1881年初返回中国,他在这时求得一台电机,并用于文会馆照明,似可以证明人们关于登州亮起了中国第一盏电灯的说法。

即同狄考文博士合作办学，志同道合。他担任登州文会馆馆主至1901年，应在济南府的山东巡抚之邀，这一年他辞去了馆主职务。那时的山东巡抚是袁世凯，一个持宽大、自由观点的人，而且关于他要负责建立的学堂¹，没什么要求不适合一名基督徒和一位福音牧师主持创办这样一所学堂，所以离开登州到济南，在当时或许是适当的。因为对赫士先生来说，他确信接受这一邀请是几乎所有与他有联系的传教士都赞同的。然而，不久以后，北京调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接替他的新任山东巡抚，与袁的思想完全不同，这位新任巡抚引入的一套管理新建学堂的办法，使赫士先生从心里感到他应该离开这个地方。赫士先生现在山东基督教大学神学院任教²，登州文会馆并入了山东基督教大学³。

山东差会在请求文会馆升格和更改校名的提案中，关于学校最终地址的专门说明引起了争论。反对登州作为学校最终地址的主要理由是这里偏僻。登州位于山东东部半岛的远端海岸上，崎岖不平的山区将它与内地分离开来。虽然这里是通商口岸，但他

¹ 即1901年创建的山东大学堂，后改为山东高等学堂。在新创建的山东大学堂，赫士担任总教习。

² 山东基督教大学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即后来的齐鲁大学。当时这所大学的文理科即文理学院在潍县，医科即后来的医学院在济南，神科即神学院在青州。

³ 登州文会馆1904年迁潍县，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书院高级班合并，成为山东基督教大学的文理科即文理学院。

的商务长期以来并不理想，而且并没有增长的希望。在提出学校升格和更名的请求时，尽管只是暗示，但很可能有些人即表示出学校将来定址烟台的愿望。任何关于迁移校址的计划，狄考文博士都坚决反对，并提出了自己的充分理由。从未有什么事情使他感到如此担心。在 80 年代晚期和 90 年代初期，在华长老会各差会中关于哈珀 (A. P. Happer) 博士筹到了一笔资金创办英华书院一事，又引出了登州文会馆的校址问题。哈珀筹集到了一笔相当的捐赠款项，并任命了管理这笔捐款的董事会。建立英华书院的计划并未得到狄考文博士的真心支持，当然，只要这一计划或这一计划所蕴含的思想不威胁伤害他的登州文会馆，他也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哈珀博士长期在华南传教，无疑诚挚地忠实于他的工作，他的想法是通过创办英华书院，为各教会培养高素质的本土牧师。狄考文博士深信，从这一计划的本质来看，其结果必定相当失败。书院课程中，英语要占很大比重，尤其是要招收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生，更不易成功。1887 年 3 月 18 日，就计划中的英华书院的选址问题，狄考文博士与赫士先生联名给差会总部的一位秘书写了一封长信，坦率地表达了他们坚信计划中的英华书院不可能实现其创办者追寻的目标的理由。关于教授英语的

问题，他们多年前在登州文会馆就认为必须予以反对，决定支持只用中文授课；只要文会馆由狄考文和赫士掌管，他们就坚决不教授英语。早在蒙养学堂更名为文会馆时，狄考文博士就曾在这—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念：

如果我们教授英语，并以此寻求官员和富人们的资助，无疑我们会得到一些帮助和支持。然而，我们将被迫尽量放弃文会馆与众不同的宗教特点。我们会培养出一个不同的学生阶层，学校的宗教气氛将不由自主地发生变化。另外一个结果也会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中学水准的下降。学习英语会对学生学习中国经典造成致命的伤害。当学生们能够说英语时，我们想留住他们无疑困难极大；英语能为他们带来高工资时，他们就会立即到有高收入的地方去谋职。此外，登州不是一个外国人居住的港口，而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内地城市，它不是一个靠教授英语取得显著未来的学校应该选择的好地方。

他的上述看法与数年前的信念完全一致，在给差会总部一位秘书的信中，赫士同他一起明确陈述并强烈坚持他们关于英语教学一事的意见。

在英华书院选址问题上，可供选择的地方很少，只有广州、南京、上海和天津几个城市。也有人提到了烟台，但并未认真考虑，尽管设在烟台的可能性很少，可即使这样一种可能性，对登州文会馆来说问题也十分严重，只要这一问题没解决，就会迫使那些学习优异的学生考虑做出选择。不久，哈珀博士开始考虑把他计划中的英华书院交给别的人来经营，并写信给狄考文博士试探是否可行。这时英华书院似乎计划设在上海，并且要与登州文会馆合并。1890年1月9日，狄考文博士写了一封长信予以回复，非常坦诚地谈了自己对整个问题的看法，其中谈到：

不过，在做出任何明确的决定之前，有必要解决书院的政策问题，并确定书院的主管。任何人要把英语和**自费**读书作为显著特色，并进而要将其建成为一所基督教书院，都会像目前在中国的各种事情一样，难以自己掌控命运。我不会受感召从事这样的事业，也不会参与这样的事业...登州文会馆不能离开山东。我们可以走，仪器设备可以迁移，但学生不能。说他们或他们当中相当一批人到上海去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是特殊情况，华北的学生到上海去接受教育是不可能的。费用太高，距离太远。中国的每一地区都必须有自己的学校。

不久以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狄考文博士和赫士先生写信给那笔捐助资金的董事会，建议在一定条件下，哈珀博士筹集的那笔资金可以转给登州文会馆。在这封信中，他们坦诚地谈了对英语的看法。说他们完全愿意引入英语教学，但是**只能是以不改变文会馆特点和运作方式为条件**。他们的这封信太长，不便在这里引述。这里借用狄考文博士在 1891 年 2 月 9 日给捐助资金董事会信的同时写给差会总部一位秘书的信**中的**内容，足以说明他们的观点：

我想以相对非正式的**方式**谈几件事情。其一是假如我们关于英语的建议不能令人满意，请您考虑不要把计划中的学校设在烟台，使其成为登州文会馆的竞争对手，允许这所学校设在烟台，对总部来说无异于自杀，对我和赫士先生而言，则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不打算参与这样的竞争，而是会立即退休，去寻找其他领域的工作。其二是希望您注意我们关于英语计划的真正内在性质，这一计划是要确保把英语用在文学和科学方面，只对能把英语用于文学和科学的那些人教授英语。我们要教授英语不是为了要教授每一个人英语，不是要教授那些仅仅为了学英语的人。

我们要教授成年人，而不是要教授小孩子。最后，赫士先生和我数年前就计划开设应用科学方面的研究生课程，并一直在等待我回国去推动实施；即使目前的捐赠计划失败，我们依然想开设这种课程，并像上述已经说明的那样引入英语教学。

没有迹象表明那笔捐赠资金将转给登州文会馆。

只要有时间和机会，狄考文博士依然继续对设在登州的文会馆给以帮助。90年代初期，在上面谈到的迁校一事风平浪静之后，他就请差会总部授权他设法募集捐助资金，但那时他未能获准。1900年初，差会总部改变了态度，准予人们为取得筹集捐助资金权而努力募集捐款。当然，为了能成功获得募集捐助资金权，必须制定一项令人满意的学校管理计划。关于这一问题，差会总部曾与狄考文博士商讨过，他直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首先应该发放一份许可证，授予捐赠基金以独立的法律地位，但差会总部成员要担任管理这一独特资金的董事会董事。对学校的总体监督，他认为应由山东差会成员组成的“校务理事会”(Field board of Directors)负责。这并非是他完全满意的一个计划。一方面，他担心这样以来，文会馆会变成一所教授英语的学校；另一方面，也怕文会馆会变成一所神学院。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不过，

在最终向差会总部递交的吁请书中，他确认有一条保护条款，总体上说还是可以的。在 1903 年回国休假时，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为文会馆请求永久基金，那时文会馆已经迁到了现在的地方¹。但是，他这次未能得到很大帮助。艾达同他一起回国休假，她谈到他这次的工作经历时说：“他习惯于从事任何工作都取得成功，因此很难忍受富人们的冷漠，这项工作在他看来是如此重要。”

登州文会馆迁址问题始终还是要解决的。只要是否应从登州迁到烟台，还是由上海一所更自命不凡的学校兼并的问题不存在了，那些谈论迁址的人相对来说就容易平静下来。但是到了 20 世纪初，即使华北也发生了间接影响这一问题的重要变化。长老会山东差会增加了一些年轻的新生力量，从美国繁忙事务中脱身出来的新来乍到的年轻人，渴望以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的工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使中国本身，也已摆脱老态龙钟旧貌，开始焕发青春。德国人正在山东修筑铁路，其中一条横贯山东中部地区，经潍县直达省城，然后从那里与天津和北京相连。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差会中的年轻人尤其渴望将具有巨大、高效发展前景的登州文会馆迁移到他们为之奉献生命的地方，也就毫不足怪了，

¹ 这里所述不确，从下文所述可知，事实上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时文会馆已经决定迁至现在的地方了”。文会馆正式迁往潍县是 1904 年秋的事。

因为在那里，他们能够同居住在那块土地上的成千累万的人以及新时代运动密切接触。1901年2月26日，狄考文博士写信给差会总部说：

在山东差会一次会议上，投票决定了登州文会馆迁往潍县，并放弃登州布道站。那时我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未能出席这次会议，我理应对这么重要且与我有这么多关系的事情，说点什么……首先，关于登州文会馆。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登州文会馆的建设上，当然，我对它的未来依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你可以轻易地想象到，我当然不情愿文会馆从上帝安排的地方迁走；不情愿看到我为之花费艰辛劳动和心血建造积累起来的所有建筑、暖气设施、供电设备以及其他用具毁于一旦；也不情愿看到我自己投入其中的相当数量的金钱付之东流。不应轻易忽视上帝将文会馆安排在登州这一事实，也不应丝毫不顾及登州的自然优势。要为潍县找出有利于办学的强有力证据是困难的，除了设想潍县必然是一个商业中心从而使它成为最好的办学地点这一有待商榷的问题之外，我不想就它的诸多优势再说什么。总的看来，我认为除了可以获得一笔足够用于建新校址的捐款之外，差会总部在登州文会馆迁移潍县这件事上，不用做什么事情……

不过，我还是会到潍县去，而不是强烈坚持留在登州。

在关于登州文会馆迁址问题上的争论，他失败了，现在试图去探究争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各自的优点是没有意义的。上面刚刚引述的那封信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是否放弃登州布道站。那些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中主张放弃登州布道站的人们，计划把登州交给南浸信会，南浸信会在约 40 年前稍早长老会几个星期到了登州，但登州文会馆的发展令该会黯然失色。狄考文博士以最大的热情和雄辩的口才为保留登州进行了辩护。尽管他在世时是否保留登州布道站的争辩没有做出结论，但这一没有结果的争论却令他十分焦虑，而与此同时，非专业人员的巨大奉献又带来了礼物，使得登州布道站保留下来了。现在的情况证明保留登州布道站的决定是明智的。登州布道站 1909 年底的报告说，这个布道站拥有：一处城里教会，300 名成员；一所主日学校，学生有时达 500 名之多；30 处布道分站，大约有 500 名成员；24 所小学，有 316 名男、女学生，均由登州布道站高级学校的毕业生担任教师；一所女子中学，平均在校生 46 名，是年底毕业 12 名，几乎所有毕业生都作了教师；一所男子中学，学生 40 名，一些毕业生到了潍县的广文学堂或其他高等学堂学习；该校还附设师范科，办起了

模范小学堂；一所义工夏日学堂。此外，其它一些机构的福音宣传工作，波及登州周围地区三百万民众。长老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南浸信会工作的开展。

登州文会馆的实际搬迁时间是 1904 年秋。在决定搬迁到实际完成搬迁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影响狄考文人生经历的一些重要事情。如前所述，赫士先生辞职了；1883 年来到中国参加山东差会的柏尔根牧师，被推选为文会馆监督。狄考文博士与赫士先生的联系非常密切，完全信赖他，他的辞职对狄考文博士来说，几乎如同丧亲之痛。但是，他从痛苦的深渊中豁达地走了出来，写信给差会总部说：“柏尔根先生明显是我们山东差会担任这一职务的最好人选。他极受中国人欢迎，这对他开展工作非常有利。现在的形势非常有利也非常重要。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山东目前看上去好像是走在中国教育发展的前列。如果给以适当的支持，文会馆将有大作为。”在这段决定搬迁尚未正式搬迁期间，狄考文博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回美国休假，1903 年秋返回中国时，带回了一些他为文会馆努力争取的实质性利益。

回到中国之后，他又面临着有关学校的另一重大问题。山东的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已经在山东高等教育方面展开合作。

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尽管担心这一计划将会带来诸如危及学校真正效用的根本性改变，但他并没有认真反对，合作计划稳步推进，终于达成。根据大家采纳了的计划，成立了山东基督教大学，规定该大学下设三所独立学院，每一所学院都设在不同的地点，这是由各学院隶属不同差会以及一些其他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文理学院设在潍县，神学院设在青州府，医学院设在济南府。根据这一计划，成立了学校校务理事会，负责总体管理学校、课程设置，当然，也负责制定某些基本规章，狄考文博士是这个理事会的最初成员。1903年底，理事会在青州府召开第一次会议。关于这次会议，他在写给差会总部一位秘书的信中说：“理事们全部出席了会议。会议气氛非常融洽。我们推举了教授，制定了某些课程设置以及管理方面的总的原则。从理论上讲，基督教大学似乎很有前途，但实际管理起来将有困难。潍县的校舍都建起了一层，来年秋季不难全部竣工，届时务必将文理学院全部迁入。”翌年夏初，他在信中写道：“我于大约一个月前陆路到了潍县。我花了两个星期时间把要带走的東西拆卸、打包，包括工作室、锅炉、引擎、发电机等。我发现要把我的全部零碎物件都打起包来是件很困难的事，准备用船运往潍县...我在潍县呆了24天，卸载安排了所有

物品，整理好了工作室，规划设计好了供热、供电设施。”在同一封信里，关于青州府神学院的问题，他表达了自己如下的看法：“在去年冬天的理事会会议上，理事们肯定都明白，严格说来，那远不是一所神学院的问题。事实上，理事们都知道青州府的神学院将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训练学校，另一个是神学院本身。在这种模式下，我们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才能够维持其运转...在这样的组织管理下，青州府的学校并非不可能发展得比潍县文理学院的规模大。”

关于狄考文博士和登州文会馆的叙说就要结束了，只要能做到，很多读者很可能愿意剩下的事情用狄考文博士本人的话来叙述。1904年12月21日，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文会馆现在已经全部迁到了潍县，大约有120名学生。新校舍非常漂亮，比我们在登州的好多了。我和艾达都到了潍县，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我们同我的兄弟乐播住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这种安排很适合我们。我现在不在学院教学，但如果我离开学院会感到不自在。我希望学院有一个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关于他和妻子1904-1905年度情况的报告中，他写道：“秋季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督建造和装配一间工作室，安装一台32马力的供学校取暖和

照明用的蒸汽锅炉，以及供取暖用的蒸汽管道，装配引擎、发电机和**学校照明用的**电灯电线。还安装了一台风磨，建造了一个抽水机蓄水池，安装了为**学校**和部分家庭供水的管道。另外，我为自己和妻子盖了7间中国式的房屋，用作书房、寝室、库房、储藏箱包等的储藏室和放煤炭用的储煤室。”这套狭窄、一层建筑的小房子，就是他们后来在潍县生活时间的家，尽管吃饭与别的家庭在一起。有时候，他们称这所房子为“边境”，因为这套房子与乐道院尽头角落的一小块外国人墓地之间只相隔一条羊肠小道。

1905年11月，他写信给差会总部的一位秘书说：“当然，**学校对要建科学馆的前景**感到高兴，我为从肯沃斯（Converse）先生那儿得到这份**礼物**做了些工作。”他在1906年度的报告中说：“本年初冬，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计划、估算和订购潍县新科学馆的照明、供暖、供水设备。”

最后，我们要直面狄考文博士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与广文学堂的积极联系。1907年2月26日，他在写给差会总部的一位秘书的信中说：

我三天前刚从在青州府举行的校务理事会议上回来。这次会议开的时间很长，也相当重要。与会人员面临一些重要和难以解

决的问题...当然，您可能从其他人那里以及会议记录了解到，柏尔根先生辞去了广文学堂监督一职，而我们又找不到继任者，于是大家要我暂为代理，直至可以做出其他安排为止，要求柏尔根先生仍然留任教授，他同意了。这样，我就可以担任监督而不必做很多教学工作了，在目前情况下，我还不能承担教学任务。

在他担任监督期间，广文学堂不但运转良好，而且还取得了一些重要进步。在校生总计达 181 名，有 10 人正式毕业。在登州时，他就极为重视各种学生团体，现在这些学生团体又有了新的发展。新科学馆数间房屋都投入了使用，又新建了两排宿舍，一排供学堂、单身教师和工人使用，一排供学生们使用。其他小事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然而，代理监督期间，他发现某些方面令他十分不安。其中有些原因是不易觉察的内部管理问题，外面的人现在看不明白，不值得在这里评说；有些则是更具永久性，并关乎学校的特性，有待将来解决。英语教学问题争论了一段时间没有结果，曾告一段落，但现在又重新提起，而且有了新的理由。他在 1907 年 10 月 19 日的一封信中说：“我非常同意设立一所英语学校，最好是设在济南府，但我反对在广文学堂教授英语。在广文学堂教授英语，

将很快毁掉学校迄今获得的学问上的良好声誉。”他担心的是如果在广文学堂教授英语，学生们将不再做牧师和向人民传布福音的伟大工作，转而去从事商业，学校就将成为买办和职员训练机构。后来，因为在一些大型联席会议上，他感觉到了一些中国人由于除了自己的语言还掌握了英语所拥有的优势，强烈反对英语教学的态度有了相当程度的变化。他也看到了随着时代的变化，掌握英语是了解新学所必需的，英语成了联络中国各不同地区的纽带，成了中国同外部世界联系的工具。他不再把教授英语看作是传布福音事业的主要危险，明确表示应该在神学院教授英语。无论如何，他很显然放弃了曾一直为之争辩的理由。在写作本书时，广文学堂为学生每学期安排5小时英语学习选修课程，为期四学年，第五年的也安排有英语选修课程。此外，狄考文博士不大赞成那时为学校从“综合教育基金会”争取一大笔捐赠而发起的一场运动。在上面刚刚引述过的那封信中，他说：“广文学堂应该由监督和全体职员把一些人送出去做牧师，否则就失去了办学目标。我赞成激励学堂自然发展，而不是这种迅速的非正常的发展，这种迅速非自然的发展将使学堂丧失基督教性质。我不主张学堂目前这种突然迅速地超常规扩展。这样将使学堂迅速世俗化，完全脱

离其自身的理想和工作轨道。”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深深地触及了学校发展的要害，争论双方诚挚的朋友们均极为重视。广文学堂的有些问题非常明显，任何参与争论这些问题的人观点都很鲜明。这场争论双方互有短长，结果是明智的仁人君子都与自己原来所持观点有所不同，判断对错的唯一决定性标准是由年轻人所提倡的变革的实际检验。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经历了生活中一再遇到的一种常态，那就是长期辛劳、自我牺牲献身于伟大事业的人，终于使这一伟大事业到了他必定要退下来，而事业必定要发展的阶段。此时从事物的本质上说，应该把事业交到年轻人手中，由他们根据对处在黎明曙光中的事业的感悟来引领事业前行。狄考文博士几乎已经不能对应该做什么做出最好的判断，而即使能做出最好的判断，执行起来也必定会褒贬不一。他最终明白了这一点，勇敢地面对这一无可避免的事实。像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在这一问题上，他对那些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不存在个人恩怨。

1907年10月27日，他写信给官话和合本翻译委员会的一位同事说：“我已决定从学校管理职位上退下来，将来也几乎不再参与有关管理事务。这一工作曾耗费了我大量时间和精力，取得了应该取得的最好成果。现在我不再关心教育问题，对教育也不再

有任何责任。”在 1907 年 12 月 21 日给布朗秘书的一封信中，他说：“鉴于目前的状态，我想最好立即无条件地辞职，辞去广文学堂监督与山东基督教大学校务理事会理事职务。我没有要做监督的野心，事实上这个监督职位也仅仅是在有合适人选之前的权宜之计。在我不能切实贯彻执行差会总部的主要政策和意图后，我就希望不再担任校务理事会理事。这是个不小的考验，我向你保证，在我传教生涯大部分时间都为这所学校贡献了之后，要切断与这所学校的所有联系。事实上，数星期来，学校事务严重影响了我的健康，我已经不能承担过去所能承担的负累了。”

青岛狄考文葬礼上一个显著事件是宣读了登州文会馆毕业生的统计数字，其中包括在潍县广文学堂毕业的学生。这些统计数字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具体情形如下：获得毕业文凭者共计 205 名。其中，在政府开办的学校做教师的 38 名，在教会学校做教师的 68 名，教会牧师 17 名，福音布道师 16 名，从事翻译工作者及报刊主笔 10 名，经营商业者 9 名，医生 7 名，邮局职业者 4 名，铁路职员 2 名，基督教男青年会干事 2 名，海关职员 1 名，工程局职员 2 名，秘书 1 名，在各自家乡任职 6 名，亡故 22 名。¹这

¹ 这里列出的毕业生统计数字及职业分布与《文会馆志》给出的同样是 1910 年的调查统计稍有不同。《文会馆志》统计毕业生领有文凭者总数为 208 名，另有个别行业从业

些毕业生分布于 13 个教派，100 所学校，遍布中国 16 行省。另外，还有约 200 多名在登州文会馆学习的学生没有取得毕业文凭，为肄业生。

文会馆自搬迁以来稳步发展。上面所述的那笔大捐赠，既没有拿到，对学校拿到这笔捐赠后令人担心的情况也无从谈起，因此对于接受这笔捐赠基金影响的争论也就无法证实谁对谁错了。不过，其它计划中的变革都实现了。1910 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报告说，广文学堂在校生总计 306 名，高级班 80 名。毕业班的 17 名学生全部为基督徒。自搬迁到潍县以来至 1910 年，毕业生中还没有准备做牧师的，但在 1910 年这年，在一位中国牧师的¹活动激励下，一种平缓但巨大的宗教觉醒气氛弥漫了整个校园，结果是准备做牧师和其他福音传布工作的学生数量大增。刚才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上说有 100 多名学生决定要做传布福音工作。这本小册子恰如其分地指出：“我们学生中的这一运动使我们感到敬畏，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我们从未设想同时有这么多学生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现已决定，山东基督教大学所有系科都迁到山东省城济南府。

者数字也稍有区别。参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1913 年，第 55-56 页。

根据最近的报告，坐落在青州府的神学院，有正规神学专业学生 11 名，普通学生 128 名；济南府的医学院有男生 30 名。山东基督教大学总计有学生 538 名。从长老会这方面来说，一切都起源于 1864 年登州老观音堂里那 6 个小男孩。今天，那 6 个小男孩的学校已经成长为大学，而且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据说狄考文博士从不引领祈祷式，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祈祷式，他没有最热心地请求主培育中国基督教领导人，以便由他们带领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潍县和青州府的情形对他在四十五年传教生涯中的祈祷做出了最好的解答。

第十二章 结缘仪器与机械

“中国最需要的事物，大抵首先是电气工程，特别是电信工程；其次是土木工程，尤其是勘探和修筑铁路。在这一两件事情上的准备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为这些事情做好准备的初步工作，当务之急是对科学仪器有一实际的了解，即知道如何制作和使用科学仪器。我是从书本上了解这些的，没有任何人指导，只不过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劳动”。——摘自 1888 年 10 月 29 日写给一位即将做教师的人的信

每当早期的一些熟人在一起谈到狄考文的时候，必定要提及他在制作和使用仪器、机械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国获得的这一声誉，有时候几成了他的负担。我们前面谈了他曾承担在上海的差会出版社的临时管理任务，而这并非是他自己愿意做的，因为，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言，分派他做事的那些人把他当作一个“多面手”(Jack-of-all-trades)，认为他能够做让他去做的任何事情。**如果那时他们真正认为他仅仅是一个操作机械就能做好许多事情而不**

是能熟练掌握这些机械的人的话，那是对他的极大不公，后来的了解足以纠正这一不公正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狄考文在制作和使用仪器、机械方面取得了更大更难取得的成就，他在这方面的声誉也随之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广泛传播开来。然而，即使似乎其他人将此视为他特殊传教工作的背景，狄考文也绝不允许以这种形式和这种程度宣扬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他去世后人们对他品格和工作的颂扬，甚至很少提到这一点。从始至终，他都将自己的生命和才能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了使中国人基督教化的事业，以致当了解他的人回首他所完成的工作时，几乎忘却了他在制作和使用仪器、机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狄考文博士本人把他在这一领域的的能力归因于某些天赋。他天生具有做这方面工作的爱好和能力，关于这一点，有些关于他很小时候的故事流传下来。据说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常常为一颗长满甘美果实的樱桃树遭啄木鸟的侵袭而感到苦恼，他很仔细地考察了周遭的情形，然后紧挨着樱桃树竖起了一根杆子，在杆子的顶端为鸟做了块很好的栖木，他自己则拿着一根棒槌守候在杆子下。啄木鸟啄下一颗樱桃，接着飞到杆子上去享用，但就在这时，他用棒槌猛击竖立的杆子，啄木鸟便从杆子顶端落到了

地上。就这样，狄考文拯救了他的樱桃。还有一个故事说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曾和他的父亲争论一头尚未断奶的小猪是否有回家的本能。他坚持认为小猪会根据已知的确定路线回到它妈妈那里。为了获得满意的答案，他把一头小猪放进麻袋里，背到一个离猪栏很远的地方，然后把它放出来。人们认为这种做法能确定小猪的主人。令他高兴的是，小猪立即像蜜蜂一样寻找回家的路，从不放弃，直到回到老住处。

狄考文在几乎没有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发展并运用了这种天赋。如果说有什么帮助的话，很可能就是在“修道院”¹的库房里的旧工作台。狄考文的父亲用这张工作台制作和修理娱乐及工作中使用的玩具和工具，也许这对管教与引导狄考文有所帮助。除此之外，狄考文未受过任何指导。在他那个时代，大学里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室是专门为教授做实验用的，学生只能在教室里观看实验。我们在杰弗逊（Jefferson）读书时，自然科学主席琼斯教授很有天赋，他能自己动手制作，以增补实验仪器设备的不足，如果作为学生的狄考文发现他去地下制作这些仪器，就会愉快地和琼斯教授一起称心如意地合作，以前从没有过这种违反古老习惯

¹ 狄考文 5 岁以后的老家，参见第一章“故乡”。

的事情。在比弗(Beaver) 学院读书时，狄考文恳请助理教学，第一次动手制作了一些仪器部件。但是，直至到了中国，他的这方面的才能才有了用武之地，并不断扩展至他生活的各个领域。事实上，即使他休假离开中国，也没有停止在仪器和机械方面的工作。在早期的一次休假中，他一直在寻找能对他在中国的学生们有帮助的人和事物，他在鲍德温机车工厂 (Baldwin Locomotive Works) 经特别允准，呆了一段时间研究机车构造，目的是要制作一个模型在休假结束后带回中国。在这方面，狄考文对这些引擎的结构非常熟悉，以致他很难使那些熟练的技师们相信他根本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郭显德博士在狄考文去世后会这样写道：“1893 年，我很荣幸在芝加哥万国博览会遇到了他。他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在那里详细地考察他特别感兴趣的许多事物。由于我的时间有限，他好意为我做向导，与我分享他观察的收获。我们先参观了电气部，他已经仔细研究了电气的各种用途。接着我们参观了机械大厅，他已经在那里花几天时间进行考察，绘制最复杂的机械草图、测量机械部件的尺寸。他似乎什么都了解，好像他一生都在做这些工作”。赫士 (Hayes) 博士说：“在潍县，数年前有一次大发电机突然不工作了，狄考文博士就很漂亮地展示

了他处理紧急事件的能力。他拆开机器，找出了问题所在，把导线重新绝缘，重缠了线圈，发电机就像通常那样供电了... ..早在西方尚未普遍制作电铸版之前，他就搞到了一套设备，并教授了一班中国工匠。当电风扇时尚起来以后，他购买了一个小风扇做模型，接着就制作出了另一个”。

为了制作大量仪器设备，狄考文博士建了一个制作所，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足以满足他的需要。早在 1886 年给他弟弟威廉 (William) 的一封信中，狄考文就写道：“为了准备仪器、制作一些简单的器具，我已经建起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制作所，这全部是我自己投资建的。这个制作所里的工具、材料，共计花费 1000 美元。我自己出资雇用了一名工人，我已对这名工人进行了训练，他能够做大部分普通工作。我们这里可以制作许多小商品，这要比购买便宜得多。然而，许多商品还不能制作，尤其是带有玻璃的商品，或者一些有专门用途和专门技术的机械”。制作所不断发展，各种各样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关于这一点，狄夫人¹写道：

除了一间屋用作木工房之外，旁边的房子很快就都用作制造所了，这个制造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完善起来。房子的上层

¹ Ada Mateer, 狄考文的继室夫人。

用于储存已经完工的仪器，给制作好的仪器着色、上漆，也用来晾干器具。下面一层则是制造所本身用房，有升降机井道、铁匠铺、一个大长型的工作间、一间化学药品密室，等等。制作所每一点可利用的空间——上面、周边、地上——都布满了各种材料，上面悬挂的木板上，贴着墙排列的用旧箱子作的箱柜里，以及地面上，都放着或装有各种器材。这个制作所不仅有制作各种器械的原料，还是一个各种用坏了的器械的修理厂和废弃物品仓库。40年后，当我们回忆这些陈年老账时，这个制作所已不得不迁到潍县了！

到了潍县，制作所永久保存下来，与以前的相比，主要的区别是规模大了，房屋设施好了，增添了便利设备，进行了一些改进。狄夫人继续写道：

每购买一台机器，都通过通信对市场进行详细调查，选择最好的。对要用来制作仪器的机械和工具，像用作镟制、铸铁、灌铅、铣、抛光、电镀、铸造等等的机械，选择尤为审慎。他的制作所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用来制作各种仪器或电气及蒸汽设备的器械，以便于他随时可以制作任何器具，从装配一台风车或水利

系统，或一台引擎、发电机，到为眼镜框镀上黄铜、修理自行车，什么都能做。

他尽可能地把实际的技术劳动教授给中国工人——一位熟练的工头和在这位工头指导下的学徒们。

可是，作为一名传教士，他为什么把相当一部分时间用来做这些事情？其实问题很简单，在他作为传教士生涯的初期，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为了满足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的生活需要，他不得不投身于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他到中国来在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定居，那里可以买到外国商品，很可能他在机械方面的天赋大部分就没有施展的机会。但是在登州，他必须用一些零碎物件自己动手做炉子，因为为了取暖，炉子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的原因，他不得不拔牙，制作假牙，补鞋，并且在建造“新家”时做所有建筑行业的工头。因此，有时他被迫做一些即使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事。1865年，当小凯迪娅·梅理士（Katie Mills）去世时，他不得不充当殡仪操办人的角色。他说：

做棺材的事落到了我头上，我只能凭记忆的样子做。我不能告诉木工怎么做，不得不自己动手。这位木工做一些粗活，我打

孔凿槽往一起拼装。做的时候全凭眼力，我发现要做得每个部件都恰到好处、严丝合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用黑色天鹅绒覆盖外面，把白色亚麻布衬在里面。完工之后，看起来还很像那个样子，梅理士先生和梅理士夫人都很高兴。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做的工作。

在最后一次乘车回国休假路经西伯利亚某地时，机车出了毛病，火车停了下来。由于耽搁太久，狄考文走出车厢下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他见到机车竟是大鲍德温牌号，这种牌号的机车结构，他早先休假时在美国已经非常熟悉，很快就发现了故障的原因。他不会说俄语，负责机车引擎的那些人不会说英语，他只好设法展示机车机械装置故障的原因，以及如何修理的方法，不一会，火车就开动继续上路了。

在他长期居住中国期间，并非总是需要迫使他利用自己机械方面的天赋，也不是经常非要自己动手制作普通生活用具。在潍县时，他就常常花几个小时指导别人修理诸如炉子之类的器物。

严格说来，他在这一领域稍晚些时候和比较大的真正由于需要所取得的工作成就极少；更确切地说，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为了有助于在中华帝国传布福音的伟大事业。他确信可用来达到这

一目的的最好的机构之一是学校。同样，他也确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学习这些学校的课程，在打开福音之门方面，没有比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包括现代机械原理的运用更有效的了。他相信，如果让所有学生都接受这种知识的教育，把在基督教影响下受教育的学生派到他们自己的人民当中，如果这些学生也皈依了基督教，那么，结果就会使现存多少个世纪流传下来的盲目迷信观念烟消云散；因此就必定会为基督教的传入打开广阔的大门。这些是他的预测，现在中国的形势，充分证明了这一预见是明智的。但是，要有效地教授自然科学，他必须有仪器设备。获得仪器设备的唯一途径是购买一些，再利用自己的能力制作一些，尽可能地弥补欠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要在一定范围内为学校提供更多的仪器设备，也是更多地开办诸如提供供暖、照明工厂的前提。教授科学知识和将科学知识运用于生产领域，远比制作帮助更有效工作的方便设备的作用大；科学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应用，不断地向学生和全体人民展示自然科学原理，显示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价值。

除了自己学校的学生之外，狄考文还利用他的仪器和机械设备，用现代科学影响其他人，开辟了人们接受福音之路。对狄考

文实现这一目的的一种做法，艾达做了生动的描述：

登州举行府试时，大批学子涌进城里，希望获得生员资格，这种资格是官场必经的进身之阶。考生中很多人听说过外国机器的名声，都要来证实一下，因此狄考文博士常常就在考生们无事的几天里和他们在一起。最后，和这些人打成一片的效果非常好，于是就找了一个地方以便把他们集中起来，这种办法也用于中国新年，那时所有城镇和乡村都休闲娱乐。在《官话类编》(Mandarin Lesson) 有了收益之后，他就用这些钱建造了一个大博物馆，入口开在街面上。博物馆的一半是个大讲堂，大讲堂可以搞成暗室，以便放立体幻灯或电影。不过，这个大讲堂一般还是用作讲堂，进来的人可以坐下来听道，同时，先进来听讲的一帮人有专门助手领到里面的屋子参观。里面的屋子对这些人来说是多么神奇啊！在这里，一个人用一只手转动一把小曲柄，磨谷物就像一个妇女或一头驴子费更大的力气在石磨上磨得一样快。在这间屋子里，有些箱子放着鸟的标本，四周墙上挂着各种动物的图画。更令人们惊奇的是这里有个人摇动一把大曲柄，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使一辆小铁车先在顶部发出火花，然后围着屋子在一条循环铁轨上奔跑。他们觉得奇怪，如果那个人拖着这辆小铁车在地上转圈不是

更容易吗？！这间屋子头上有一台柴油引擎，无疑使人们感到惊奇；一台“令人毛骨悚然”的机器，的确使他们感到震惊；许多难以诉说的事情，都使人们惊讶不已。这间屋子参观完了，这些人被引导着从另一个门出去，当汽笛鸣响表示该下一帮人进来的时候，这些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他们称这种观光为“开开眼”。

偶尔也有高级官员来参观，见识见识这些稀奇古怪的事物。长老会山东差会 1909 年的报告说通过街区小教堂和这个博物馆，这一年有 12000 人听讲了福音，所以现在这一工作仍在继续。

狄考文博士在利用自己的天赋转而为中国基督徒开办工业，促使穷人自立方面，也有着美好的口碑。他要求供应纺织中国麻毛混纺粗面料的织机，以及装包机或精纺针织机器；询问用于染布后干燥和熨平棉布的滚轴熨烫机的情况；派人作为一名中国铁匠搜求车床。1896 年，他四处奔走要弄到一套面粉厂设备。他说：“中国基督徒们计划要开办面粉厂，他们打算组建一家公司以筹集经费。我认为中国没有滚筒磨——华北当然没有这种磨 ... 我们不从面粉厂赚一分钱，但我们对帮助中国基督徒办企业感兴趣，他们可以通过办企业谋生，并引领他们的国家进步”。

他的学生有许多都精通铁工、机工、电工，而且不愁找不到

工作。一位临时驻扎登州的中国将军雇佣了狄考文的一个学生作铁工，很明确地要这个学生完全仿行他杰出老师的著名制造所中的西法，这位将军曾经参观过狄考文的制造所。最后一位受聘为这位将军工作的学生，是一位最熟练的电气技师，也是这位将军最后雇佣的工头。这个人在省城开办了一个制造所，狄考文博士为这个制造所的设备及其产品广泛地进行通信联系，产品销路很好。因为在清末新政改革时期省城按新政要求设立了省级大学堂，急需这样一个制造所，这家制造所的发展前景极好。然而，很不幸，中国官员们同样意识到了发展的机遇，这个制造所主人遭到了竞争对手的妒忌。结果，官方迫使他将制造所出手了，尽管留其任该所监督，稍微减轻了他一点损失。据说狄考文博士最后一次病倒时，还深深挂念他的这位遇到麻烦的学生。在省城这家制造所的事情发生之后，狄考文通常只为穷苦人奔走帮忙，但也不拒绝帮助其他人促进总体具优势的企业发展。例如，有个富人开办的煤矿遭了水灾，他克服了大量困难为煤矿弄到了一台合适的抽水机。无论是为穷人还是为富人服务，他都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忙闲、声誉和利益，尽力做得最好。

尽管切割大圆形玻璃和在上面打孔并保证不弄碎，调整所有

部件取得最佳效果等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还是特别愿意制作电气机械。艾达说：

每当一种机械制作完成，非同寻常地长时间发出电光时，他总是喜欢在夜晚带我去制造所观看演示。我清楚记得在潍县最后一次观看演示的情景。制造所的尽头放着一台风车，他在这里停下来，向我演示了通过挂在一台旧的小汽锅上的小铁片调整风车抽动活塞的方法。然后，他领着我到了里面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的一端放着一张长桌子，桌子上安放新制作的机械，没错，很漂亮的机械。由于忘记带一些必要的销子，他提着提灯去取，把我留在一片漆黑的屋子里。我听到有声音，井里滴水的声音；怎么会有滴水的声音，我听到的滴答声是什么声音呢？在他提着提灯回来后我才明白，房间的墙上挂着许多钟表盘，这些表盘上的表针通过由一台利用电能启动的钟表带动走动。这些钟表制作好了以后，是为文理学院的学生们在课堂上用的。接下来，狄考文启动这台新机械，仔细调整机械装置，然后测量电光，孩子般高兴地嚷着：“瞧瞧，多漂亮”！

北京的丁韪良博士在 1908 年 12 月号的《教务杂志》上记述

了关于狄考文博士这样一段故事：“我曾有幸在登州狄考文款待周到的家度过一段假期。当时我发现他在自己动手制作科学仪器，努力解他在美国一份杂志上看到的一道数学难题。当我解了这道数学题之后，他显得很满意，好像这是件巩固我们友谊所需要的事情似的”。这道题是要找出钻孔的直径，这一钻孔要穿过一个球体的中心，将球体的一半刚好切掉。尽管他从不允许自己身陷制作所事务而中断在他看来更高级的工作，但显而易见，对他这种人来说，工作以及制作仪器、调试机械必定要不断出现的科学和实践问题，还是会引起他极大兴趣的。在谈到最后几年的情形时，艾达说：“为了用中文表述一种用古希腊语表述不太清楚的思想，他皱着脑门冥思苦想，想不出解决办法，厌烦了就走出去。一小时以后，他笑呵呵地从制造所回来，两只手脏脏的，身上穿的中国长袍上有个新的污点，面颊红润，两眼放光。洗完手之后，立刻再次投入校对工作。”

只要有可能，他也喜爱同别人分享欢乐。在中国宗教会议上，他展示他制作的仪器，受到了人们极高赞赏。他也在潍县中学、烟台教士学校（the school for the children missionaries）演示他制作的仪器。美国独立百周年纪念日是个特别的日子，他不仅施放

普通有烟火药，而且施放大量化学爆炸物予以庆祝。在登州的早期，家里餐桌上方旋转着一把电动苍蝇掸子，玻璃罩内一个小型气动喷泉不停地喷着水，这都是他自己制作的，对家庭和客人来说，为房间和用餐平添了愉悦气氛。艾达写道：

不过，我们大多数人将最长久记住的事情，还是在潍县文理学院实物演示讲解的一堂电学课，以及后来为外国人做的电学演示。我们坐在学院一间遮蔽得很黑的屋子里，注视着长串的火花，弯弯曲曲五颜六色的光圈，一位半身照亮的高个子，长着白胡子，穿一身黑色长袍，看上去就像巫术——现在已经是很健康的艺术中的一位老魔法师，唤起了在场的人们的兴致。接下来，迷惑尚未解除，比手相术士更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他用爱克斯光展示了我们每个人双手的骨骼。几个星期以后，我们住处的一位妇女举办了一次晚会，在场的每个人都被亮光从某个角度照着，我们要猜出每个人的名字。有个节目是这样的：一个下巴上粘着棉花胡子的黑衣人上场了，他领来一位年轻人，年轻人在椅子上坐下。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开始用蒙着黑布的体视镜检查这位年轻人的头，想必是台荧光检查器，在这同时，附近一个锡盒里的闹钟发出噼噼啪啪的静电声。他仔细地进行检查，摇头晃脑，然后宣布

他的检查结果说：“空的”。在动人的解说现场，狄考文博士用介于演示和娱乐之间的方式，让在场的年轻人自己去学习考查。

第十三章 官话和合本圣经修订

“投身于官话和合本圣经修订工作...虽然耗去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却很可能是我一生中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

摘自 1896 年 6 月 13 日写给布朗秘书的信

在叙述狄考文博士一生非常成功的这一事业之前，我必须首先介绍一下 1877 年 5 月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在大会召开前两年时间里，他是这次大会筹备委员会成员，为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在这次大会上，他宣读了一篇论文，精心

探讨了“新教差会与教育的关系”。这次会议被公认为是一次很成功的会议，1890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大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圣经中译本修订工作进入了实施阶段。

关于中国语言，读者不是很了解，有必要在这里做一简单交代。从非常宽泛笼统的意义上看，可以说中国本部通行一种语言，但这种通行语言又有重大不同。首先，必须清楚中国语言采取的两种主要形式——文言或称文理，白话（口语）或称官话。文言是从孔子和孟子时代沿传至今的一种语言，相对来说，与这两位圣人的著作里所用的语言一致。这种语言是所有书面语言的范本，因此，中国学生需要花较大部分时间背诵那些古代经典，以便他们不仅能够接受教育，更重要的是能够用这种文体写作。文言中文扭捏作势、高度浓缩，堪比发报用语，虽然是同样的字，但在写作和口语中，却是意思与发音均不相同，以至于没读过书的人听到后不明其意。另一种主要形式白话（口语）或官话，可以说用法与英语差不多。规范的英语在所有讲英语的国家都非常一致，尽管也有些地方方言，但在任何地方都容易明白。一般地说，中国语言中的白话（口语）在中华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就像规范英语在讲英语国家的情况一样。从扬子江流域到满洲，尽管发音很不

一样，但写下来的白话（口语）人们都是明白的。换言之，白话或许可以说是中国三亿人讲的一种语言。扬子江下游的上海和扬子江以南的内地，则是例外，在那些地方，有很多种语言，大部分除了他们本地人以外都很难懂。

中国有个惯例，官员不能在本省为官，当然，为官者必须熟悉通用语言。或许由于这个原因，这种通用语言被称之为官话。但是，直到传教士印行出版物的时候，才使用这种通用语言，也就是说才使用了官话。中国所有的书籍、商业和政府文件、国家报纸——京报¹以及所有信函都使用较高级的形式，或者称之为文理形式，唯一的例外是有些小说，甚至这些小说也夹杂了文理（文言）。然而，这种文理也是有区别的，其最难的一种语句高度精炼、充斥隐喻而生涩难明，只有受过训练的学者才能看明白，而经过修正的文理则很容易读懂，再对某些成分稍作改变，就几乎与官话一样了。

在 19 世纪，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召开之前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有过很多圣经译本，其中有些是全本，有些是部分译本，或多或少都流传使用了。鉴于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劳作，这些先驱者们的工作值得永远尊重。参加第二次传教士大会的传教士没有人不对

¹ 指兴起于汉代沿传至清代雍正朝以前的邸报、邸抄，雍正朝以后改称京报。

先驱者们表示尊敬，或者说是没有人蔑视那些早期译本。但是，参加大会的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同工又普遍对那些早期译本感到不满意，他们认为有义务解决这一问题，采取措施搞出更好的译本。在大会召开之前，有些个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磋商，因为未受邀请，狄考文没有参与这次磋商。第二天他们又凑到一起进行磋商，由于对修订圣经译本十分感兴趣，虽未受邀请，但狄考文赶去参加了这一次磋商会。大家的意见很明确，总体上都认为要对已有圣经译本进行修订，但同时也都坦率地表明了个人意见，说明在有些问题上还存在一些明显的分歧。这里我们引述他在1890年5月26日写给美国圣经会的一位代表的信，用来说明后来进行这一伟大事业所要采取的措施：

散会往回走时，脑子里反复考虑现在面临的难题，突然想到要有一个执行委员会来完成这项工作。回到房间后，没同任何人商量，几分钟时间就起草了一份计划，后来这份计划没经过什么重要修改就被采纳了。似乎各方都赞同这一计划。传教士大会的第二天，任命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一个是文理（文言）圣经修订委员会。我既是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成员，也是文理（文言）圣经修订委员会成员。每个委员会都开

了几次会议，对所有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自由而充分的讨论。很明显，大家希望修订浅文理文言译本，这种已有译本修订起来困难较少，因此首先决定修订浅文理译本。官话译本的修订问题，还存在较大困难。

不过，最终大家还是统一了认识，认为经典文言译本困难最大，但这种译本的基础很好；传教士大会一致同意关于修订三种圣经译本的报告。在上面引述的同一封信里，他说：“我为这一结果做了艰苦的工作，看到大会完全一致同意采纳我起草的计划，感到非常满意。我从未做过比起草和实施这样一个计划更难做的工作。”

每一种新译本的译者由各个委员会来挑选，狄考文博士被任命负责官话译本，并担任官话译本委员会的主席。他听说自己被选为修订圣经译本人员，但在这之前他还没有决定自己如果被选中的话准备承担什么任务。这里我们最好还是用他的一封信来说明这种情况。1890年12月13日，他在给倪维斯的信中写道：

真实地说来，在参加这次传教士会之前，我做梦也没想到现在这样的结果。在大会召开前，从没有想到我会在圣经翻译中

承当什么重要角色。我认为教育才是我应该冲在前面的唯一领域。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过像这次一样有如神助的事情发生。我被选为官话圣经翻译执行委员会主席和译员。最初几个月，我们通信讨论我们这些人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最近，我们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是推举出了 5 位人选，...我是唯一获得全票的。现在，我们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推选其他人选，以便成立由 7 人组成的译员组.....我的《官话类编》一书无疑对我有帮助，这部书所使用的编撰方法也适合我做现在的工作。我个人不喜爱做翻译工作，本欲婉拒这份差事，但鉴于目前的情势，现在我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胜任，尤其是在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方面，我真是很不情愿放弃教育和手头上的著述工作，这些书大部分完成了一半。但是，如果要搞官话圣经译本，必须有人去做。此外，做这项工作的人必须得到来华传教士的信任，否则将归于失败。如上所述，情势已经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修订委员们和其他人都强烈坚持，这使我感到我不能轻易地拒绝。

1891 年 11 月，圣经修订委员们在上海开会。狄考文博士在翌年一月写的一封信中说：

根据传教士大会决定的中文圣经修订工作的修订人员完全定下来了，并得到了三大圣经会¹的批准。推进选定修订人员工作的责任一直由我来承担，现在成功完成了，我感到轻松了很多。我不愿意承担官话圣经译本修订任务，但我又是其中一分子；我不喜欢做这一工作，因为这将干扰我的已有计划安排。三个版本²的修订委员会都开了会，会议开得非常和谐，都很成功。一项伟大的工作摆在我们面前，我相信，托神庇佑，我们能够完成。

修订人员确定与传教士大会相隔了约一年半时间，这并不奇怪，因为推选和确定翻译人选是很困难的。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最初由白汉理（Henry Blodgett）、文书田（George Owen）、富善（Chauncey Goodrich）、海格思（J. R. Hykes）、布莱姆菲特（Thomas Bramffit）、倪维思（J. L. Nevius）、狄考文（C. W. Mateer）组成。在后来修订过程中，由于有人去世，有人调离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成员更换了很多，只有富善博士和狄考文博士从开始到圣经新约部分初次修订完成一直都在。1900年加入修订委员会的中国内地会的鲍康宁（Baller）先生，参与的时间仅次于富善博士和狄考文

¹ 指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圣经会（大美圣经会）、苏格兰圣经会和英国圣经公会（大英圣经公会）。

² 指文理即文言圣经、浅文理圣经和官话圣经三种版本。官话圣经即今天仍广为流传的官话和合本圣经。

博士。狄考文博士在修订圣经工作中有两位中国基督徒助手，他们做了大量宝贵的贡献，理应在此做一介绍。富善博士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谈到他们的贡献时说：

在通用官话圣经修订工作中，狄考文博士有两位特别好的老师。首先是邹立文，一位按立牧师，离开了自己的教区投身于圣经修订工作。邹先生是登州文会馆狄考文博士的学生，接受过倪维思博士、狄考文博士以及其他人的神学理论训练。他是一位具有美丽灵魂、善辨头脑和良好语感的人。他也是一位具有顽强毅力的人。在一天紧张工作了 8 小时或更多时间以后，他常常自己艰苦工作到深夜，查找一些词组，查找表述更确切的词语或更好的原始意义。在修订工作定稿之前，他和我已故的老师（张希信——Chang His Hsin）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在本该睡眠的时间花数小时进行细心的检查。邹立文先生离开家庭很长时间以来就这样一直地工作着，他象任何一位圣经修订委员会的委员一样，心甘情愿地从事这一工作。

可悲可叹啊，邹先生在令人疲惫的劳作中过快地燃烧了自己的生命，我多么想见到他的冠冕、他那充满阳光的面庞啊！

令人庆幸的是，狄考文博士在这项工作中还有另一位学者帮

忙，这就是王元德先生，也是文会馆学生出身。王元德先生具有敏锐、深邃、逻辑的头脑，读过所有最好的官话语体著作。他能很快找出句子结构中的缺点，并坚持不懈地予以纠正。他至真至诚地从事翻译工作，数次拒绝领取发给他的薪水。我想他所以能够如此，既有受狄考文博士人格强烈影响的因素，也有他自己对这一工作热爱的成分。当烈火战车来到时，狄考文博士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两位主要参加了新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像狄考文博士一样，在官话圣经全部译毕告成之前，他们所做的工作会一直影响着人们。

狄考文博士在他的《官话类编》前言中，曾对邹立文和狄邦就烈在编撰这部书的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1891年会议组建了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以后，修订委员们即对新约圣经进行了分工，各自分头开始工作，并制定了工作程序。第一步是每一位委员仔细修订或翻译他本人承担的那一部分，然后把修订或翻译好的稿子寄给其他各位委员，由其他各位委员过目，写出修正建议，每一条修正建议都要给出相应的改正文本。第二步，初译者拿到这些修正建议和相应的改正文本后，参考这

一意见，再修订成稿后寄交修订委员会。概要地说，尽管不得不做出或凭经验启发做出一些调整，但这一程序贯穿了整个官话圣经修订的全过程。人们希望进度能相对快一些，但现实中修订委员会直到 1898 年 9 月才得以开第二次会议，而且这时也仅只“使徒行传”到了提交委员会定稿的地步。造成这种进度迟滞的原因很多，诸如倪维思博士去世、其他一些人退出、狄考文博士回国休假等等，不过，主要原因还是修订委员会各位委员都承担着其他繁重的工作，只能利用零散时间来从事圣经修订。以狄考文为例，其他著述和传教事务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1898 年在通州召开的修订委员会会议，他被推举为会议主席。这是一份荣誉，但也是一份特殊责任，给他增加了实实在在的负担。修订委员会只有五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而这些人又都在忙各人的那一份任务，在为期两个半月的会议期间，他们完成了使徒行传的定稿，然后就又分头行动了。

在修订委员会通州会议期间，不仅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翻译圣经特别书籍实际上就是圣诗这样的难题，而且其他早就或多或少看到的共性问题也显现出来。新版官话圣经应该以现有的一种或多种译本为基础进行修订，还是仅仅借鉴现有译本回到希腊原

文重新翻译？无论如何，经常查阅原文还是必要的。准此，又应以哪种版本为标准？这次会议对应使用的官话风格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关于这一问题，1900年狄考文博士在《教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充分、强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为达目的，官话圣经应该是当一个人大声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能轻易地明白其意。文理（文言）和官话（白话）之间的基本区别是前者对着眼睛说话，而后者是对着耳朵说话。在所有新教教会中，诵读经文自始就是公共礼拜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使诵读达到预期目的，经文必须翻译得令普通人明白易懂。只有这样他们才听得懂，当他们听懂了，上帝才会“欢喜”。仅仅是那些识字的人能够明白地读懂是不够的，要使那些不识字的人——事实上这些人在中国人民中占大多数，一听到诵读经文就能明白什么意思才行。这才是官话圣经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样的圣经才是中国语言口语化的圣经，才是对着耳朵讲而不是对着眼睛讲的圣经。

他把官话圣经语言风格的主要特点概括为：用讲官话的普通民众能够明白的词；语句与典型的口语一致；与上述两点有关，无论用词造句、连接成分以及表述明显的思想活动等，都力求简

洁明了，就像中国人熟悉的人物传记语言那样明白，但不能用不庄重的语言和土话。他概括出的这些官话圣经的特点，作为一种理想，三个本版本的任何一个版本的翻译都不可能完全做到，但有了明确目标，必定会朝这一方向努力。官话圣经修订工作接近完成时，还有个普遍性的问题有待解决。修订委员会的委员们面前自始至终都放着浅文理圣经译稿，有时他们也翻看深文理圣经译稿。这三种版本应该协调一致，消除所有偏差吗？当然，这只是一理想。关于这一问题，由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主席起草的报告，提出了否定意见，该报告说：

三种版本中现有的差异不是很大，它们将交由中国学者审核批评。圣经翻译问题多多，没有一种翻译版本可以一劳永逸。此外，用官话圣经的人，百分之九十九不看任何其他译本圣经。消除文理和官话两种版本圣经中的差异，使之完全一致起来，似乎可能形成一部优秀作品，但却是难以实现的。试图调和现在不同版本圣经中的差异，将引发许多难题。官话语句表述，尤其易受干扰。单字的变化，常常会打乱整个句子，从而必须再对上下文做出调整。

自上海首次会议确定了人选并分配了具体任务之后，直至1906年，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的译员们才完成了**暂定稿**的修订工作。15年间，他们共开了8次会议，在准备好实际开始工作之前，几乎每年一次会议；每次会议时间都不少于两个半月，其中有一次会议开了6个月。这些会议一次在靠近北京的通州，一次在上海，大部分通常都在烟台开。最后一份报告记录说：“(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主席本人可以说7年来每天都在为这项工作操劳。他参加了从头至尾举行的每一次会议，只缺席了一天。”每次会议都还不时召开一些有特色的社团组织会议。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从1900年12月开始，直至1901年，跨年度开了数月之久。在那段时间里，由于义和拳起事，起事各省的传教士们都作为难民在上海避难。这次会议会址在联合教会楼上一间小屋子里，人们后来称之为“耶路撒冷小屋”，来参观的人很多。参观者们看到每两张黄面孔中间夹着一位白面孔，白面孔作为修订委员会的译员，通常在这项工作中都有自己的中国助手坐在身边。讨论通常使用官话，以便这些助手们知道在讨论什么，并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人们偶尔也注意到，除了自己的修订工作以外，狄考文博士在这期间经常同避难的传教士们讨论一些实际问题，他为此感到很高

兴。



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工作图，修订委员从左至右：美国美以美会的鹿依士(S. Lewis)博士、美国公理会的富善(C. Goodrich)博士、美国北长老会的狄考文博士、中国内地会的鲍康宁(F.W. Baller)先生。最右边一位和每两位委员中间的是中国译经助手。

狄考文夫妇从美国休假回来之后，圣经修订委员会会议在烟台举行，起初在**中国内地会疗养院**的一间屋子里，后来又转到了可鸟瞰烟台海湾的**传教士之家**楼上一间大房间。他们的会议通常初期上午集体三个小时，这一阶段的其他时间则是个人用来研究个人要研究的东西；但随着会议的进行，他们又会增加下午三个小时集体会议，其余零散时间用于个人随便凑在一起交换对有些

问题的看法。这种旷日持久的辛劳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乏味和令人生厌的。不过，参加会议的所有人没有比狄考文更觉腻烦的了。他对官话的了解就像母语一样，但为了使官话经文不但在他熟悉的地区的人明白，而且要使其他地区的人也明白，就不得不对他所精通的官话不断地修正，调整表述方式。在编撰他的《官话类编》和教学用书过程中，他只是尽最大能力确定如何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这里必须做到最好，然后再把他搞出的东西交给其他人去评判，而结果又经常是做了某些修改，并且是他不喜欢的修改。然而，当从家里来到会议上时，他会说：“我不应该抱怨，我常常比别人多耽误大家时间。要抱怨，就只能抱怨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每次会议以后，都要把定下来的前一年的稿子印刷出来，标上“暂定稿”字样，分发给华北和满洲的传教士请他们批评。所有批评意见都要经过仔细讨论审定，然后再行付印，呈交百年大会¹，向大会汇报。

新约圣经修订暂定稿的最后一次会议开了5个多月，这次修订工作比以往更加充满活力。这时离中国百年传教大会召开只有一年时间了。大会之后，修订本圣经要接受更广泛的批评，再对

¹ 指1907年为纪念马礼逊来华传教100周年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大会。早在1890年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曾决定十年后再开一次同样的会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推迟，后即决定索性于1907年马礼逊来华100周年之际举行，故称“百年大会”。

集中起来的批评意见认真仔细讨论审定，定稿付梓就是最终永久性的文本了。关于最后一次修订会议，狄考文夫人¹有如下一段生动描述：

已经为富善家买好了北上的船票。行李都拿下来了，一家人手里都拿着帽子在楼上阳台上等着，富善博士的帽子也准备好了，等他从会场一出来就给他。黄包车夫们正在准备着上路。但在这个时候，一点脚步声都听不到！最后，离开船时间很紧了，再不出发就晚了，富善夫人说：“我必须把他们叫来。”于是，她鼓起勇气向会议大厅走去，在会议大厅门口听了一分钟，手指放在嘴唇上回来了。“那些亲爱的人正在祈祷”，她悄声说道。我们在心里默默地加入了祈祷的行列，眼里充满了泪水。当然了，每天上午开会前都要先祈祷，但这次是这么多年的辛劳成果的最后汇集，功德圆满，在祭坛上奉献。

虽然那次会议完成了修订工作，但这个暂定版在百年大会上有可能通过，也有可能通不过，还有大量很枯燥的事情有待狄考文去完成。这个版本的扫尾工作并不轻松，而标点则是需要他花

¹ 狄考文继室夫人艾达。

费时间最长也最感乏味的一件事。为解决标点问题，他创制了一套在他看来最适合中文的新体系，这一新体系只有一位中国语言学者能给予公正的估价。作为修订委员会主席，他还要认真考虑收集到的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大多数都是有益的，颇受欢迎，但也有一些令他很伤心。最后，1907年春，在上海召开的百年大会会议上，圣经修订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关于这次大会，他写信给美国国内的一位朋友说：“我们在上海开了一次盛大的传教士大会，当然，我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较上一次一致意见更多了，而讨论问题少了。”圣经修订委员会的报告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认同，修订稿已经开始由所有有关方面进行审核，准备最后定稿，拟于1910年在上海出版。这一个版本的圣经所以称之为修订本，目的是不让人觉得这是要否定老版本，而只是在老版本基础上做了改进。不过，虽然这个版本吸收了其他先驱工作的优点，但事实上几乎是重新翻译的。这次大会结束后，狄考文博士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坦率地说：

请注意，我们还有机会进行最后修订，这一次将消除其中的许多缺陷。现有修订稿有不少地方我本人也不满意，其中许多我认为可以改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字表述过于注重字面意义，

一些外国习语损害了官话风格。另外必须注意的是有些用词和表述似乎生涩，或许按最初的想法不作进一步阐释，似乎就对了，甚至会受到赞赏。每份译稿几乎没有时间达到完美效果了。我相信我们的修订本将非常受中国教会广大会众的欢迎。

在长年累月从事这一伟大事业过程中，他学到了一些关于圣经翻译的有价值的东西。他说这是一门艺术，需要特殊训练和经历才行。在他去世那年的 11 月号的《教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详细讨论了“官话圣经翻译中学到的东西”。他指出官话圣经翻译与文理（文言）圣经及任何其他文体圣经的翻译一样，都存在着很多困难。只有精通互译的两种语言，才能了解这些困难。此外，他也指出了在圣经翻译成任何一种形式的中国语言时所存在其他的问题。中国人的头脑里从来没有圣经中关于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思想，因而在中文中找不到适合表达这些思想的词和词组。就像西方科学进入中国必须发明表达它们的用语一样，圣经翻译人员也必须在这一领域引进适合翻译用的词汇。他认为在当代中国，人们已远离偏见，能够有效、明智地引进一些适用于圣经翻译的词汇。事实上，中国人接触到的每一种现代思想，都随之产生了一些新词语，最近已经创造出数百个新词语，并且为一些领

袖人物津津乐道。缺乏大量新词汇增加了圣经翻译的难度。在其他书籍的翻译中，把主要意思表达出来就行了，因而翻译过程中有相当大的自由。但是，由圣经的性质所决定，翻译圣经首先要做到表述准确。此外，中国基督徒似乎尤其重视准确性。翻译者翻译圣经的语言表达习惯，容易受中国人语言喜好的影响，写出或是文雅如中国文人习惯的语言风格，或者是低俗如没读过书的人说话的水平。另一项缺陷是扩大或减损译经人所在地区语言表述的特殊性。狄考文博士认为他了解老版中文圣经中这些明显的特性，尽管最近几个版本中这些倾向有所减弱。他的这篇文章总结说：

翻译人员不必改写圣经。中国教会有权持有在信仰和翻译方面都原汁原味的圣经。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翻译圣经的要求。他们不想知道翻译者们说什么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这样的话，而是想知道他们实际上译得怎么样。一些学过英语的中国人现在正在把外国书籍翻译成他们自己语言，就说明了他们的态度。英文圣经，尤其是钦定英译本修订本 (Revised Version) 是细心准确翻译的标本，现在人们翻译成中文不可能比那个本子更细心准确。我多次听到中国学生们在阅读圣经注释或听不同章节圣经课的时候，

表示了他们的惊讶和不满，他们觉得圣经翻译得不够准确。我认识一些中国布道师，当他们引用一段有旁注说原文是如何如何的时候，就很有意见，说“如果原文是这样的，为什么不这样译出来，而译成那个样子？”在我们修订委员会，有一次当有人提出关于对一条隐喻做出直接说明或解释以供比较的问题时，我们的一位文学助手用力强调说：“你以为我们中国人不明白、不能够欣赏隐喻吗？我们的书里比比皆是，新的隐喻也是受欢迎的。”如果我们不能给中国人原汁原味的圣经，他们会谴责我们，而且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自己来翻译圣经。

总之，值得说明的是，没有人可以对圣经做出令人满意的翻译。每一个人对真理和语言的了解都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想象力都在某个方面有所偏差。这是我们以往每天一直都在学习而且将来要继续学习的东西。如果有人希望发现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局限，那就请参加翻译委员会。

关于官话圣经修订过程中的困难，富善博士有如下的个人感受：

在中国，自马礼逊首次翻译圣经以来，还一直没有从事过如

此特别困难的著述工作。要使圣经语言贴近原意，措辞朴实无华，简单明了，以致普通人在教堂里或家里听到诵读就明白。这项工作由一个从各地挑选出来的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完成。委员会的成员住在各地，相距极远，东北至北京，西南至剑州（Kneichou），这些人或许可以说都是一些很厉害的人物。委员会最初数年间的共同工作几乎是令人失望的。他们之间相互沟通了解、要在翻译上达成一致的努力，旷日持久，令人啼笑皆非。

但是，他们要为中国做威克里夫（Wyclif）为英国所做的和路德（Luther）为德国人所做的事情，把圣经翻译成通行全国的国语。他们鼓足勇气，奋力前行，虽然步履维艰，但却实实在在地一步步接近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到达了眼前追寻的目标，而且完全交给了中国人民一种文体风格，这种文体风格将在他们未来的著述中广泛流行。

1907年上海百年大会通过了关于新约圣经的报告，决定继续修订旧约圣经，并任命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推举人选来完成这项任务。推举出来的人选就是即将完成新约修订的这五个人，只是由于其中有一人回国了，换了一名新人。狄考文博士特别期望他们不要换人，以免使工作停顿，重新训练新人。当然，他早已

预料到自己很可能被选中，但他接到这一消息后，知道其他人选都到位了才决定参加。他与美部会的富善博士有密切联系，多次写信，敦促其接受新的任命，其中有一封信说：“或许我和你一样，有许多理由不愿做这项工作。从金钱、声誉、或个人爱好上说，我宁肯去做其他事情。可是，后来似乎是责任要求来做这项工作。无论你我，都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经验和这么多年的磨炼已经使我们适应了从事这项工作的方式，我们可以做得比新人更好更快一些。”他再次当选为修订委员会主席，像他担任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主席一样开始投入工作，个人具体承担创世纪和诗篇的翻译和修订。他于翌年初开始着手，夏天在烟台召开修订委员会会议，商定何时完成修订任务。会议期间，富善一家和狄考文一家住进了圣经委员会开会期间通常的驻地——烟台起暗学校的一处房屋，由于狄考文夫人的健康原因，富善夫人负责料理家务。会议在中国内地会一家小教堂里召开，毗邻山谷。就在这里，狄考文染上了致命的疾病。

七十岁生日那天，他在一封“致家乡亲爱的人”的信中说：

托上帝庇佑，我实现了一生中的几个主要心愿。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渴望搞通才教育。我的另一大心愿是至少在中国工作四

十年。我到中国不久就开办了一所小学堂，并立志将其发展为一所可产生永久影响的大学。我很早就计划要成为一名中文口语专家，目的是奠定编写一部学习中文的教科书的基础，并要编写出这样一部书。上帝赐福，这些打算都变成了现实。最近十年，我最大的一项工作是从事圣经官话翻译。这是个十分艰辛的差事，尚未能完成。新约差不多已经成功，但旧约何时才能完成，谁知道呢？我的心愿和希望是要完成这一任务。搞一套公认完善的为280000000 人民诵读的圣经译本，将在中华荣耀上帝。

第十四章 传教生涯伴生事件

“传教生涯中虽有许多磨难和自我牺牲，但也有不少补偿和一些好处。”——摘自他七十岁生日“致家乡亲爱的人”的信。

上面引用的这一陈述一般是接受每一位忠诚的传教士出国传教申请时的用语，但狄考文博士却是在用这句活来表达他自己的经历。他一生的工作情况，一如前述，已经一一作了介绍。不过，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例也值得永久记录下来。说这些是“传道生涯伴生事件”，并把它们集中起来在一章里叙述，绝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其中有些关乎到他生命的深层次内涵。但是，他到中国后的主要工作，前面各章中已按先后顺序作了系统交代，现在要叙说的，虽然重要，发生在他传教生涯之中，但却不是传教工作本身。

在他所遭受的磨难中，最大莫过于丧亲之痛。这里只能以他在中国亲属中的两三例予以说明。第一次是狄考文夫人的姐姐哈丕森 (Capp) 夫人的去世。哈丕森夫人是 1882 年 2 月 17 日在登州去世的¹。她是在妹妹和妹夫的亲切照料下走完人生最后旅程

¹据连敬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哈丕森于 1871 年 (同治 10 年) 病故，哈丕森夫人 1885 年病故。参见《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 1937 年版，第 183、171 页。与这里不一致。狄乐播《中华育英才——狄邦就烈传》一书则谓“1873 年和 1874 年，由于有人去世，有人迁至别的地方工作，登州差会先后失去了哈丕森 (Capp) 先生和哈丕森 (早先的邦玛

的。狄考文博士在写给她丈夫一位兄弟的信中说：

安息日下午，也就是昨天，我们把她安葬在登州城西边的小山上，她先去了的教友也安葬在那里。中国人非常爱她，送别她的基督徒几乎没有不流泪的。梅理士夫人用英文主持了葬礼，对她做出了杰出的评价，恰如其分。我们一位本土长老用中文做了非常实在的演说。她已完成了她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她永远活在登州城及其周围地区人们的心中。我们将怀念她，噢，她有如此之多的优点，我们将怀念她的帮助、她的忠告、她的友善、她的精神力量！最怀念她的还是她教过的学堂，她的位置无人能够取代。当她确信自己要离去时，为此做好了准备，但她还是希望

吉姑娘，后来的哈丕森夫人）夫人、隋斐士（Crossette）先生和隋斐士夫人、梅理士夫人，狄考文夫人成了布道站的唯一女性”（参见：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P.48）。另据 1891 年上海美华书馆刊行的《登郡文会馆典章》英文部分“史略”目下第 10 页，记述哈丕森夫人“1868—1872 年期间与狄考文夫人一起在蒙养学堂工作”，似乎与狄乐播的说法吻合。在这几种说法中，译者更倾向于 1882 年去世一说，因为这个时间很具体，且有狄考文事后给哈丕森的兄弟的信可以说明。狄乐播所说的时间，有可能是指哈丕森夫人去负责女校了。所谓“狄考文夫人成了布道站的唯一女性”，则是他记忆有误，或因过于强调文会馆的重要性而忽略女校的存在了，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女校断断续续很不景气造成的，也可能是狄乐播受《登郡文会馆典章》有关模糊记述的影响所致。

活着，她多次说过这样活着虽不能享受生活，但可以拯救更多的灵魂。她曾反复向我们保证说她很高兴来到了中国，断言除了**基本人权**，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对她灵柩周围的中国人说要像她那样为主做事，要像她那样无论做什么事都热情、认真，尽职尽责，要像她那样不知疲倦地努力，渴望拯救灵魂。

十六年后，几乎在同一天——**1898**年2月16日，狄考文夫人完成了她在尘世的工作，进天堂休息了。我已提到过狄考文博士人生中这一令人悲哀的事件，也介绍过狄考文夫人的一些事迹。关于她的一本传记很快即将单独面世。考虑到这些因素，这里再说什么就显得多余了。不过，至少这里应该引述她丈夫在她去世不久写下的简短追思录中的一段话，由此看一下狄考文博士本人对妻子的看法。在历数她的辛劳和成就之后，他说若妻子活着的时候知道对她的如下这些评价，必定会感到无比满足：

她在到中国的第一年就积极参与创办了一所小学堂，这所小学堂最终发展为登州文会馆。她把一生的最好精力都投入到了这所学校，没有她，这所学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断取得成功。她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师，尤其是对那些小孩子来说……在这所学

校的早期阶段，她的工作远不止是教学，学堂三分之二都是她负责，事无巨细，白天晚上不停地忙活。她管理帐目、照看饮食、服装和上百种难以说明的事情。终于，她成了所有学生的知心朋友和导师，学生们无论是遇到困难、磨难，还是有什么打算、准备联姻，抑或是进行精神操练，都会找到她倾诉，找她出主意想办法。她体贴关爱每一个生病的学生，赢得了所有学生的心。她自己研习医药，技术不亚于一名医生。所有本土教会的病人，她邻居们家的病人，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都找她看病，而她从不拒绝为任何人看病。登州文会馆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心里不想着她，他们在他们心中的位置就像自己的母亲。在她生病期间，分散在华北各地的登州文会馆的学生，很可能没有一个不为她诚挚祈祷，半数举行公共祈祷，半数私下祈祷。很多学生写信给她，表示他们的极大担忧和真挚的爱。在7月她六十岁生日那天，文会馆的在校生和以往毕业的学生，以他们最令人难忘的仪式呈献给她带有装饰的丝制长外衣，并把一块大匾额放到了屋前，匾额嵌有镀金的“育英寿母”字样。当这些年轻人以这种最能表达他们对她的忠实敬重之情时，就是她一生中最感自豪的日子。

如果她回想起近三十五年前她与丈夫到登州时所面临的仇恨

和偏见，必定是恍如隔世。

我们在前面说过狄考文的弟弟约翰 1872 年担任了上海美华书馆的监督，他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工作到 1876 年回国。回国后经商多年，继而又回到中国，负责美部会（公理会）设在北京的印书局事务。1900 年 4 月，狄考文博士接到让他尽快赶到北京的电报，他的弟弟病危。然而，约翰在他赶到北京的前一天去世了。在给其余兄弟姐妹的一封信中，他通报了葬礼情况后补充说：

很显然，他在美部会印书局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评价，其他差会的同工都很尊重他，在美国公使馆亦享有很好声誉。一些在葬礼上讲话的人说约翰的一生是知难而进、全面发展和成功的一生。如果以世故的观点来看，他的一生几乎不能说是成功的，但以超世俗观点来看，则他的一生无疑是成功的一生。在这一点上，他很可能是我们家最优秀的。他头脑始终很清醒，信心十足。当疾病越来越严重时，他一点也不害怕，坦然面对死亡。愿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胜利信心，让我们以优雅神韵面对死神。我们把他葬在了城北的外国墓地，紧挨着我们差会的牧师莫里森（Morrison）先生，这里是外国公墓最漂亮的地方。

我们不能忽略狄考文博士像海外传教们在不文明的国家甚至像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可怕冒险经历，他总是从容面对这些严重危险。在他早期的巡回布道生涯中，曾数度遭受过个人或群体攻击，有时候他就带着武器以便自卫。在他到登州定居的第二年，因谈判要租赁南门附近的一所房屋，城里最有势力的几个氏族足有 1000 人聚集在一座庙里，要求地方官允许杀死要出租房屋的主人和要租赁房屋的外国人，不过这场骚乱最后平息了。1867 年夏，登州陷入一片惊恐之中，说是有一支“起义军”要来了。事实上，这支所谓“起义军”只不过是太平军失败后的余孽，他们到处放火，残忍地屠杀乡民，把大片乡村变成了废墟。经常有传言说这帮人要到登州，但谁也说不清来的是些什么人。但是，他们终于还是来了，来到了登州附近的乡村。四周乡村成千上万的居民都涌到了城里，他们都牵着驴，赶着牛，带着容易迁移的所有东西，所以登州城里不仅是房屋，就是街道和空地都挤满了人，传教士住的地方也不例外。狄考文夫人发现这是向中国妇女传布福音的好机会，她的丈夫也忙着帮她布道，尽管因中国助手不在而障碍重重。在这次大恐慌早期，一艘英国战船应邀前来帮助传教士们撤到安全地区，稍后美国海军“怀俄明号”停靠登州湾，如果必要的

话，它可以从那里以炮火保护美国公民。庆幸的是，五天以后，这群叛军又撤离了，但他们留下了瘟疫和一片凄凉的乡村。在这次骚乱中，尽管没有人说为什么，但传教士们似乎没受到任何伤害。

1870年，天津发生了屠杀大批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和其他传教士的残忍事件，大量最有价值的教会财产被毁。这一消息迅即传遍华北大地，到处燃烧着当地人反对外国人的仇恨，形势急剧恶化，很多地方都陷入了危险之中。登州常有计划赶走传教士的流言，一些本土基督徒和其他与传教士有友好交往的人带来的消息，证实了这些流言不是空穴来风。登州南浸信会和北长老会布道站的所有成员召开了会议，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几乎所有人都投票同意撤离登州，到烟台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避一避，等这场危险过去再回来。狄考文博士在这些会议上倡议不要急着撤离，应进一步调查一下再作打算，但当他发现只有自己持这一意见后，服从了大家的决断。他们尽快送信给烟台，要求派一艘船来把传教士们的家都搬到那里。烟台方面立即做出了回应，派来了两艘船。所有能尽快打包的值钱东西和易搬动物品都装了船，登州的房产交给了像可以从他们那里租到房子那样可信赖的人保管，登州知

府允诺他会经常照看这些房产。狄考文博士没有坐船走，而是与一位浸信会的传教士多留了一天，安排需要保管的房屋和财产事宜，然后骑马去了烟台。烟台迅即派船到登州来接走了传教士，似乎使人们感到非常安全了，激昂的情绪很快就平静下来，大家普遍期望回到登州，甚至非基督徒中国人都期望他们回来。北京的美国公使也对他们以及他们的美国同工这次异常避难经历给他们事业带来的重要利益感到满意。他建议他们回到登州，并设法破例用一艘美国战船送他们回去。在烟台呆了一个月后，狄考文博士又踏上了早经预计的返回之路，登州人所表现出的友好态度令他感到惊喜。其他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也适时跟着返回了登州。然而，在稍后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上，他不得不接受了到上海去负责美华书馆的任务，为时一年半。即使到了今天，到底是什么危险、多么紧急的情势使传教士们逃离登州，或许还是一个无人能说清楚的秘密，当然，这些传教士们也从未查知。关于不情愿地顺从除自己以外所有人投票表决的决定，赞成离开登州一事，刚从烟台返回，他就在日记中写道：

不过，顺从别人的意见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考验之一。那一夜直到天明，我心潮起伏，一点睡意都没有。我不知道我是多么

爱登州，或许我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危险性，我们的离开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尤其是为了我们的学堂而离开。然而，我不能肯定我做的到底对不对。这个问题留待将来去搞清楚吧。我相信上帝将赐福我们和中国基督徒。撇开那时大量的实际危险是否存在这一问题，除非是不走就必死无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十分厌恶一走了事这种做法……无论如何，我还是确信，尽管我不愿意轻率发誓，但我想我不会再次逃离登州，除非是有大量更紧迫的危险。

1894-1895年间，日本和中国之间战事激烈，登州作为一个海港，离日本并不远，自然有可能卷入战争的漩涡。传教士们选择坚守岗位，要求美国驻烟台领事代办把他们的所在地、人数、职业、国籍通报给适当的日本指挥官，告知日本指挥官一旦登州遭到攻击，他们将在差会驻地悬挂美国国旗，假如中国人发现自己不能保卫这座城市，他们将尽力说服其放弃抵抗，以免人员伤亡。日本人到登州来了，作为夺取威海卫的佯攻手段，连续三天对登州进行炮击。关于这件事，狄考文博士在他的自传手稿中说，为了文会馆的学生，“我从我房子的瞭望台上注视着炮击情形，虽然我房屋周围落下了八颗炮弹，但并没伤着我，有颗炮弹在我头顶掠过，离得很近，以至炮弹带过的风就迫使我忙作躲避。”

1899-1900年义和拳起事期间，虽然这场运动兴起于山东，但该省的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却没有遭受毗邻省份那么多的灾难。这是因为1899年卜克斯(Brooks)被杀后，在英国传教士和外务部的要求下，撤换了排外的巡抚毓贤。不幸的是他并没有被免职，而仅仅是调任了山西巡抚，从而导致了山西对传教士的大屠杀。著名的袁世凯调任山东巡抚以来，尽最大努力控制本省的义和拳，并基本上取得了成功。烟台领事福勒(Fowler)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将传教士从内地转移出来，也有助于挽救传教士的性命。不过，山东西部地区的情况还是很糟。很多地方的本土基督徒遭到了抢劫、殴打，有的地方则以死亡威逼他们放弃信仰。潍县布道站遭破坏的情况，据一位九死一生逃出来的传教士鼓足勇气讲述说，就像那一时期任何地方都广为流行的焚毁和屠戮情形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山东东部地区，像登州和烟台这些地方，除了不祥的激动情绪之外，并未发生什么严重的骚乱。这其中的原因，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他们离海很近，清楚海上有外国战舰，舰上的军队能够迅速登岸。

在北京被外国军队围攻前夕，狄考文博士为安葬他的兄弟到了那里。1900年初，他一直留在登州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工作，

像往常一样发函为文会馆和个人订购所需物品。是年7月，美国领事安排山东所有传教士乘一艘炮船撤至烟台。不过，狄考文博士与卫礼大 (Mason Wells) 夫人又逗留了一阵子。那时正值文会馆放假，狄考文博士在忙着搞官话圣经翻译。当时那里的中国人中有个不着边际的谣传，说他得到了一笔钱，正在领着一支数千人的军队解救北京，但事实上是他未婚妻被困在那儿，结果闹出了这样的传言。稍后他到了上海，主持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会议事宜约六个月。直到1901年6月才回到了登州，这是义和拳起事已经结束了。

1900年下半年，他发表在《长老捷报》上的一篇通讯中，以相当长的篇幅阐述了他关于义和拳爆发原因的观点。这些观点与美国国内人们所持的观点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他坦率地承认了外国传教机构的传教活动是引起邪恶之人怨恨的根本原因，而罗马天主教坚持在他们的信徒与中国法律的实施之间所采取的习惯做法，则又极大加剧了这种怨恨。但他否认这是主要原因。他坚持认为义和拳运动爆发的原因主要是传统的对外国人的憎恶，是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是外国人对海外华人和在中国通商口岸对中国人的欺凌。最后，但却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最不重要

的，那就是德国人为了报复中国人杀害了他们一些传教士而在山东采取的行动——占领胶州湾，勘探和修建横贯山东的铁路。俄国人蛮横地侵入满洲，在那里建造铁路，并派俄国军队把守，无疑是火上浇油。最后他总结说：“整个运动是排外的，反对所有外国及其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反对各国公使、领事、商人、传教士、教士和工程师，排斥铁路、电报、教会、学校和基督信徒，一言以蔽之，反对一切与可恨的外国人有关的事物。这是充斥着保守主义的旧中国，为压制正在取代她的新中国而奋力进行的绝望挣扎。

另一类深深触及他心灵的考验是他所看到的受灾民众。1876、1877、1878 年间，登州地区普遍大萧条，结果造成食品价格大涨，穷人难以糊口。狄考文博士和其他传教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灾民，成了乐善好施的救济人员，他们寄信向西方国家求得资金，购买食品分发给饥民。可是，1889 年这一年，他亲眼目睹了以前在中国从未遇到过的穷困局面。黄河改道是造成这一可怕灾难的原因。黄河在 19 世纪约三十年间两次改道，新河道过于狭窄，暴雨或连雨天便河水泛滥，洪水一再大面积肆虐，有时水深数英尺，房屋土墙倒塌，耕地被毁。山东的西北部地区，则连续干旱，

粮食颗粒无收，蔬菜也没办法种植。终于，巨大的灾难降临了，传教士及其他人士认识到了这场灾难的可怕，波及面积广，于是组建了山东赈灾委员会，吁请英国、美国和中国南方各地施以援手。最终他们筹集到了 20 万美元，这笔钱由狄考文博士负责带往灾区救济灾民。传教士与其他人对救济区域作了划分，在可信赖的助手帮助下，进行了仔细的调查。他们确定有数万人离家出去讨饭，或者到至少是没有粮食也可以生存的地方。没人能搞清楚到底多少人饿死在逃荒路上或家里。调查发现大多数人靠吃糠、草种、草根，杂草、树皮、麦叶等维持生命。有些曾经挺富裕的人家，都自己准备了毒药，以便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要一点一点地饿死的时候自己结束生命，免得看到孩子们饿死的悲惨情景。一般情况下，救济资金每人每天只能均摊一分钱，这样至少可以挽救十万人的生命。我们看到了几张变了颜色的中国纸张，上面有狄考文博士的手迹，留下了部分他在山东西北部调查的经历。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这里再追忆那些可怕事情的细节可能不合适了。这些记录有关于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孩子渴望舔起从分给他们的一小块粗面包上掉下来的针尖大小的面包渣；有关于男女跪倒为他们的家庭乞求食物的情景。看到这样的赈灾场景，

狄考文泪流满面。那几张纸上记述了为了弄点吃的而卖妻鬻女的情况，以及不曾掩埋的尸体和刚饿死的人的新坟等等情景。他在1889年4月9日的日记中说：“这是我一生中做的最难做的工作。一整天看到的都是快要饿死的人，围着哀求登记上他们的名字，怎么也登记不完，神经快崩溃了。”5月17日，他又在日记里记述说：“51天了，我终于要到济南去了。我们已经登记了33000人，这个地方的登记工作已经完成。”这次赈灾对宗教有什么影响？基督教给这里大多数人，包括没接受救济的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位赈灾工作的主要中国助手在写给为这次赈灾提供帮助的人说：“这必定是好宗教。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其他宗教信仰徒不来赈灾？”这一地区的人因此愿意了解基督教，他们越了解就越信奉，最后终于皈依基督。最终，数百人加入了教会。

他与他在中国的传教同工的论战对他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他无意成为“斗士”，但有些事情牵涉到他与他在中国的兄弟们共同从事的传教事业，出现了一些实际而又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其中有些他坚信自己与其他明智而有能力的一些人不一致。要解决这些不一致的问题，他认为只有进行公开而高尚的“战斗”，只有这样才不会妨害传教事业，才不至于陷入个人之间的争吵。狄考文博

士就能力和效率而言，在那些把一生献给中国福音事业的人中名列前茅。对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他的责任，以论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人们都能理解。如果说他在这一问题上有什么缺点，或许是过于坚信自己的观点，一直不能总是看到支持反对他的观点的整体力量。那些非常了解他、赞赏他广阔心胸和亲切情感的人，也就不再在他有时候似乎有问题的话里挑刺了。不过，或许也有一些不太了解他的人，有时候就在他辛辣的语言面前退缩了。每一个参与过这些争辩的人，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他是一个诚挚、有才华的人，认识到了他是一个在努力履行他所认定的职责的人。

到目前为止，争辩时间最久的问题当属应该用什么中文词来表述上帝 (God) 这一观念的问题。他在 1865 年 11 月 4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本周在梅理士先生那里拿到了一张便条，上面说北京有种建议非常流行，其依据是《北京官话新约全书》(Union New Testament in Mandarin)，这本书里称上帝为天主，称圣灵为圣神，除了某某先生外，大家都签名表示同意。我根本不可能签名表示同意，凭良心说我不能使用这些词。”这就是他在伴随他一生的战斗中放的第一炮。正如我们在一部论战集中所见到的，他在这场

争论中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 1907 年出版的《书信录》表明，那时他依然对各圣经会使用违反他的信念的中文词语表述上帝和灵提出了抗议。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有记录的最后意见，载于他 1907 年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表示对[大英圣书公会](#)出版的在中国使用的一个新约版本感到满意，这个版本“分别用神和圣灵表述上帝和灵 (God and Spirit)。”接着他又补充说：“我认为这些词很合适。尽管在中国的真正正统派和福音派教会最终显然都能达到目的，但这些词而且只有这些词才是对的。”关于这一问题，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不可能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他至死坚信自己是对的。

至于他在众所周知的“传道方式”讨论中的情况，这里就不必多说什么了，因为参与这一讨论的人们同样都在寻求这一难题的最佳答案，而这一讨论也从来都是以共同研究、相互信任的方式进行，参与讨论的同工们因此而更广泛地开展向中国传布福音的工作。直到 1905 年，狄考文博士才在一些同事的敦促下，出版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著述。

在关于登州文会馆是否教授英语问题的论战中，狄考文博士不得不在文会馆迁移潍县以后，向在潍县负责学校教育的大多数

人让步了。他满可以因为实行新政策，不再爱这所学校，或者除了忙他的官话圣经修订工作以外，不再对这所学校施以援手，但事实上他一直在利用自己可能利用的影响、或通过资助金钱甚至身体力行的艰辛劳作来帮助学校发展。从他与这所学校最后的关系可以看出，他始终是这所学校的忠实、慷慨的支持者。

一直以来，人们都经常说把自己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海外布道事业的传教士都是快乐的。他们也是人，也经常强烈地感受到面临的考验。但是，他们不露声色，从容面对，他们在荒野中找到一个人，或很多人，并引导这些人皈依基督，于是就感到快乐。狄考文博士晚年，想到了自己已经帮助把福音传到了中国，必定会感受到这种典型的少有的满足。考虑到这一至上的欢乐，这里要说“**伴生事件**”给他带来了欢乐，似乎是不恰当的。不过，举个人或团体赞赏他的标志性活动之一的事例，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信任他，让他负责有望产生巨大而永久性影响的最重要的事业，从而给了他荣誉。除了在中国的传教士之外，其他人也认为他值得信任和应当享有荣誉。1880年，汉诺威学院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伍斯德大学 (University of Wooster) 鉴于他在“文学和科学、哲学及神学领域的

造诣，以及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和教师工作上的成功”，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1902年，在母校百年庆典上，华盛顿杰斐逊学院因他“作为一名福音传教士和教师的接触能力及功德”，也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1894年，英国国外圣经会破例吸收他为荣誉外籍会员。1898年8月，他一生的朋友丁韪良博士应聘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写信给他询问是否可前往担任该学堂工程学院院长一职。考虑到一方面要继续做传教工作，另一方面要搞圣经官话翻译，他回绝了。同年12月，他收到了筹建中的南京大学堂¹监督请他担任该大学堂总教习一职，直接来自中国高官的这种邀请，是对他的格外尊重和信任的标志，但基于上述同样的考虑，他也拒绝了。他写信给差会总部的一位秘书谈及收到这些邀请时说：

所有这些邀请都提供了比我做传教士高得多的薪水。虽然我目前在登州文会馆没做多么积极的教学工作，但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工作和影响还是很重要的。现正在搞圣经翻译，除非我翻不下去了，否则我不会放弃这一工作。另外，我还挂念着讲道，特别是在本土教会复兴会议上的讲道，而向文会馆的学生们讲道，也是我极其看重的。

¹ 南京大学堂是张之洞筹设的，但随着张之洞调任北京，设立大学堂一事也不了了之，最终没有建成。

狄考文博士在潍县的七十岁生日庆祝活动是一次虽然不大但却很显要的荣誉。中国人有个奇怪的习俗，皇帝或是其他显贵人物的生日，在实际生日的前一年前一月前一天庆祝。狄考文博士的七十岁生日就沿用了这一习俗。一位这次生日庆祝活动的目击者对当时的情形作了如下生动描述：

“生日聚会”是广文学堂的校友和在校生策划的，做了最精心的安排。上午，一列长长的雇来的娱乐庆典队伍，打着鲜艳的旗子，带着吹打乐器，从城里来到了乐道院，狄考文博士和广文学堂员工在大门口校阅了这支庆典队伍。头戴法学博士帽的狄考文博士非常赞同用深具中国观念的大红色作为任何庆祝活动最适合的颜色，不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吗？在小教堂举行的活动，只许中国人和城外来的客人进入，济济一堂，从始至终，只有东方人发表演讲，气氛热烈。首先发言的是中国这一地区最成功的牧师，也是狄考文博士以前的学生。该地的最高官员庄严地参加了活动，还不算是怎么傲慢，令人印象深刻，尽管我永远都会认为中国的那种高贵和权威的典型表达方式什么作用都没有，看上去更让人觉得像是嘴里的酸橙。如果要找一个广文学堂存在的具体理由，

我想没有比看一下校友们的情况更合适的了。敏锐的目光，洋溢着智慧的脸庞，多好的一帮男子汉！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富裕的商人，他们脸上写满了感激之情；更多的则是本土教会的牧师和教师。学生们演唱了四重唱，他们唱的那复杂的旋律令人叫绝。这些人并没经过正规训练，而是他们自己排练的，他们的进步令我们吃惊。但是，那音乐，真正震撼人心的音乐，竟然是那些当地吹鼓手们演奏的。数支笙、箫，小鼓，以及两三只唢呐凑出了一种音调，如梦如幻；然后乐手们又各自独自演奏一支曲子。你或许知道一些中国本土乐队的情况，很难用语言描述。庆祝活动燃放了大量鞭炮，一长串一长串的鞭炮绑在三脚架上燃放，其中有些是二踢脚，那阵势，就像美国的国庆日。中午，摆设中国式筵席宴请邀请的宾客，从附近乡村赶来观光的人，则在大院各处吃他们自己用手帕包裹带来的干粮，这些干粮他们整个上午都随身带着。对广文学堂来说，这是伟大的一天；对附近的乡村人来说，则是他们经历的一个大场面。不过，最可惜的是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那么多绣有金黄色边沿的鲜红色的旗子，这些其实是那么的大，自那天在教堂里看到以后，再也没见到过这么大的红旗。



潍县广文学堂庆祝狄考文七十岁生日

一般来说，他在中国的时候喜欢四处旅游。在山东，他常去黄河的东段各处旅游。他到过北京数次，前面介绍过他有一次顺大运河南下到了南京和扬子江下游地区。他经常乘轮船往返上海，有一次南下到了宁波。不过，广大而人口众多的中国西南地区，他从未去过，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这一地区不感兴趣，也不可能是因为旅行费用问题，而是因为他没有时间。1868年春，美国战舰“山纳多号”(Shenandoah)赴朝鲜寻找两年前失事的“谢尔曼将军号”(General Sherman)的幸存者，途中抵达登州港。“山纳多号”想在这里找一名翻译，大家都认为这个差事应由狄考文博士来承担，于是，尽管由于妻子的健康问题及其他事务缠身，不方便出行，

他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这一任务。这次出行共花了六周时间，到了朝鲜西海岸的几个地方，其中包括平壤河(the river Pyeng Yang)，此后读过传教期刊杂志的人以及在最近那场战争中跟随日本军队追击俄国的人们都很熟悉的地方。当时那里对外国人是“禁区”，这支探险队发现很难同当地官员沟通，无论是和平还是强制的方式，因此几乎一无所获。通过这次比较充分的了解，探险队无论是翻译还是其他人，对那个虽然宗教上尚有希望但政治上很不幸的国家，均没有什么兴趣再做考查了。

狄考文博士在自 1863 年到中国直至去世的 45 年多的时间里，总共回国休假三次。第一次回国休假是 1879 年 5 月离开中国，1881 年 1 月回到中国。根据差会总部的规定，他有权在美国呆更长时间，但他觉得不应该丢下工作太长时间，同时也觉得作为一名年轻传教士，一般不应该理直气壮地享受约定俗成的特权。他的妻子由于健康的原因，比他早回国六个月。这一次回国休假，他取道日本，带上了梅理士的两个孩子，他们的妈妈去世了。他们乘坐一艘帆船，途经太平洋回国，虽然航速慢，但却很愉快，与他最初到中国的旅程形成了巨大反差。他觉得非常舒心，船长为表示他的好意，提供一切方便。回到美国之后，像其他回国休假的

传教们一样，时间主要用来家人团聚、四处走访、去教堂讲道、在各种基督教会议上演讲、在神学生中物色海外传教士人选，以及参加其他一些约会等等，整个休假期间各种事情挤得满满当当，根本没有休息恢复体力的时间。除了这些通常的事情以外，他还增加了两项内容，一项是到费城去听医学课，一项是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和巴黎的仓促旅行。

他的第二次休假是在 1892 年 7 月至 1893 年 10 月间。这次他与邦就烈一起取道太平洋，整个旅程非常舒适。在美国逗留期间，除了忙于那些传教士休假时通常所从事的极有趣的事务以外，为了能适应圣经修订工作，他去了肖陶扩村¹学习希伯来语，还赴芝加哥参观了世界博览会，细心地考查机械，尤其是电气设备，前引郭显德博士的话曾对此作了交代。这次休假最令他愉快的是他又见到了年老的母亲。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他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说船进烟台港时他和邦就烈正在写信，在这封信的末尾，他这样写道：“非常高兴我们终于结束了旅程，重新回到了中国。我们的工作在这里，这时我们应该在这里。”抵达登州时，一如前述，受到了学生们的盛大欢迎。

¹ Chautauqua，纽约有名的夏令文娱活动中心。

1900年9月25日，他与艾达·海文(Ada Haven)小姐结婚。海文是美国北京公理会传教士，在贝慢女校(Bridgman School)工作多年，公认是一名有才华的汉学家，一位成功的极受尊重的教师。在北京被围困期间，她提前同狄考文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1900年夏季，西方国家屏息等待在北京的外国人[命运的消息](#)，她就是这帮在北京的外国人中的一员。她在《围困的日子》这本书中，讲述了她和其他亲历被困的人们的看法，不仅涉及了他们的亲身经历，而且留下了值得永久保留的关于“旧”中国那段著名时期的愚蠢行为纪录。北京解围之后，休整了一小段时间，缓解了遭围困的紧张情绪，海文赶到了烟台，在长老会教堂举行了婚礼，狄考文博士的老朋友郭显德博士主持了婚礼仪式。作为狄考文博士的妻子，艾达给了狄考文极大帮助，她参与了“官话课本”(Mandarin Lesson)小册子的编写，为和合本官话新约圣经的第一版编订了希腊文和英文索引。他们共同生活了8年，狄考文在文字工作及其他方面从艾达那里获益匪浅，他经常从她那里得到启发及直接帮助，关于这些，他们家以外的人是很少了解的。

1902年6月至1903年10月间，他最后一次回国休假。这次狄考文夫妇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和大西洋回美国，以便他返回中国

时再次环行世界。1908年4月，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七年前我们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回家，极其舒适，比乘坐有个人房间车厢的火车要舒适得多。”或许在写这封信时，他已经忘记了那次旅行之初淡淡的不愉快的记忆，或许是他的脑子里只想到了穿过西伯利亚和欧洲俄罗斯地段的情形了。原来，有一位中国海军官员经常到他的工作室去谈天说地，曾表示在他和他的妻子启程回国休假时，要用炮艇送他们夫妇到大连港。那位海军军官这样说，只不过是东方人要面子经常用的一种空头支票，根本不想这样的支票会有人接受的事。但狄考文博士却是个实实在在讲情面的人，他把那位海军军官说给他的空头支票当了真。于是，动身前，他派人去通知那位海军军官，说愿意乘坐他提供的炮艇，可得到的答复是“这个时候用炮艇送他们去大连毕竟是不方便的，所以给他们定了一艘中国舢板船。”舢板船不能进港，他们不得不乘划子过去。上了舢板船之后，他们才发现这艘船没有船舱，其实除了齐胸高的地方堆满了中国行李、一些散发着臭味的鱼和洋葱，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他们腾出个地方，把洋葱堆在了甲板上，即使这样安排，也仅有五英尺见方地方可以乘人。小船上挤满了中国旅客，天下起了大雨，狄考文夫妇只能靠着甲板撑起了一把伞

来挡挡雨，也只能靠这个地方透透气。到了第三天，他们才抵达大连港。

在这样的条件下，狄考文博士还利用白天的每一点时间对“技术词语”和“化学词语”手稿做最后校订，以便随后寄出付梓，这是他的一贯特点。他们差点就误了火车，如果真的没赶上火车，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再等一个星期坐下一趟车。那个时候铁路刚刚修好，还没有规律的乘车时刻表，而是要等许多天，很不方便。一周以后，他们换乘了一列特别快车前往伊尔库茨克 (Irkutsk)。同旅程之初比，他们这样的确是很奢侈了。从伊尔库茨克再前行，则是以狄考文的语言能否迁就为转移了。他们访问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接着到了柏林，从那里先后成功抵达杜塞尔多夫 (Düsseldorf)、科隆 (Cologne)、巴黎和伦敦，伦敦那时正在准备为英王爱德华举行就职加冕典礼，他们在典礼结束后才离开。出伦敦后到了利物浦，从这里登船经大西洋抵达哈利法克斯 (Halifax)，开始了他们的美国休假。

这次休假他拿出了一部分时间尽力为登州文会馆征募捐赠基金。在做这一工作的过程中，他访问了各地不同的教会，并在匹兹堡呆了六个星期。就是在这次休假期间，他作为他所在的中国

长老会的委员，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美国长老会最高裁决会议。这次休假他们去了许多著名的地方，其中包括优胜美地峡谷¹。不过，他们这次休假中纯粹的休假并最令他们感到愉快的时光，则很可能是在“老家”度过的。他的妻子在一封信中讲述他们休假在“老家”时的情形说：

结婚时我的丈夫就计划在我们到美国后带我蜜月旅行，乘坐一辆四轮马车，去看他孩提时代熟悉的所有景点。根据这一计划，我们在梅卡尼斯堡（Mechanicsburg）同考文的表兄弟们一起搞了我们的结婚周年庆祝活动，有个表兄弟为我们举办了一次宴会。很多人在一起交流着记忆中的往事，沉浸在过去和现在交织的欢乐中。一两天后，我们从这里开始了长期计划的旅行，乘坐一辆一匹马拉着的两轮马车，一连数天，有时候在中午到了一处地方停下来，有时候则是半夜赶到一个地方停下来，这些地方都与他少时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不过，在所有与他成长有关的这些地方中，他最想给我介绍的还是他心爱、熟悉的长山（Long Mountain），当我望一眼长山，再看看他那容光焕发的脸庞时，我明白了，他从这里获得的对真理和自由的坚实的爱，仅次于从他

¹ Yosemite Valley，即约塞米蒂国家公园。

读过的经文和教义问答集中所获得的。无论是那一次旅行，还是后来在梅卡尼斯堡或哈里斯堡游览，我们都到过他少时熟悉的所有地方。在他的出生地，少时显得那么高的墙在现在白胡子六英尺高的他面前，又显得那么矮了；坐落在小溪旁的**苜蓿碾坊**；他受洗的银泉教堂，毗邻的墓地——那里有许多标有精巧铭文的他古时的苏格兰-爱尔兰先人的坟墓...游览葛底斯堡战场那天，雨下得很大。这次游览，有考文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位老兵陪同。去他第二个家“修道院”一带游览，也很有趣。这里更引人注目的是大“**粮库**”(bank-barn)，里面有堆放干草的地方，有盛谷物的大木箱，有个场院，他小时候就骑在马背上绕场院一圈一圈地转着打谷。那里还有一架旧式手工工作台，上方有燕子窝。记忆的潮水汹涌澎湃，这位花白头发的传教士忍不住泪流满面。**他领**我看了坐落在小河旁边的一处小校舍、老磨坊，老磨坊里面有一间小屋，冬天夜间，他和小伙伴们就在那里围着一个十块金属板搭成的炉子斗嘴。另一有趣的地方是个据说闹鬼的教堂院落，他曾爬到院墙上试探与鬼较量，从那以后，他就成了一位无往不胜的勇士，不再惧怕任何人或魔鬼了。

不过，他们到访的最神圣的地方，还是他母亲位于俄亥俄州

伍斯特公墓的墓地。

他们从西雅图起航赴日本，在那里作短暂停留，拜会了令人尊敬的旧约圣经翻译者施约瑟（Schereschewsky）主教，以及其他一些朋友，随后即返回登州。

第十五章 面向新中国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做我所能做的使她迈向美好未来的事情。上帝的教会必定在这里取得伟大胜利，在这一过程中，也必定经受巨大的考验。”——摘自 1906 年 11 月 27 日致 詹姆斯·穆尼函

狄考文博士写上面那封信的时候，新的中国尚未诞生，也还

看不到要诞生的样子。至多可以有把握地说，覆盖那个国家数世纪之久的冰冻有了春融的迹象。坚冰的表面出现了一些巨大裂缝，能够听到表明它在裂开的声响。站在岸上的人们，以及站在冰上的人们都在大声喊着：“终于要解冻了！”看来在太阳升起、河水欢唱、春回大地之前，坚冰似乎不可能明显消融。但是，坚冰到底要多少时间才能化掉，即博识者试图对此做出预测也几乎是徒劳无功的。当坚冰真正消融时，其突然消失会给现在值得很好保存的东西造成巨大伤害，还是将没有任何断裂震颤，只是静静地逐渐融化成春回大地之水？中国的新生很可能为期不远了，世界文明和教化的进化法则不可改移，中国的新生不可能拖延多长时间了。狄考文博士的人生经历使他足以辨识这一新生的迹象，在为此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深切地为之担忧。

从 1863 年到登州至 1903 年休假返回登州，他对旧中国有着长达 40 年之久的直接了解。在此后至去世的 5 年间，他又亲眼目睹了表明中国即将发生变化的新气象。因此，关于那个国家现在的局势，他特别有资格发出智慧的声音。他不是现在才第一次到中国的人，对那里铁路、电报、现代海陆军、学校的需求等，最有说清楚目前态势的资格。如果求教于像赫德爵士、丁韪良博士

和狄考文博士这样的资深人士，我们就有可能了解全部事情的真相，他们这些人几乎一生都在中国生活，了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尽管，今天那里还没有发生完全真正的变化。另外，狄考文博士无疑是爱中国人民的。为了他们在今生今世以及未来世界的幸福，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他们中间，当死亡来临时，他唯一不愿顺从主的召唤的原因，或许就是他没有完成他所认定的要为他们完成的最伟大事业。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在解释义和拳运动爆发的原因时，尽管他对那场运动的暴行和所造成的恐怖感到伤心和愤怒，但却毫无犹豫地指出了义和拳运动的爆发，部分是由于外国和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错误行为引起的。在山东有数百人，或许有数千人，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他，他们对他的信赖，几乎无人能及。

因为这里[必须清楚地指出另一个问题](#)，以便不忽视其可能性，我谈一下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他从不允许自己对中国人中一些最严重的本质性缺点视而不见。大约在他到中国开始传教的同时，蒲安臣使团(Burlingame Mission)引起了美国人极大的兴趣，过分迷恋于旧中国的文明，对中国的未来过于乐观。甚至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也被美国国内的这种病态情绪所感染，给国内的期刊

杂志写文章，进一步鼓动那些不切实际的观念和期盼。美国人对旧中国文明的看法及其对中国未来的过于乐观的预期，与他实地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不符，于是便精心撰写了一篇文章，冷静地批评了这些喧嚣一时的流行观念。那时人们都认为古代中国人走在世界的前列，但在他看来，中国人历史上并没取得什么值得自夸的成就，他们很大程度上一直是模仿者；他们很少有属于自己专利的发现、发明和体制。或许，他是针对那些过分赞赏中国古代文明的观点才这样写的，他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有些极端。或许过些年以后他再写文章反驳那些观点时也不会这么走极端。但是，他始终认为中国人在以往的时代里一直排外、自我封闭，养成了一些种族特质，其中有些东西必须抛弃，有些必须予以极大改进，否则，中国就不能跨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此外，无知、偏见和迷信是中国进步的巨大障碍，这些障碍不可能一下子清除。后来在中国大肆引进外国器物之时，他还是认为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中国的官员和民众依然是憎恨外国人的。同时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在履行对其他国家承担的义务方面不守信义，所以明显的外国侵略问题就永远不会有完全恰当的解决办法。他认为中国的法律还很不健全，依然是由官员们随意解释，腐败盛行，

美国公民，无论是传教士、商人还是工程技术人员，在任何一个中国本土法庭上都有安全保障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狄考文博士是主要的“新中国创建者”之一。与过去相比，现在他的《官话类编》使人们学习中文容易多了，从而帮助传教士和其他西方人得以快捷地掌握同中国人交流的工具。他第一个提出了要在伟大的山东省设立一所大学的计划，山东是孔子和孟子的故乡，中华民族最主要的信仰发源于这里，至今依然是这一信仰的中心。他率先在包括传教士开办的学校中教授自然科学。他用自己的钱建了一个博物馆，他将其描述“为向中国学生和参观者展示外国科学和机械工艺的综合工艺学堂”。在这个博物馆里，人们可以看到运用蒸汽和电气工作的情景，其中包括铁路模型、电话、电报等等。当山东巡抚在省城组建大学堂时，他选定的继他管理登州文会馆的继任者，最初负责这所学堂的创办，并选拔了五位登州文会馆的学生担任大学堂的教学。他编著数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广泛用于正在取代旧教育体制的新学堂。将新约圣经翻译成只要接受过教育、能读书的人就可以读懂的文本，主要是他的原因，圣经如果不比铁路和西方机械更能为人们所接受的话，就不可能广为散发传播。说什么人是新中国的创建者是荒谬可笑

的，但是，很明显，中国发生巨大转变已为期不远了，而要论及对这一巨大转变所起的作用，没多少人可以与狄考文博士比肩。

至此，我已经把他提到了新中国创建者们的领路人之一的高度，但却还没有谈及他在作为福音代表的传教士圈子中的作用，所以如是，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传教工作是他与其他众多传教士共同做的。目前，在中国大约有 4000 名男、女传教人员——按立牧师以及平信徒做传教工作；有中国基督徒约 20 万人。虽然这些人广泛分散在数亿人口中，但却可以从他们身上非常明显地感受到真正进步的力量。尽管，上溯 100 年前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中国来的时候，只有寥寥几个传教士，微乎其微的教徒。狄考文博士自己对关于传教工作与现在局势的关系的判断，很值得注意。他在去世前 9 个月应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

与过去和传统相比，中国现在处在转变过程中，这种转变是令人惊异的。35 年前，谁会预料到一切会像现在这样迅速发生变化？上帝施展各种权能把中国从长期睡梦中唤醒了，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转变个人信仰和建立众多教会这些主要事业以外，传教士在许多事情上都有着强有力的影响。首先，传教士散居在中国广大内地地区，他们做了远比人们所了

解的多得多的去除偏见、使中国人熟悉外来思想和事物的工作。其次，他们是发起现在席卷全国的反缠足运动的主要力量。第三，他们是现在中国政府最为努力进行的禁烟改革运动的主要发动者。最后，在知识分子觉醒问题上，在开启中国政府现在正在推进的令人赞叹的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上，传教士一直是强有力的促进因素。传教士编撰的现代教科书，他们开办的学校培养的学生，都为这次著名的教育改革运动准备了条件，推动了它的发展，尽管人们一直对基督教和基督教的教授们存有极大偏见。

事实上，面对将要发生的巨大变化，他非常清醒。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间，他比任何人对所处的环境都更清楚。1905年5月2日，他写给美国的一位交情甚笃的朋友说：“现在中国的状态与我41年半以前到这里的时候相比，反差巨大。那时候一切都死气沉沉，停滞不前；而现在，一切都有了生命，动起来了。的确，目前这种状况仅仅是变化的开始，但却预示着将来要发生巨大的变化。”1907年9月1日，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这一伟大、人口众多的民族，在如此之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为西方所忽视，现在，这块在西方人眼里模糊未知的国度，正在从东方崛起，吸引了西方人的注目。中国正在从历史长眠中醒来。她的眼神由于

传统习俗和过去保守行为的侵蚀，依然呆滞，但却一天天睁大开来。不错，她是想依旧沉睡下去，但她不能沉睡下去了。世界前进的喧嚣声在耳畔回响，巨人之手在摇晃她，梦中的幽灵和无由的恐惧折磨着她。她尝试着站起来，但浑身乏力。她面对自己的虚弱和无能而日益狂躁不安。”

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中国，总体上说，他是感到愉快的，但也觉得存在着严重的危险。他推测，深深根植于这个民族精神之中的特性大多必然会导致某些危险。他在《中国的教育》这篇文章中说：

中国人的特性是很难相信一种新事物，在他们决定采取行动之前，必定总是心存疑虑。但是，一旦决定要做，就不顾后果迫不及待地去做。旧的教育方法和观念已经废除了，政府现在一心顾头不顾尾地忙着推行迄今毫无经验的新措施。上面向各级下属发布命令，但却不提供执行这些命令的方法。结果是混乱多多，实效寥寥，繁重的税负和违法滥征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导致了叛乱的发生。缺乏有能力的教师，阻碍了整个教育改革运动的开展。在西方教育家看来，他们的小学和中学简直就是闹剧。教会学校培养了大量有能力的教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基督教的偏见

非常大，异教学校不聘用基督教学校培养的教师。这种偏见在中学要比省级学院和大学严重得多。省里高级官员一般来说观念开明，他们不再像中下级官吏们和士绅那样排斥基督徒教师。

因以上所述的中国人的特性，他在为基督教日益增多地转变成千累万人的信仰并间接影响更多民众感到高兴的同时，也为教会在中国的未来命运感到担忧。他在1906年1月写给美国圣经会秘书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未来局势像我现在在中国看到的迹象所显示的那样，要不了多少年，我估计是在10—15年间，中国教会将宣布与外国传教士脱离关系，他们要自己承担费用，制定自己的教义...这种教义会是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培养什么样的布道师和培养出多少布道师。”1910年8月24日，中国大学生联盟在哈佛召开会议，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强烈昭示了这样一种趋向。

考虑到整个局势，考虑到民族的和宗教的问题，他一再反复重申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当务之急是要规模地培训本土牧师和教师，要使他们适应将面临的紧急局势，要利用中国出现的这一传布福音和随之而来的创建教会的机会，在即将开启的航程中，一定不能因缺少海图、指南针和适当的领航而出现事故。在生命的

最后三年时间里，他竭力强调：

请允许我这样说：目前在中国，我把办学和培训教师、布道师视为主要任务，这些事情要比设立新布道站、建造大教堂、开辟新传教区重要得多。这不是一闪而过的念头，而是深思熟虑的结论。可用来培训这些教师和布道师的时间并不多，要不了多少年，本土教会将宣布独立，届时一切都将取决于中国教会领袖们的智慧和稳定性如何。

再举一个牵涉到中国教会问题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十分宽泛，涉及整个帝国的局势，他说：

“中国对西方的力量、技术和知识着迷。她垂涎这些西方事物，迫不及待地大呼小叫要拥有它们，但并没得到。她已经认识到教育将解决这一问题，并能迅捷地把自己融入世界民族之林。她颁发谕令除旧布新，命每县都要开办学校，但却不清楚没有教师、措施和金钱，要有效地办学是不可能的。她正在用假象欺骗自己，这就是中国——一个自称有知识的国度的特点。旧的一切迅速消失，而新的尚未来到，已经有了不少危险的不祥之兆。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多合格的基督徒教师，其他人里面则几乎没有，但中国

的保守主义对基督教抱憎恨和恐惧态度，只要可能就尽量不聘用基督徒教师。中国依然有一门大的基本的课程要学，那就是：基督教不是她的敌人，而是她的朋友，忠实诚挚的人不是靠简单地教授点几何、化学知识就培养出来的。不过，她很快就会明白，只有基督教才能造就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才。她现在憎恶的观念，或迟或早不得不予以接纳。同时，她需要人来教她，需要人来给她指明道路。在世界历史上，或许从未有过耶稣下面这句话的更显著的实际范例：‘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¹”

自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天起，他就一直不断地请求增加工作人手，这会儿要医生，那会儿要教师，再不就是要一个能监督机械操作的人，至于传教士，则是在一直不断要求增加。关于要增加哪方面的人手，他有一套典型的常识性观念。他在写给他曾在那里求过学的神学院的学生的信中说：“关于做传教士，我可能格外多说几句，恐怕除了抱有拯救灵魂这一共同观念的热情以外，做传教士还应该有多种打算。传教士队伍需要适当合理组合，要精明务实...有喜欢演讲的，有乐意出谋划策的，有乐意发表意见的，以及擅长做其他事情的，这样才能组成最好的传教士队伍。”尽管

¹ 《新约·马太福音》第 9 章第 37 节。

他认为这些是作为传教士队伍除了著述工作之外的基本适当组合要求，但并没有放低对语言能力的要求，他认为任何具有适当能力和忠实履行传教士职责的人，都必须掌握好语言。因为他面前要呈现出一个崭新的中国，于是只要有机会，他就更为热心地大声请求帮助，这是发自他心灵深处的呼喊，其强烈程度，非语言可以形容。

在叙述有关他去世的事情之前，介绍一下我们掌握的他关于这一问题发出的最后请求，不是更好吗？上主呼召他回家的前一年，在我引述的那封 1907 年 9 月 1 日从潍县发出的信中，他说：

请代我告诉美国的年轻人，现在中国向基督教会提供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机遇。上帝打开了这扇大门，宽宽地敞开了。三亿五千万人民准备聆听福音。没有争吵和努力，这扇大门是不会打开的。面对一成不变的固执反对，历经大量磨难和流血，这就是迄今大多数人对传教士在中国情形的印象。黑暗和令人沮丧的时代已经结束，光明的未来即将到来。回想我传教生涯的头 25 个年头，那真是一场令人烦乱的梦。最近 15 年间，中国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旧习俗和偏见不见了，我们面前呈现出了美好的曙光。世界上最保守、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人民，正在习惯于新

事物，准备接受任何有望带来利润和财产的事物。所有人都准备倾听，传布福音已没任何阻力。我常常想我要是年轻人多好，那样就能投身于光明开放的战役之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世界和基督教会的未来同这个伟大的民族连在一起了。为什么上帝福音以前长期没有在这个最古老、最重要的国度传布，真是一个不解之谜。那些未转变信仰的数以百万计的黄种人的真理和魅力不久将成为历史，那么谁能说他们会怎么样，会做什么？他们无可争辩的生育力、体力、耐力和智力，将融入未来世界历史之中... 在我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之际，预测他们的未来前景，如果说他们在文明史上曾经施展过神圣才能的话，但现在，供他们施展神圣才能的更诱人的舞台几乎不存在了。西方教会很少有人了解和赞赏中国目前的局势，政治势力和政治问题要比道德和宗教问题好理解。“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¹，依然千真万确。长期世代沿传的古老信仰正在迅速丧失，代之而起的新信仰会是什么呢？这是当今基督教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的年轻人正在疯狂地学习英语，因为英语能带来金钱。英文书刊报纸正在播撒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种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要大声疾呼：谁来保卫真理？谁将掌控解救之法？

¹ 《新约·路加福音》第 16 章第 8 节。

谁来举起十字架？谁将为基督作见证？问题亟待解决。撒旦在作战，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许多年的变化汇聚到了一点，年青人，是站出来战斗的时候了！时势催人急。谁将听从上主的召唤？

第十六章 去世

“我已决定把一生献给中国；我期望住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摘自在 1862 年在宾夕法尼亚阿勒格尼长老会中心教堂的告别演说

“我预计要死在异教中国，但期望基督教中国记住我。”——摘自另一次告别演说

在《官话和合本圣经修订》一章，我们提到 1908 夏年官话圣经旧约修订委员会在烟台修订创世纪和诗篇，富善与狄考文两家人共住一处，但未能展开叙说。富善博士曾担任北京联合神学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at Peking)院长，熟稔差会教育工作，与狄考文博士契交甚深。他们两人也曾自始至终共同修订官话新约圣经。在个人性格特点方面，他们有许多不同，但在共同工作和信念上又十分默契融洽。富善夫人和狄考文夫人¹曾乘同一条船来到中国，作为单身传教士，都在公理会工作，在长期的工作中成为挚友。他们 1908 年夏天在烟台共同居住的房屋，向外望去，景色迷人。“岛屿”、海湾、大大小小来来往往的各种船只，尽收眼底。中国帆船、舢板、轮船、小鱼雷艇和悬挂不同国家国旗的大战舰，或泊锚港湾，或缓缓向港湾驶来。从后窗向外望去，蜿蜒起伏的小山上，有一座古怪的墙，十分像画中的长城，以至无知的水手会以为那就是著名的长城。富善博士在 1909 年一月号《教务杂志》上发表纪念狄考文博士的文章中，回顾了他们长达三

¹ 指狄考文继室夫人艾达。

十五年的交往，对前一年夏天的情景做了尤为细致的描述，他说：

我们大部分时间白天整天在一起开会，傍晚则一起长时间散步，每天傍晚散步时，总是大小事情无所不谈，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思绪“纵横飞舞，无所不至。”如果他不是博览群书，就是早经一遇到保守的问题、进步的问题以及以前未经接触过的问题，便作广泛深入的思考。他说话口气坚定，有时候甚至是固执己见。但是，他喜欢听到带有真实、深厚感情的相反意见。狄考文博士的思想自然是长于逻辑和数学，但也不乏诗意和感情色彩。

狄考文博士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温和起来，晚年尤其如此。去年夏天，我们在烟台我们的“租赁房”一起住，那一定是我们生活中最愉快的时期之一，没有一点磕磕碰碰，十分欢愉。
[这就是在可爱的上等家庭中那种无意中形成的更温馨的欢乐和更完美的友谊吗？](#)

去年夏天，尽管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但狄考文博士依然像通常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他忠诚履行职责，全身心倾注于诗篇的翻译。有时候，他从他那间小书房向禁闭着他深爱的妻子的房间望去，他的妻子也像他一样在紧张而饶有兴致地翻译圣经，便走过去到妻子房间，商量一些难懂的短语，或者给妻子讲讲他译过

的美丽人物事迹。

早晨一大早起来，我们一起到海中游泳，他游泳游得很棒。之后他“同主交谈”，六点钟时，等他的中文先生到来。傍晚散步，走的路比以往那些年少了，时间也短了。

上述引文中有一句话这里必须说明一下，狄考文夫人由于一次意外事故致残，那时不能行动，不得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在烟台修订官话旧约圣经这年的夏天，狄考文患了慢性痢疾状腹泻病，但他一直坚持工作，直到委员会会议快结束时，才躺到了床上休息。最初，在床上还坚持工作，忙着翻译诗篇，他格外渴望给中国人译出只要听到就很容易明白的诗篇，渴盼诗篇像在讲英语的民族那样，成为中国教会的丰富遗产。结果，病情终于急转直下，到了只有得到最好的治疗才能保住性命的地步，除立即进行治疗别无选择。于是，人们决定乘轮船到德国租借地内的青岛。这样需要 24 小时的旅程，当问他能否忍受旅程颠簸时，他说：“我必须忍受，我若是不去就活不成了。”

紧急决定到青岛去，并非是因为烟台缺乏医疗条件，在这里得不到友好帮助，而是为了要得到一家优秀医院所能提供的最好治疗。幸运的是旅程一切顺利。他的妻子跟随一同赴青岛，富善

博士和富善夫人也陪同前往。他们一行星期二夜间抵达青岛，那里的朋友们都在岸边等着，船到后随即把他搀扶到了担架上，直奔福伯医院，由那里技艺精湛的内科医生文施 (Wunsch) 竭尽所能挽救他的生命。赫士博士已经在医院等候，应狄考文博士要求，他每天都在医院。

到青岛那周的星期五是狄考文夫妇结婚周年纪念日，但很难把妻子带到他身边。星期六，病情明显恶化，人们才允许他妻子到他身边来看他，妻子来到身边，他似乎很惬意，尽管他已极其虚弱，说不出什么话了，大家让妻子留在了他的身边。他的弟弟狄乐播和弟媳玛琪 (Madge) 接到电报后也立即赶来了。星期六下午，他神志迷糊，似乎想到了文会馆的一些事情。星期日上午，他要狄乐播和他一起祈祷，这表明了祈祷是他长期以来投入极大热情的事情之一。在到船上去的路上，他疲惫不堪，还对富善博士说：“青岛医院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治好我的病，让我能够完成诗篇的翻译，我现在要活下去就是为了把它翻译完。”当然，他这样说表明他这时还是一心想着工作。当他的弟弟跪在他身旁祷告，请求为患者敞开通向天国休息的大门时，狄考文博士喊道：“你要多点信心，罗伯特，祷告我可以活着完成诗篇翻译。”接着他让把

赫士博士叫进来,要求赫士博士为他祷告要活下来完成诗篇翻译,赫士博士祷告完毕,他又补充说,“主啊,但愿您答应我的请求。”

安息日,当在青岛的一些文会馆以前的学生来看他的时候,他已经非常虚弱,只能对他们说“再见”了。

最后这些日子,他在祈祷中获得了极大安慰。当他渐渐步入弥留之际,他的信仰依然坚定鲜明。在他的妻子询问他信靠基督的问题时,他回答说:“我信靠基督,什么都不担心。”在去世前的一段时间,他对弟弟罗伯特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圣父了。”最后可以清楚地辨别出音节的这几个词,表明在他的心底里,对上帝的热情甚至比他渴望完成他的圣经翻译工作的热情还要高。非常熟悉他的人公认他是一位格外尊崇上帝的人,对他来说,从孩提时代背诵教义问答集时起到去世,一直坚信上帝的存有、智慧、权能、圣洁、公义、良善、真理,都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在教堂做公共礼拜,他总是站着祈祷的人之一,尽管他周围的人可能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祈祷。他认为除了跪着或站着,其它姿势都不适合用于公共场合的祈祷。他的全部宗教观念,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充满着对上帝神圣的敬畏。对他来说,上帝就是他的天父,上帝首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和工作中显明了自己,

并不断地使他具有献身于神的勇敢；每当他有意识地进入神圣的存在，便虔诚地敬畏起来。他一生的宗教生活一直这样，因此，能听到他最后的话语就是“圣哉！圣哉！真实而伟大！”随后，没过多久，他睡着了。他于1908年9月28日上午10点25分去世。

在他的著述里发现了一本小书，打开后发现是1863年收集的私人祷告记录，1863年是他奔向中国的那一年。这些祷告词的最后一则如下：

不要让强大敌手骚扰我的灵魂，在最后的斗争中，要让我成为一个胜利者，不只是这场可怕的冲突的胜利者。我谦卑地请求让我一直保持理性，如果您愿意，我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和支持，我会留下支持宗教现实的证据，留下您成就您的恩言的信实，随后而至的您的其他仆人，也会受我的例子的鼓励，勇敢地去引导和管理以色列的牧者。当我的灵魂离开这块泥土地时，主耶稣会收留它，派一些蒙恩天使指导我无经验的灵魂去您备有爱的**大厦**。啊，让我保持现状吧，尽管处在最低等级，我会看到您的荣耀！

上述他那本小书中记录的他年轻时的祈求，在他的地球之旅中得到了满足，**谁怀疑他期盼进入永生之境的祈求也会同样得到**

满足呢？

在青岛中国长老会小教堂举行了丧礼。出席丧礼的有山东长老会的牧师柏尔根(Bergen)博士和方伟廉(W. P. Chalfant) 牧师，那时山东长老会正在潍县开会，有巴塞尔和柏林新教差会的代表(Basel and Berlin Protestant Missions，即瑞士信义会和柏林信义会)，以及大量中国人。在教堂里安放好灵柩之后，以前登州文会馆的学生们带着长长的菊花制作的花环来到教堂里，将花环缠结在灵柩上，直到运走之前都可保持原样。许多人做了中、英文献词，充满了对这位刚刚去世的传教士的赞赏之情。中国人发言的是一些他自己的“孩子”，他们叙说了赞赏“老馆主”的理由，直到这时他们还习惯于称他“老馆主”。丧礼之后，灵柩移送到了来时乘坐的那艘轮船上，在他的弟弟狄乐播和卫礼大(Mason Wells) 先生的照料下，运至烟台卸下。当天傍晚，一些中国年轻的基督徒护送灵柩前往海军青年基督教协会(Naval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停放，第二天上午，移送毓璜顶上的倪维思堂安放，等待举行葬礼，热爱他的人们摘来了鲜花，覆盖着灵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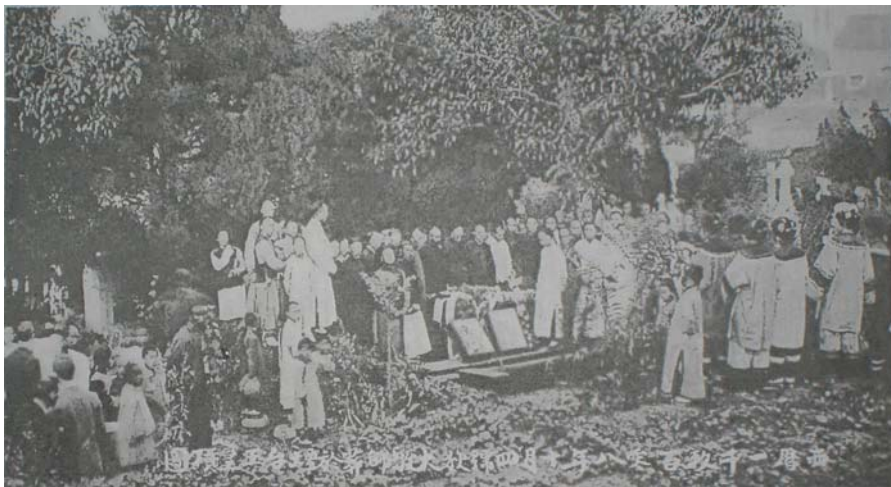
在灵柩停放毓璜顶期间，一些传教士接到电报后到了登州，起出了朱利亚的尸骨，以便迁葬烟台，后来他们夫妇即安葬在公

墓已准备好的圆顶墓穴。然而，朱利亚的纪念碑还留在最初的墓地，碑上也镌刻上了狄考文的名字。

葬礼在安息日下午 2 点 45 分举行，毓璜顶新建的大教堂挤得水泄不通。葬礼由中国人、毓璜顶教会王牧师主持，登州教会的栾牧师协助。在根据圣经“启示录”第 14 章第 13 节讲道时，王牧师谈到了狄考文博士漫长积极的一生，论及了他作为一名布道师一直致力于解救中国人民灵魂的动力，讲述了他一生坚持不懈的工作。栾牧师在随后的致词中历数了大量将为狄考文博士服丧的人，**列举**了许多不同的地方，说那里的人们要为狄考文博士举行追悼会；详述了他为了争取人们皈依基督去适应各阶层的人，以及他始终不渝地认为福音必将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

紧接着在墓地举行英文葬礼，但是由于大量外国传教士已提前来到了墓地，空间有限，于是在离开教堂前下通知说这里的很多中国人不能前往墓地，只有狄考文博士以前的学生可以前往参加。墓地葬礼上最遗憾的一件事是郭显德博士不能参加，他最初曾经与狄考文博士乘同一条船来到中国，在宣教区很多工作密切合作，他对狄考文博士的事情极其关心。狄考文博士去世的消息传到烟台时，他已出发去了农村，未能及时得到消息赶回来参加

葬礼。由于他不在，在场的烟台牧师伊维廉 (W. O. Elterich) 博士主持了葬礼仪式。在他讲完话之后，登州的文约翰 (John Prescott Irwin) 牧师发言，文约翰牧师与狄考文博士同在一个布道站，因而熟知一切。他讲述了这位就要下葬的传教士一生不懈积极工作的情形，认为即使狄考文活到 100 岁，也不能够完成他想完成的工作；论及了他从不显露深深掩藏在表象之下的热情的心；历数了他现在已经完成了的事业，指出这些事业耗费了他和尸骨就放在他身旁的妻子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为了把福音传到中国，他们夫妇耗尽了生命，最后埋身在中国的土地上。



烟台毓璜顶狄考文墓地

他们的坟墓所处位置非常漂亮，与倪维思博士和其他传教士

朋友及同工的墓紧挨着，从墓前人行道直接向上走，即抵达这块墓地的大门。

对狄考文博士品格和工作的颂词太多，既有来自中国和美国，也有来自其他基督教国家的，我们这里只能选出一些作为代表介绍一下。理当首先介绍的是郭显德博士对狄考文的评价。他们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郭显德博士在“长老会旗帜”上用数个版面的篇幅，称颂他这位已故的朋友。在这篇文章中，自然是要用大量篇幅简要讲述狄考文的生平事迹以及这些事迹所展示的主要品格。最后，他用下面的话作为结语：

就个人而言，我认为作为这样伟大之人近 50 年的同事，有幸享受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我一生最大幸事。四十多年前，我有幸同他一起在巡回布道中度过数周或数月时光，每天向数百名从没听过福音的人们传布福音，找不到有基督徒的地方鼓舞一下士气。我们常常忙碌一整天，在大集市或街道上向拥挤的人群宣讲福音，然后傍晚一起到小客栈里跪下来诚挚地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广施恩惠，让我们的努力给人们带去救赎真理。我们常常想，这些枯骨能活吗？我们能活着见到由中国牧师设立和照管的教堂吗？他坚定不移地确信福音总有一天将在中国取得普遍胜利，这

一信念给了他所有同事强有力的支持。当我在内地布道站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脑子里立即想到了：“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作元帅的大丈夫吗？”¹

没有他，世界似乎更荒寂了。传教工作的各个方面，总是可以倚靠他的协调和帮助。他的各项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并不断地获得荣誉，直至主召唤他去更高更广的所在，在那里，他的**圣民招待他**。

在我看来，接下来应该介绍的是现在青州府的牧师、以前在狄考文博士卸任后担任登州文会馆主的赫士博士的颂词。在山东布道区的所有同事中，赫士博士是最受狄考文博士信任的人。数年间，他们常在一起，彼此之间有着深切的了解。狄考文博士葬礼后，没几天就在潍县举行一次狄考文博士追思仪式，在这次追思仪式上，赫士博士对包括广文学堂学生在内的全体参加追思仪式的听众作了一次长篇演讲。他首先详尽追忆了狄考文博士对基督事业的忠诚、他的坚定、他对重大事情的关注，以及他的勤勉刻苦。最后他总结说：

¹ 《旧约·撒母耳记下》**第3章**第38节。

让我们努力效法他的优秀精神品质，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人。

他的这些优秀精神品质，概括说来：首先，是他的信仰。在他去世的那天上午回答他弟弟的询问时，他说：“很久以前我已经把这些事情交给了圣父”。稍后，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小时，他说，仿佛是自言自语，“我们因主耶稣称义”。因有这样的信仰，他像在妈妈怀抱里的婴儿一样睡去，一点都不奇怪。其次是他的虔敬精神。虽然他并不敬畏人，在他确信的问题上直言无讳，尤其是在晚年，然而，正像在翻译委员会为他服务的人一开始所说的，[在接近独一无二存在时，他是怀着敬畏之心的](#)，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直到临终前，也一直如此。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圣哉！圣哉！圣哉！真实而伟大”。俯卧病榻，他仿佛看到了王的荣美¹，灵魂中充满了对神的敬畏。第三，他的宽恕精神。他是一个有自己确定见解的人，不满意在他看来是不明智和不好的东西，他并不总是赞同他的同事的做法，然而，如果确信一个人是一心在为基督王国的利益工作，他就会宽恕，并希望做到最好。他爱宽恕他的主，也爱那些曾经冒犯自己的人。他把这种爱推展至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也推展至为他工作的同工。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放弃任何有疏

¹ 参见《旧约·以赛亚书》[第 33 章](#)第 17 节。

失之人，他总是准备给这样的人另一次机会。

我已经指出了北京的富善博士与狄考文博士的密切关系。他对他一生的朋友、在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多年工作的同事和领导的颂词，或许是已发表的所有颂词中最全面的。这篇颂词足足占用了《教务杂志》十四个页码，涉及了狄考文博士一生和工作的主要特点。在这篇颂词中，关于官话本圣经占有的分量尤其重。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论证说：

必须指出：为了真理，没有人比他花费那么多时间，付出那么多劳动，或者说是钻研得那么深透。他努力的结果是翻译出了可与原文相媲美的圣经，翻译的人物，保留了原文描述的韵味，非常优美...官话圣经修订委员会会议期间，狄考文博士以他强有力和巧妙的风格，依靠完全充分的准备，对官话圣经修订本文体大多都定下了基调。

在转而论及他的主要特点时，富善博士继续这样写道：

首先，说一下他的品格。在 1890 年大会期间，大英圣书公会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干事赖特 (Wright)

博士同我们在一起。他评论说：“在所有出席会议的人中，有两个人的品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位就是狄考文博士。他举止像一位品格非凡的人，出类拔萃。他天生是引路人，而不是跟随者。一旦有了自己的结论，他就非常的自信，期望甚至几乎是要要求其他人接受。然而，他并不傲慢，而是一个真正谦卑之人。此外，他可能为他自己觉得过于草率或过于苛刻的话、令朋友痛苦的非常拙劣的情绪，而请求别人宽恕。在这方面，他展示了他的伟大。他也能宽恕别人和不计较有些事情。然而，依靠这样的人格力量，他依然是位领导者。

他极具不屈不挠的品质。做一项工作，他总是坚定不移，一定要坚持到最后，...那不是因为他掌控了工作，而是因为工作抓住了他。如果他活着，他一定会一步一个脚印地修订旧约圣经，直到玛拉基书最后一节，并全部仔细复校。汉密尔顿 (Hamilton) 博士谈到了狄考文博士坚持到工作结束的习惯，他说：“几个月前，在[山东理事会 \(Shantung Board of Directors \)](#) 一次会议上，我们有相当多的[重要事情](#)需要解决，一周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谁散会后等着要做的工作都没有狄考文的多。然而，当提出我们什么时候散会的问题时，他说：“我一直有个规矩，在我参加这种会

议的时候，要把手里的事做完，不管要用多长时间。”与这种坚定不移的品质相统一的是一种类似彻底性的品质，他期望完全彻底做好每一件事情。

狄考文博士性格粗狂强势。具有忍受艰难困苦的能力，不介意嘲笑现代生活的舒适和“追求格调”，他几乎就是一个斯巴达式的人。然而，“在粗狂简朴的外表下”，他有着一颗异常柔和的心。他是一个有着女人心的硬汉。

牧师鲍康宁 (Baller)¹先生自 1900 年以来也曾与狄考文博士在圣经修订委员会共事，他说：

他是勤奋苦干的典范，很难有人能像他那样；他是极其耐劳的典范，他**所能做**的大量工作会累坏大部分男人。他对基督的忠诚令人望尘莫及。他的消遣方式是变换工作，他做什么事都始终如一。

艾达在狄考文博士最后的八年间离他最近，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其他朋友不能充分说明的一些关于他的特性的情况，艾达的记述填补了这一空白：

¹ 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汉学家，1875 年来华，初在山西传教，**后至**烟台。

敬畏之心以外，他最值得注意的品格特征是对真理的爱：理论的、科学的以及生活交往中的真理，尤其是宗教真理。他讨厌不管一个人相信什么，只要他是真诚的这一受大众喜欢的格言。“没有真理吗？”他会这样问。“对一个人来说，他投资的银行是否破产没有分别吗？人在一般生活事务上不会是这样的白痴。”如果要在礼貌的谎言和不礼貌的真理之间做出选择，他会选择后者。他把真理看得比任何美德都重要。他对真理的爱使他从束缚那么多人的陈规陋习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他不会屈从于人为的习俗。

对自由的热爱或许就是上述品格的孪生兄弟。他喜爱的一句经文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¹他试图把这一坚定的独立性印在所有受他影响人的脑子里。他厌烦那种简单地把中国人训练成“外国人的仆人”的教育。当他抱怨地嘟囔这一词语时，嘴角显现出多么轻蔑的神情啊！他经常会浪费金钱试图帮助某个武断、男子气概地独立工作的人，而不去帮助一个雇员。他性格中这种坚定的力量，就像磁力起重机，吸引铁屑，即使它们掩藏在地下。这种性格力量逼使其他人表现自己的男子气概；

¹ 见《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第32节。

虽然外表看不出来，尚未展现，但却被提起来了。

前面已经提及狄考文博士去世时，长老会西部差会正在潍县开会；在休会之前，他们即在会议记录上高度赞赏狄考文。其中，除了上述一些评价之外，还极力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品行：

凡是到他那里去的有困难的人，没有不得到他的同情和帮助的。他自己生活节俭，但却给予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慷慨的物质援助；他为这所大学添置了相当可观的设备，为他如此热爱的工作的各个领域贡献了相当多的财物。他的名字将在我们中间长久传扬，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起而称他有福。

英国浸礼会在狄考文博士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做出决议，表达他们深深的失落之情。其中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代表这一情绪：

他对福音天生具有赤诚忠心，在完成伟大而艰辛工作的征程中，巨大的意志力和热情战胜了所有的困难，克服了所有阻力。他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一位优秀的管理者、富有成效的宣教师 and 杰出的学者；他离我们而去所留下的空白，将长期无法轻易弥

补。

他为之服务了 45 年的北长老会国外宣教部发表了高度评价他的长文，其中的一段文字如下：

狄考文博士具有非凡的能力和影响力；他是一位教育家、学者、高效率的管理者...深深地感谢上帝，本部记载了这位伟大的传教士教育家具有广泛使用价值的观念。我们悲叹传教工作再也不能因他的忠告而受益，但他一生的工作所积累的智慧 and 树立的榜样长存，他的名字将在中华帝国传教史上永远占有显著的地位。

宣教本部秘书布朗在写给潍县的狄乐播牧师的一封信中说：“我认为他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伟大的传教士之一。”

一大批一大批的个人信函，大量在报纸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都可作为对他工作和品格的颂词。尽管每一份信函或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补充，但又必定要重复已经在这里介绍的内容。这里引述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信函和文章缺少对狄考文博士的赞赏。

还要这部传记的作者说一下自己对狄考文博士的工作和品格的评价吗？如果说写这本书是完全应该的，那就不必再这样做了；

如果作者已经披露了这位伟大的传教士值得展示的一生工作和内心世界，而且是奔着这一目标去做的，现在再去详述他的品格就显得多余了。此外，如果我这样做的话，那么，我在何处结束我的叙述呢？我必须讲述他的个性、人格、体格、外貌特征；要叙说他的智力特质，即他在智力方面的活力、多才多艺和远见；描述他伟大的心，以及其外表并不总是足以能让人看出的温柔；必须叙述他从不向多数和压力而只向真理和责任屈服的意志；必须说明他的良知，这种良知使他蔑视任何人可能加于他的事情；必须叙说那根植于万能上帝主权和恩惠、根植于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之中的虔诚；必须讲述他奉献自己以及所有他可能为礼拜祭坛带来的贡献；必须评说这位布道师、教师、学者、科学家、实业家，评说基督教事业中的儿子、丈夫、兄弟、同窗和同事；必须要叙说他在时间和金钱上的节约，以及他的慷慨大方；必须讲述他的保守和进取；记述他的唯一目的、他的勇气、他的坚持、他的效率；说明他的弱点及他的强项；要讲出他的许多成功和罕见的失败；而且，还要对我不能列出的更多的事情做出评价。我应该把他比作过去一个世纪中——无论是尚健在或去世的——把一生献给中国福音传道最重要的基督的仆人；或者是把他比作日

本的沃贝克 (Verbeck)、印度的达夫 (Duff)。然而，这里我要再大胆一些，我敢说，只要你邀请到非常了解他一生的人，相信他们都会和我一起说：“这是一位基督徒；这是一位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特的高效率的传教士；同时，又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位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

在《天路历程》一书中，我们见到有这样一段描述：

此后，人们纷纷**传扬说**那位信使又来传唤勇求真先生；作为这一传唤的真实凭证，“他的水罐在泉边损坏”¹，就是这一传唤的真实凭证。当他明白这是真的以后，就把他的朋友邀请来，告诉了朋友们这件事情。随后，他说，我要到我圣父那去了，为了到我圣父那里，我历尽巨大艰难，但我并不后悔为走到这一步曾经遭遇过那些艰难。我的剑留给继我之后奔天路的人，我的勇气和技能，给那位能得到它的人。我带走身上的疤痕，一边向圣父证明我曾为圣父战斗过，圣父将予我奖赏。在他必须走的那一天，很多人陪着他来到了河边，他走进河里时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²但他走进河水的更深处时，又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

¹ 参见《旧约·传道书》第12章第6节。

² 《新约·歌林多前书》第15章第55节。

在哪里？”¹他说着就蹚过了河，对岸所有的喇叭都为他吹奏起来。

¹ 同上。